

性别与移民：新加坡中国新移民之研究

GENDER AND MIGRATION: A STUDY OF CHINESE NEW MIGRANTS IN SINGAPORE

刘 丽 辉
LIU LIHUI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6

性别与移民：新加坡中国新移民之研究

**GENDER AND MIGRATION: A STUDY OF
CHINESE NEW MIGRANTS IN SINGAPORE**

刘 丽 辉

**LIU LIHUI
(M.A. NUS)**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硕士学位论文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6**

Acknowledgements

I gratefully acknowledge the various forms of assistance received in my study. First,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this thesis paper will not be possible without the invaluable guidance of my supervisor, Dr Liu Hong,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hinese Studie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utmost gratitude to him. Secondly,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thanks to administrators of www.4family.net and www.huasing.org for their strong support. Special thanks are also due to my friends Zhou Longjiang, Pang Yuanyuan and other people who are so kind to accept my interviews.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thank my family members for their moral support during this period.

目录

谢辞 (Acknowledgement)	i
目录	ii
英文摘要 (Abstract)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	3
第三节 论文学术意义及结构	6
上编 性别与移民：私人领域	
第二章 性别与家庭	9
第一节 移民决定的作出	10
第二节 家庭中地位的变化	15
第三节 育子策略及女性依赖家庭的根源	20
第四节 结语	27
第三章 性别与婚姻	29
第一节 女性凭借婚姻关系进入新加坡的动机	30
第二节 涉外婚姻的促成手段	34
第三节 移民对女性婚姻的影响	36
第四节 结语	41
中编 性别与移民：社会领域	
第四章 中国女人与新加坡社会	43

第一节	“小龙女”——被“他者化”的中国女人	46
第二节	《乌鸦》风波	51
第三节	“黄娜事件”	59
第四节	结语	69
第五章	中国女人与劳动力市场	71
第一节	女移民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背景	72
第二节	工作信息的获得	77
第三节	劳动力市场对移民女性的限制	83
第四节	结语	92
下编	性别与移民：民族国家	
第六章	新移民与民族国家——中国	94
第一节	新移民民族主义何以复兴	95
第二节	新移民民族主义复兴的途径	100
第三节	新移民的政治认同	105
第四节	结语	110
第七章	新移民与民族国家——新加坡	112
第一节	社会认同的塑造	114
第二节	文化认同的趋近	118
第三节	政治认同的变化	126
第四节	结语	132
第八章	结论	135
	参考书目	140

Abstract

Since 1990,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new migrants (many of whom are females) have settled down in Singapore. However, migration theories have not paid adequate attention to the significance of gender in this migration flow; and female migrants have often been relegated to the role of “trailing spouses” and are generally invisible in the scholarly analysis.

This thesis attempts to link gender and migration by studying the experiences of Chinese new migrants in Singapore. The first part of the thesis focuses on the private sphere (marriage and family) and argues that women are active ag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cess of migration. It also challenges the conventional argument that women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choose international marriages purely for economic motivation. The second part focuses on the public sphere (the society) and examines the tensions (and gradual improvements) between Chinese (female) new migrants and the Singapore society at large. Despite facing many difficulties and limitations, Chinese women have played an active role in the local labour market. The third part focuses on the role of the nation-state in the evolution of engendered migration. In addition to discussing the revival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new century, this thesis gives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making of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

性别与移民：新加坡中国新移民之研究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自1990年中新建交以来，大批中国人追随先辈再下“南洋”，在“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定居下来。关于新移民的总数，新加坡官方并没有公布具体统计数字。根据中国新移民组织华源会的估计，到2002年为止，新移民人数大约为25万人。¹ 他们的到来，对本地的经济、社会、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这个华人为主的移民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经济方面，政府和企业界人士欢迎他们的到来，但每到经济低迷之时，民间就会出现“外来人才抢饭碗”的争论；在社会方面，新移民中的女性，往往会因一些个别事件而成为社会舆论的中心；在文化方面，尽管政府不断强调华文的重要性，但讲英文的家庭却越来越多，华文市场不断流失。新移民作为中华文化的坚定拥护者使本地一些华人情绪复杂。这些变化仍在持续，并因为近年来政府加大引进外国人才的力度（例如在中国各省市重点中学中招揽青少年精英）使本地人面对更多挑战而变得更为复杂化。因此，如何在这个东西方交汇之地、多元种族的袖珍发达国家生存下来，寻求自身的政治文化定位，就成为新移民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何谓“新移民”？这个概念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赵红英在其《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新移民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中，将它定义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公民移居国外并取得永久居住权或加入当地国

¹ 华源会成立于2001年5月。成员全部为原籍中国的新加坡公民与永久居民，以专业人士为主，目的是为了帮助新移民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社会。转引自陈思美《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华人：认同差异及其原因之论析（1993-2002）》（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论文，2003年），页2。

籍的华侨或华人。”² 而向大有认为：“所谓‘新移民’，是一种动态过程的过渡性的群体，既包括持中国护照的华侨和留学生，也包括已取得所在国国籍的外籍华人，还包括大量取得当地长期居留权而又未取得外国国籍者。”³ 具体到本文，笔者将其定义为“1990年中新建交后从中国大陆移居到新加坡的中国华侨（中国护照，侨居国外者）或已经加入新加坡国籍的华人”，其范围包括：专业技术移民、投资移民、留学生、家庭团聚移民以及非法移民。

近年来，新移民作为一种国际现象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在现有的有关国际范围内中国大陆新移民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将新移民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忽视群体内部的多元性及其可能导致的对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等看法不同。⁴ 一些论文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原心态的影响。第二种倾向是：另外一些学者的研究兴趣更多地注重民族国家的视野和导向。他们要么过分渲染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威胁，要么过分贬低新移民与中国的关系。这两种倾向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新移民的研究不做性别划分，假设男女都有同样的移民经验，忽视了女性的特殊个体体验，因此无法做到公正客观。

具体到本地，由于新移民的到来仅有15年，有关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也很少注意到移民行为的性别差异。⁵ 笔者认为，在移民

² 赵红英〈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新移民若干问题的思考〉，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页6。

³ 向大有〈当今海外华人不存在统一的新民族主义〉，见《八桂侨史》1999年第2期，页7。

⁴ 例如：谭天星〈近年来我国公民移居海外情况之管见〉，见《八桂侨史》1997年第1期；赵红英〈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新移民若干问题的思考〉，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向大有〈论海外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若干关系〉，见《八桂侨史》1997年第1期等。

⁵ 目前，刚刚有了一些关于新移民的著作出现，例如：陈思美《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华人：认同差异及其原因之论析（1993-2002）》，但是从性别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很少。

社会的新加坡，从性别角度研究新移民有着一定的现实需要。首先，研究新移民这个群体是有必要的，不仅由于新移民数量的增加形成了一定规模，更重要的是由于新移民的出现对华侨、华人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及对中国和新加坡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均产生了、还将产生着一定的影响。其次，从性别角度研究新移民尤其必要。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女性在新移民群体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由于社会传统性别角色规范的影响，本地移民法律对女性的限制较大。例如，对一个符合签证标准的男性，政府很乐意发放“依附者签证（Dependent Pass）”给他的妻子和孩子，让他们一家团聚；反之，同样资历的女性，其丈夫申请到依附者签证相对困难。这种情况近年来虽有所改善，但还未达到男女主申请人同样待遇的地步。此外，在中新联姻中来自中国的一方多为女性，这些原因都使得女移民人数众多。在移民研究中，一些学者们以男性的行为特征来代表整个新移民群体，忽视性别不同可能导致的种种差异，显然是不适宜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女移民这个边缘群体中的边缘，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成为一些当地人心目中的“他者”。有关中国女人的舆论往往成为本地华人与新移民关系的风向标。在此，性别与阶级、婚姻、家庭、经济领域、社会关系、国家认同等纠缠在一起，更凸现了新加坡这个华人为主的移民社会里当代移民现象的复杂性与特殊性。

无论是在国际范围里有关新移民现象的著作，还是少数关于本地新移民的论文，都建立在广泛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给笔者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启发，但也留下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例如对一个新移民家庭中的成员来说，移民到底是有利于谁的决定？女性只是被动地参与吗？移民作为一个持续的进程对婚姻有何影响？新移民与本地社会的关系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表现如何？在对中国或新加坡的政治认同上，男女两性是否存在着性别差异？

第二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资料

著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关于“下

属群体”是否能够说话的理论给了笔者极大的启发，从而成为本书讨论的基础。

斯皮瓦克有句名言：“下属群体不能在话语中代表自己。”所谓“下属群体”，本指南亚社会中处于底层的人，可引伸为对一般从属特征的命名，这种从属性可表达在阶级、种族、年龄、社会性别、官职和其他方面。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单一的范畴，边界具有流动性。在一个社会里，几乎每个人在同另一人的关系中都可成为下级、从属者。例如在殖民地时期的印度，一个地区的首脑在自己的辖地上是支配者，但同时也是别人的下级、从属者。⁶ 尽管斯皮瓦克是在殖民主义语境中来看下属群体问题，但在任何一个存在阶级、种族、年龄、社会性别、官职的社会里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新加坡，新移民作为一个外来族群，人数相对较少，难以对国家的大政方针施加影响，是主流社会的从属者；作为个人，若非加入国籍就没有政治权利，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是政治权利的从属者；从性别上来看，那些因为婚姻关系入境的中国女人在法律上也是丈夫的从属者。这些都构成“下属群体”的宽泛定义。关于下属群体是否能够发声，在斯皮瓦克看来，学者们通过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工作让“下属群体”发声，愿望良好但十分靠不住，因为“下属群体”的声音会被曲解。以女性为例，“关于女性的‘形象’，女人与沉默的关系可以由她们自己构造出来，种族和阶级都会造成影响”。从事信息收集工作的学者往往在自己认识预设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女性的声音也就无法如实复原。而这些预设认识的根子深深扎在当代的权力关系之中，甚至会同帝国主义主体重构活动相呼应。在两种情况下，“女性作为殖民地历史编撰的客体和作为反抗的主体，性别的意识形态建构都将男性放在支配地位。如果在殖民地生产的环境中下属群体没有历史也无法发声，女人作为下属群体更是会保持沉默。”既然如此，作为“下属群体”的中国女人是不是也无法发出声音呢？

⁶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in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eds.),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24-28.

笔者并不同意斯皮瓦克关于女性无法发声的论述。首先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下属群体既实实在在地开口说话（发出的声音被他人记录下来，作为文本而进入历史记载），也能表现自我（就是说，很有技巧地以特有的方式解说自己的经验和活动，为的是尽量从中获取自身的利益）”；⁷ 而更重要的是，笔者目前正处在这个新移民落户狮城的场景中，本论文并不是追忆过去，而是记录现在。诚然，从1990年到现在的15年间，在前一半的时间里，中国女人是被“看”的对象，多数人在“小龙女”的梦魇中静默无声。但是近年来，随着本地传媒报道的更加平衡以及新移民刊物、网站、文学的出现，她们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视线，热切地书写自己，开始争夺话语权。

本文应用了多种研究方法。首先，在资料的使用上，运用了传统史学实证方法。资料来源主要为两类：第一类是各种出版物。包括本地的三份华文报纸《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和中国国内采写新加坡新闻的各种报纸。第二类是中国和新加坡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移民政策等官方资料。这两类资料都是笔者主要的参考依据。其次，本文也跨越想象文字与非想象文字的界限，将研究资料扩大到新移民文学。新移民作为外来的族群并不掌握主要媒体资源，其声音很容易被主流社会淹没，因此新移民文学就成为重要的文本。这种文本也包括两类：一类是本地的一些正式出版物，包括写实文学和小说（如《中国女子的新加坡》、《乌鸦》等）以及杂志（本文中指唯一的一份新移民杂志《扬时代》）。但是这些正式文本均为近年出版，议题集中（主要针对族群关系）、材料少，还留下了很大的信息空白，为了了解那些沉默的大多数新移民，笔者引进了第二种文本——纪实性网络文学。在本地，新移民网络是真正属于这些人们的言论空间。在这里，他们通常可以卸下面具自由地交谈，不必理会现实世界的阶级、民族、种族、国籍等的差异，更可能流露真实的情绪。网络文学主要来自华新网、新加坡家园物语和狮城华人网三大新移民网站。

⁷ 贺萧《危险的愉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26。

除了以上方法外，笔者也采用了社会学、人类学常用的一些方法，例如调查问卷、个人访谈等。关于调查问卷，共有 127 个新移民（其中 76 个女性、51 个男性）接受了笔者的调查。他们分布在各个阶层。女性分类较广，有陪读妈妈、家庭主妇、工厂女工、职业女性和学生。而男性只有三种类型：专业人士、持务工准证的劳工以及学生，这基本上反映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秩序在男移民心目中仍具有深刻的影响。调查的地点有传销介绍会、工厂、大学校园以及移民局。值得一提的是移民局，无论新移民来自何种阶层都需要跟移民局打交道，而笔者在这个地点的调查也涵盖了所有能找到研究对象的地方（包括工作准证、社交准证、学生准证申请处以及永久居民申请处）。可以说，调查基本上能够客观反映新移民真实想法，但也存在着一些局限。例如，笔者的新移民身份很可能会给有意放弃中国国籍的个别人带来心理压力，以至于他们不会明白写出真实想法。同样的问题也可能存在于个人访谈中。共有 20 人（16 个女性，4 个男性）接受了笔者的访问。女性中包括了 6 个职业女性、5 个学生、4 个家庭主妇和 1 个陪读妈妈；由于本论文侧重女性研究，对男性的采访比较少，共有 4 个男性（1 个学生、1 个专业人士、1 个国内留守的丈夫、1 个返回中国又离开的专业人士）。访谈对象主要是笔者的朋友或朋友介绍的人，也有在网上认识的、愿意见面接受访谈的人。所有访谈人物在本文中均用化名。笔者希望通过人物访谈以弥补统计数字等科学方法的不足，为论文补充些血肉。通过多种方法的运用，使内容更为丰富，论证更为全面、客观。

第三节 本文学术意义及结构

本文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通过对女性多重动机的研究，指出中国人关于出国动机的性别差异，部分修正传统移民理论中关于移民是经济驱动、理性选择的武断论断；此外，将民族国家、女性主义理论引进研究中，凸现新移民对文化认同、政治认同的性别差异；最后，将历史学通常运用的实证方法与社会学、人类学方法相结合，取三者之长融会贯通以加强论证。

关于文章的结构，本文第二章和第三章集中关注私人领域。在第二章中，将对学者 Seet Chia Sing 关于新移民女性在家庭中的有关论断进行考察。他认为，在新移民家庭中，丈夫是一家之长，移民是有利于丈夫、牺牲掉妻子利益的决定。而笔者认为，多数女性持依附者准证入境的现实并不能说明她们没有主动积极参与移民决定。事实上，笔者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女性都发挥了主体意识，她们并不是被动的牺牲者。此外，多数女性的家庭地位并没有随着移民而降低。

第三章主要关注的是凭借婚姻关系进入新加坡的女性（包括嫁给新加坡人或在新移民的中国女性），它试图阐述三个问题：当代女性通过婚姻关系来到新加坡的动机是什么？她们以何种方式进入涉外婚姻？移民对婚姻产生了何种影响？笔者在本章中会修正那种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选择移民是为了经济利益的论断，也将引入有关互联网的理论以探讨虚拟世界对某些女性婚姻的影响。

第四章的焦点转到社会领域，在社会生活上，通过媒体报道的“小龙女”名称、《乌鸦》风波以及中国女童黄娜被杀三个有关新移民的主要事件，来了解本地社会是如何“看”新移民的，而这种媒体的观点又与公众的观点存在着怎样的疏离？笔者认为，在中新建交的初期，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女人往往以“他者”的形象出现。这反映了新移民与本地社会关系的部分事实，但与现实生活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疏离。

第五章注重讨论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困境以及采取何种策略进入经济领域。尽管女性通常比男性面对更多的限制，但她们还是积极采取各种措施进入劳动力市场。

第六章主要探讨新移民与中国的关系。在本地，新移民民族主义的重新高涨主要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并没有转化为大规模的政治行动，不可能对中国政府提供足够的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在本地长期定居的新移民的政治认同也会慢慢发生变化。尽管目前多数人都是中国公民，但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在未来放弃中国国籍。

第七章试图回答新移民对新加坡民族国家的认同表现在哪些方面，存在着怎样的性别差异？笔者认为，选择长期定居的人们都会不同程度地融

入本地社会，而在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上，女性的当地化导向比男性更为明显。

上编 性别与移民：私人领域

第二章 移民与家庭

Brenda S.A Yeoh and Louisa-May Khoo 认为，传统的国际移民研究著作往往忽视家庭（尤其是家庭成员女性）在移民中的作用，将女性视为“追随丈夫的妻子（Trailing Spouses）”，假设她们的声音与男性相同。

¹ 这种情况在中国新移民研究中尤其明显。笔者认为，在研究华人新移民时，若是忽略了两性在各方面的差异会很难做到客观、公正。研究女性，我们必须关注家庭，其原因有四：第一，生活包括两方面——工作和家庭。无视家庭的作用，移民研究就不完整。第二，家庭是女性的传统领域。研究家庭在移民中起何种作用也就可以发现女性所扮演的角色。第三，家庭是介于个人和国家间的细胞单位，尽管新加坡作为移民的接收国对移民的审批是以个人为基础的，但从长远来说，多数家庭都可以在本地团聚，于是在新的环境里又重新组成一个个社会单位。第四，通过考察家庭内部决策权等方面可以看出女性在移民前后家庭地位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直接影响女性对移民的主观评价。

在进入讨论之前，首先有必要对家庭这个有争议的词汇做一个界定。费孝通认为：“家庭这概念在人类学上有明确的界说：这是个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亲子指它的结构，生育指它的功能。”但是家庭这社群总是有生育之外的其他的功能，“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² 因此中国人的传统家庭指的是同居共财的生育群体。

目前，在以本地中国新移民为对象的有限专著中，有的学者已经将家庭内部两性间的性别差异纳入研究范围里。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 Seet

¹ Brenda S.A.Yeoh and Katie Willis, *State/Nation/Transnation: Perspectives on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413.

² 费孝通《乡土中国》（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页36—41。

Chia Sing。Seet Chia Sing 看到了家庭在移民中的重要性，注重研究女性，但是却同样将女性视为“追随丈夫的妻子”。他认为，在新移民家庭中，丈夫是一家之长，移民是有利于丈夫、牺牲掉妻子利益的决定。移民后，“看到这些在社会上和家庭里的地位都经历了剧烈的、戏剧性下降的妻子，都能够平静地、心甘情愿地面对事实，真让人感到可怕。事实上，妻子中几乎无人能找到一个与中国时相当的位置（指社会职业）。”

3

Seet Chia Sing对家庭的研究视角独特，但是在移民过程中，女性只是被动地参与吗？某种程度上社会职业的相对失落（相对于移民前）足以导致家庭内部男女双方地位的变化吗？女性比男性更加依赖家庭的根源是什么呢？下面，本章将在前两节中从家庭内部移民决定、家庭地位两个方面来修正 Seet Chia Sing 那种女性被动移民后家庭地位降低的论断，并且将在第三节中分析女性在移民后更加依赖家庭的生理和社会根源。

第一节 移民决定的作出

Seet Chia Sing 认为，“男人们移民，妻子照着丈夫的决定去做——跟随前来。这些女人对自己的移民（事业前景）考虑得不多。丈夫离开了，家庭也就被拆散了。对他们来说，家庭被拆散不可能是永久的；一方必然跟着另一方移民。要么先走的回来，要么妻子加入。因此最终的移民多数都是先走的丈夫预先考虑好的，（暂时）留下来的那一方没有什么选择余地。”⁴ 在他看来，移民决定打着家庭利益的幌子实际上牺牲掉妻子的利益。女性消极、被动地跟随男性家长移民，在这一过程中是顺从的依附者。

³ Seet Chia Sing, *Making Sense of Families Moving: A Study of Chinese Migrant Families in Singapore*(Singapore: A Thesis Paper f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0/2001), p.35.

⁴ 同上，页 28—29。

那么，多数女性在移民决定的作出过程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还是顺从的依附者？

在笔者的调查中，移民决定是夫妻双方共同作出的占 50%，位居第一位；17.10% 是女性自己决定的；18.42% 是男方决定的；而听从父母安排的占 11.84%。⁵ 从调查数据来看，多数女性都独自或亲自参与了移民决定。尽管多数女性都持依附者准证入境，但这并不能说明她们是被动的跟随者。如果把女性这种主动参与的角色放在当代中国家庭权力格局这个大背景中来考察，会更有助于我们的理解。

学者徐安琪在对日本、菲律宾、美国、英国、德国、瑞典和中国七个国家的家庭所作的调查问卷中发现：关于家庭实权，72.7% 的瑞典夫妻共同决定，位居第一，随后是德国夫妻（71.9%）、美国夫妻（56.6%）、英国夫妻（51.3%），中国夫妻比较靠后（44.1%）位居第五；但是，在妻子控制家庭实权这一选项上，中国家庭以 30.7% 高居榜首，紧随其后的为英国家庭（26.3%）、美国家庭（19%），菲律宾家庭最低（7.9%）。两项合计，74.8% 的中国妻子会参与家庭的重大决定。⁶ 此外，李银河在研究中也认为：“在中国，过去一般的家庭都是男人当家作主，但是在妇女成为家庭收入的近一半来源后，这种情况显然有了改变……由夫妻共同决定家庭重大事务的家庭占了 58.1%，城镇为 68.2%，农村为 55.9%。”⁷ 在有关家庭的重大决定中，当代中国女性显然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多数女性（67.10%）都积极主动地卷入了移民决定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发生的。

那么，女性是怎样参与移民决定的呢？我们将在下面结合访谈以及新移民文学来具体说明。

一、夫妻共同决定

在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移民（50%）的家庭当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多数女性持依附者准证加入丈夫。这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以新移民配偶的

⁵ 资料来源于笔者在 2005 年 3 月开始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

⁶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 年），页 76—77。

⁷ 同上，页 77。

身份，另一种是以新加坡人配偶的身份。在两种情况下，女方的依附身份仅仅是一种法律上的符号，是入境时的权宜之计，并不意味着女性在移民决策过程中或是在入境后的生活中均处于劣势地位。相反，笔者在访问中发现，女性拥有相当大的决策权。这种决策权往往并不表现在日常生活琐事由谁拍板定案上，而是更多表现在拥有“一票否决权”，这在移民决定的作出过程中尤其明显。

首先，我们先看以新移民配偶身份前来的情况。王倩于1998年跟随先生前来新加坡。在回忆起移民前的情况时，她笑说：“我听他的。”这决定表面看来是典型的男性权威的产物，其实不然。夫妻俩人均毕业于中国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清华是一百多年前，美国用庚子赔款的一半建起来的，享有“留美学校预科”之称。夫妻二人深受周围同学的影响，也早早就做起出国梦来。新加坡国立大学是当时第一个提供奖学金给先生的国外大学。尽管他后来也被几个美国大学录取，但由于妻子王倩对新加坡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她的母亲出生于新加坡），两人决定移民到新加坡。她入境后在一所私立学院攻读英文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如今早已毕业的她从事销售工作，薪水比当工程师的丈夫还多。在她看来，先生很优秀，很通情达理，凡事都会充分考虑她的意见。这样的决定实际上是双方共同协商的结果。⁸

雨林的先生在北京某高校硕士毕业后，在寻找工作时，正逢新加坡公司前往中国招聘，他被录取了。这个消息让夫妻二人欣喜异常。“如果不趁年轻时出国闯一闯，年纪大了就没有机会了。”在访问时，雨林解释道，“当然我也有一点点私心，我从小梦想浪迹天涯，在北京呆了六年多也真的感觉有点腻了。不管外面的世界是很精彩还是很无奈，总之我和老公两个都下定决心要出来走一走，看一看这外面不同的世界，呼吸一下不一样的空气了。”她表示先生凡事都会征求她的意见，若她不同意，他是做不成的，因为她有“一票否决权”。⁹

⁸ 资料来源于笔者在2005年3月开始的个人访谈，文中女性名字为化名。

⁹ 同上。

在这里，男人们被鼓励挑起生活的重担，但有关家庭未来的长期规划上，他们无权自作决定，除非妻子赞同。女性们拥有不低于丈夫的学历、能力，也有同样的智慧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在出国的大潮中，她们并不能拥有与男人们同样多的机会。在此情况下，丈夫先来、妻子跟随仅是一种无关痛痒的权宜之计，并不能改变在包括移民决定等重大家庭事务上女性拥有最后否决权的现实。

其次，在登陆的新加坡人新娘案例中，也往往是夫妻双方共同决定的。一方面，有些女性有着出国梦。以婚姻作为跳板无疑是出国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中国女子的新加坡》一书记载了一个上海新娘的出国动机。“90年代中，正是中国人赶出国潮正盛的时候。当时上海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一等美女飘洋过海，二等美女深圳珠海，三等美女留在上海’。谁也不愿当留在上海的那一个。于是稍有姿色的女人都挤破了头想嫁出国。”¹⁰ 另一方面，随着新加坡跻身于发达国家，西方社会迟婚、不婚之风也悄悄吹起。社会上适龄而单身的主要是两种人：一种是高学历女子，一种是低学历男子。低学历男子往往工资低、工作辛苦，在当地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而中国女性由于语言相通、文化相近成为他们的首选。在此情况下双方一拍即合，对未来定居地的预期是一致的。因而中国新娘从90年代开始纷纷登陆狮城。

当然，并非所有女性嫁入新加坡都源于盲目的出国动机。有些中国新娘，尤其是那些在中国有着辉煌的事业前景的，嫁入新加坡往往是因为爱情。对于这些人，移民决定虽然是双方共同作出的，但自己心甘情愿、主动牺牲一切、主动承担一切，更能说明她们为自己负责的勇气。乒乓名将井浚泓就是这样一个例子。1988年，井浚泓还是江苏省乒乓球队的一名球员时，认识了前来上海的新加坡人黎仕汉，两人相互吸引谈起了恋爱。后来井浚泓入选国家队。正当前景一片灿烂时，她却于1992年毅然放弃了中国的大好前程嫁到了新加坡。“对一个女人来说，婚姻比事业更重要。婚姻是一种求之而未必得的缘份。至少我是这样。我很珍视我的婚姻，它比

¹⁰ 肖洁〈梦断狮城——一个上海新娘的悲惨遭遇〉，见《中国女子的新加坡》（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2年），页8—18。

乒乓更重要。”¹¹ 这些在中国已事业有成的女子，没有人能够强迫她们作出什么决定，除非她们自愿为爱情牺牲。

一般而言，在嫁作狮城妇的中国新娘身上，中国传统的“从夫居”的观念体现得非常明显。不像那些以新移民配偶身份前来的女性，狮城新娘的文化素质参差不齐。然而不论出于何种动机，她们积极主动地卷入了移民过程。持依附者准证入境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能说明家庭中男女的真正地位差距。

二、女性独立决定移民

在女性自己决定移民（17.10%）的案例中，她们（高学历女性居多）以工作准证持有者的身份先来，丈夫或者以依附者的身份加入或者至今仍在中国国内留守。例如，友子于2000年到新加坡留学。她说：“机会来了，当然就想抓住了，也没想那么多。”先生支持她的决定。但四年后的今天，已经离婚的她重新回首时有了一番新的认识：“他当时其实并不愿让我出国，可惜当时我没能看穿。”她说：“男人没法为女人作这个决定。你来了，他来不了，他觉得很自卑，会觉得你比他强。若是他帮你决定，他会怕最后被埋怨。”¹²

在这种心态下，女性单独出国，国内留守的先生往往并不愿参与提供意见。女性被赋予了最大限度的决定权。在女性自行作出移民决定时，伴随着的是男性的骄傲遭受了巨大的挫折。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女性（包括许多文凭与配偶相当或略高的女性）多持依附者准证入境新加坡（约占52.64%），并不介意这种法律上的形式；而在笔者的调查中没有一个男性以这种身份加入妻子。¹³ 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在访谈中询问一位妻子先行移民、现在在国内留守的男性。他不屑地说：“我是男人，怎能拿 Dependent Pass（指依附者准证）？若

¹¹ 肖洁〈乒乓情缘定狮城——及新加坡体坛乒乓皇后井浚泓〉，见《中国女子的新加坡》（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2年），页30—40。

¹² 资料来源于笔者在2005年3月开始进行的个人访谈，文中女性名字为化名。

¹³ 资料来源于笔者在2005年3月开始进行的社会调查。

是我拿了，以后在老婆、朋友面前怎么抬头呢？”¹⁴ 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使他宁可忍受两地相思之苦，也不愿丧失一家之主的尊严。在许多人（包括很多女人）眼中，无论妻子如何能干，丈夫仍是一家之长，照顾女人是天经地义的事。

Seet Chia Sing 的研究发现了一个事实：尽管追随丈夫而来的妻子，几乎都经历了社会地位下降（如医生、律师成为家庭主妇或兼职的华文教师），但都能够平静地、心甘情愿地面对现实。¹⁵ 笔者在研究中也发现了这一不寻常的情况。在当代中国，“中国妇女的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已由20世纪50年代的20%提高到90年代的40%”；¹⁶ 而职业女性的比例也从10%左右上升到了80%—90%。根据中国妇联的调查，全国18-64岁女性中，92.5%是在业或曾经在业的。¹⁷ 应该说，双薪制家庭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事。但是移民使情况发生了变化。从薪水来看，笔者的调查对象中，75.34%的丈夫薪水高于妻子；18.42%的妻子为没有收入的家庭主妇。一句话，妻子对家庭的经济贡献下降了。但是对在此地生活感到满意、非常满意的妻子，却占47.37%（仅有3.95%明确表示不满意，其他人表示一般）。¹⁸ 这种反差的原因之一，恐怕与女性自觉主动卷入移民决定有关。她们主动参与、自己负责，显示出面对未来不可知现实的巨大勇气。为了家庭，她们作出移民的决定；而移民后，她们也依赖家庭面对新世界的风风雨雨。

第二节 家庭中地位的变化

¹⁴ 资料来源于笔者在2005年3月开始进行的个人访谈。

¹⁵ Seet Chia Sing, *Making Sense of Families Moving: A Study of Chinese Migrant Familie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A Thesis Paper f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0/2001), p.35.

¹⁶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页77。

¹⁷ 同上，页37。

¹⁸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的社会调查。

Seet Chia Sing 指出，女性在移民后的社会地位下降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随之下降。而笔者认为，不少女性在短期内社会地位下降是事实，但由此得出家庭地位也下降了结论未免草率。毕竟，影响家庭地位的因素不是单单一个社会地位，一些其他因素也会使其发生变化。问题是：移民后，男女两性的家庭地位发生变化了吗？有哪些因素发生影响？

李银河在研究世界各国女性时，将家庭地位定义为女性与男性相比的家事决定权、家务劳动分工等。¹⁹ 但笔者以为，此定义是学者在广义范围内理性分析、外部考察的结果，我们将其应用于中国时发现：在中国女性移民眼中，家务劳动分工、经济能力等并不必然说明女性家庭地位的高低，而家庭决策权才能说明问题。

首先，家务劳动不能说明女性家庭地位的高低。因为中国女性承担较多的家务劳动是一种普遍现象。根据调查，在当代中国，城市职业女性家务劳动日均3.97小时，比已婚男性平均多出1.25个小时，女性家务劳动负担偏重。在农村，女性的家务负担更重。²⁰ 就在这种普遍的事实下，徐安琪在大范围的调查问卷中发现：对两性家庭地位的评价，中国女性认为男女平等的有59%，认为女性较优越的有16.4%。²¹ 显然，女性并不以家务劳动来作为评价家庭地位的重要标准。这种不协调在笔者的个人访谈中也得到了证实。在谈话中，所有女性都承认自己承担了多数的家务劳动，但多数人同时强调自己在家中与丈夫地位平等。例如：一个国立大学的博士生虽然抱怨：“他（其丈夫）什么都不干，一点都不帮我。”可是，关于家庭地位，她却反问：“你觉得我受压迫吗？不，我不这样认为。在家里，虽然我干活多，可我也说了算。”²²

其次，经济收入也不必然说明家庭地位的高低。在笔者的访问中，一个华文老师自移民后就成为一家四口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她常常觉得心累，对其没有养家能力的丈夫也常有怨言。两人时常吵架，她曾几次把

¹⁹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页75。

²⁰ 同上，页83—85。

²¹ 同上，页76。

²²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进行的个人访谈。

丈夫赶出家门。但她却认为双方在家里地位平等，家里的大事都由两人商量决定。在她眼里，理智地来看，女人对家庭多奉献一些是天经地义的。无论女人多么能干，毕竟还需要男人的臂膀。丈夫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毕竟男人总体上做事要理智一些。²³ 而在另外一个家庭中，妻子在入境后成为了一名没有经济收入的家庭主妇。但是买房子、投资等重大家庭事务，丈夫都只能做些初步考察，妻子最后拍板定案。²⁴ 在这个案例中，夫妻双方的性格（妻子强悍、丈夫软弱）才是决定家庭地位的重要因素，而非经济收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根据调查，71.23%的中国女性认为，自己的家庭地位在移民后没有变化。²⁵ 出现这种情况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首先，从外部环境来看，新加坡与中国一样深受儒家思想性别分工的影响，西方女权思想的影响并不深广。中国女性在这里遇到的文化冲击并不如在西方社会强烈，因此在思想上由于受到外界影响而突然要求女权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其次，在新加坡，由于华人较多，中国人适应的困难相对在西方国家要小，很多新移民甚至感觉就像没出国一样。因此，由于夫妻之间对陌生环境的适应能力不同而带来的冲击力，都不足以重新建构多数家庭的内部权力体系。第三，新加坡毕竟还是一个新的环境，在这个新环境里从头开始打拼，在缺乏外援的情况下，新移民需要更多地依赖家庭，因此家庭内部更需要稳定。最后，很多新移民夫妇均为高学历，夫妻感情深厚，不会为暂时的困难而看低配偶。

但是，不可否认，有些人的家庭地位还是在移民后变化了。根据笔者的调查，10.96%的移民女性认为，在移民后，自己的家庭地位提高了；2.74%认为移民后的家庭地位降低了。²⁶ 那么哪些因素可能影响女性移民后的家庭地位呢？笔者在访谈中发现：生育、双方知识学历上的差距等因素都可能引起地位的变化。

²³ 同上。

²⁴ 同上。

²⁵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进行的社会调查。

²⁶ 同上。

第一，生育问题可引起家庭地位的变化。在笔者的访问中，有三个嫁给新加坡人的中国新娘（现均为家庭主妇）认为存在这种情况。一方面，一些本地老人仍然具有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其中一个案例中，尤嘉，一个私立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于1999年嫁给了一个本地人。婚后，她放弃学业当了一名家庭主妇。婆婆对自己的宝贝儿子娶了个中国媳妇非常不满，而丈夫夹在婆媳之间，对她讲话的口气也常常不耐烦。两年后，随着她一对双胞胎男宝宝的出世，她的地位也随着变化。婆婆整日喜滋滋地抱着宝贝孙子，看她的眼光也有了慈爱。丈夫也开始凡事都征询她的意见。她感叹道：“若是没有儿子的出世，我真不知道能挺到什么时候。”而另外一个与公公婆婆同住的中国新娘也认为自己家庭地位的明显改善是在儿子出世之后，她认为二者有一定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并非生男孩才可使母亲地位提高，在有些情况下，女儿也可成为原本不睦家庭的粘合剂。第三个新娘并没有与公婆同住。她通过同乡介绍于1996年嫁给了大自己12岁的一个本地男人。双方在婚前只有短暂三个月的异地交往，夫妻婚前感情并不是很深厚。两人在结婚初期总为一些小事争吵不休，但是当她生下女儿后，丈夫对她比以前好了，她觉得自己的地位有所提高。她认为：“应该是丈夫爱屋及乌吧。”²⁷

第二，双方知识学历上的差距也会带来家庭地位的变化。王琰出国前在沈阳一家银行工作。但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摒弃外力的帮助，夫妻双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知识学历上的差距开始尖锐地显现出来。由于文凭（成人高考大专文凭）不被承认，英文不过关，她无法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被迫成了一个家庭主妇。当工程师的丈夫虽然并不反对她留在家，但她讲话的口头禅就是“你懂什么！”她在英文补习班里，由于背景相同，很快就和另外两个博士夫人成了好友。三个人课间休息时常常互相倾倒苦水，都觉得出国后，丈夫在家里有看低自己的倾向，家庭地位一落千丈。²⁸

²⁷ 以上三个案例均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进行的个人访谈，文中女性名字为化名。

²⁸ 同上。

第三，复杂的家庭关系也可影响女性的家庭地位。余琳在出国前与婆婆住在一起，而丈夫则在新加坡工作。婆媳不和让夫妻之间战火不断。后来，她离开婆婆加入丈夫，这个家也就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她又重新扬眉吐气，成为这个家的真正女主人。她说：“婆婆和儿媳会不自觉地在一个男人面前争宠。多数男人在骨子里都认为宁可伤害媳妇也不可以伤害妈妈。所以跟婆婆住在一起，媳妇的地位怎么可能高呢？”²⁹ 尽管婆媳关系对那些在中国国内的家庭也是一个难题，但是移民却可以通过小家庭从大家庭里分离出来的方式，让原本复杂的关系变得简单，让年轻女性的家庭地位得到改善。同样，移民也可让原本简单的关系变得复杂。有的移民小家庭，老人会因孩子的降生而被请来加入，于是重新组织成一个大家庭。有些情况下，长辈（主要是公公婆婆）的加入也可能会使年轻女性的家庭地位降低。

最后，爱情也可使女性家庭地位发生变化。在中国时，由于家里兄弟姐妹较多，安妮在父母面前常被忽视。1995年，她嫁来新加坡。新加坡夫婿十分爱她，几乎支持她的所有决定。在丈夫的支持下，她开了一家公司，当起了老板。她觉得自己的家庭地位在移民后上升了。“我想做什么，就能得到丈夫的支持，这背后是尊重。”³⁰ 在这个案例中，女性通过婚姻移民从父母的家庭中走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小家庭。追随爱情使她的家庭地位也发生了变化。

与女性移民 13.7% 的变化率（10.96% 上升了； 2.74% 的下降了）相比， 20.45% 的男性认为移民后自己的家庭地位上升了；没有一人认为自己的地位降低了。³¹ 男女两性间的这种差异显示，移民在总体上对男性的家庭地位较为有利。在一个案例中，一个中国老太太来到本地的女儿家。由于与女婿相处不好，女婿坚决要求岳母回国。小夫妻为此整日争吵不休。女婿于是向公司申请派驻海外并在离家一年后申请离婚，女儿无奈

²⁹ 同上。

³⁰ 同上。

³¹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 2005 年 3 月开始的社会调查。

只能妥协。³² 在这里，男人掌握了主动权。移民使其经受了磨练，更有勇气独当一面，不一定要从家庭中得到力量。而女人则更多地依靠家庭，才能更好地面对这个陌生的环境。因而家庭地位的下降也就不难想象了。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女性在移民后短期内社会地位下降是事实，但并不能因此得出家庭地位也随之下降的结论，因为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例如配偶的性格等）也会影响家庭地位的变化。事实上，多数家庭在移民后内部权力格局没有什么变化。少数有变化的家庭，男性地位上升的比例更大一些。总体上移民还是相对男性的家庭地位有利。移民后，很多女性都有较长时间成为家庭主妇的经历，她们比男性更加依赖家庭。

第三节 育子策略及女性依赖家庭的根源

移民后，尽管多数女性家庭地位没有什么变化，但一个显见的事实是相当一部分已婚女性都有一年、几年甚至几十年做家庭主妇的经历，退回到家庭的比移民前更多了。相反却很少有男性辞掉工作全力料理家务。移民后，女性比男性更加依赖家庭。那么，女移民如何看待传统的“母亲”、“妻子”角色？她们采取何种策略应对生育抚养责任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冲突？这种传统的母性是社会所强加的吗？反映了两性间何种关系？

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照料幼儿对移民女性变得尤为繁重。首先，在移民初期，若是将孩子送往幼儿园，她们无法得到政府的资助。Brenda S.A Yeoh and Louisa-May Khoo 指出，在新加坡，“女性的外国人身份，限制了她们在照顾幼儿方面的选择。第一，她们无法享受到把小孩送到幼儿园的政府津贴，除非她们是被雇佣有工作的永久居民；第二，她们也享受不到政府提供给本国从事全职工作女性公民的幼儿津贴。”³³ 没有津

³² 峻凌〈女儿的天平，母亲的心〉，见《扬时代》2005年4月、5月刊，页6—7。

³³ Brenda S.A. Yeoh and Louisa-May Khoo, “Home, Work and Community: Skill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xpatriate Women in Singapore”, in Katie Willis and

贴的幼儿费用十分昂贵，对尚处于移民初期的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其次，新移民多赤手空拳来到这里，在移民初期经济能力有限，将国内的父母带来照顾孩子同样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再次，与来自侨乡、以投奔亲朋好友的连锁移民为主的老移民不同，新移民来自五湖四海，很多人是技术移民，在此地并无亲朋好友。移民女性多无法得到亲朋好友的援助。那么她们通常采取哪些方式来照顾幼儿呢？

一、育子策略

1、成为全职家庭主妇

在传统角色的规范下，许多女性成为全职家庭主妇，至少在移民初期。

毕业于河北某大学的吴红，在2003年初加入新加坡工作的丈夫时，孩子刚刚出生几个月。为了照顾婴儿，她只好呆在家中。由于双方父母都在国内，在这里缺乏外援，她觉得生活一片混乱。每每看到先生下班后还要拖着疲惫的脚步去做饭，她很过意不去。一天，当她趁小孩睡着去准备晚饭时，孩子悄悄爬起时碰翻了开水，烫伤了手臂。看着小孩手臂上的泡，她自责不已，决定回国和父母一起给小孩更好的照顾。回国原因只有一个。她说：“在这里，照顾小孩就吃不上饭。”³⁴

林云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财会系。1996年加入丈夫。起初她在一家私人公司上班。2002年怀孕四个月时，她辞掉工作。此后三年里，她生了两个小孩。一人同时照顾两个小孩，她感到力不从心。2004年，她也回到宁波老家，一方面减轻丈夫的压力，另一方面给小孩更好的照顾。

尽管具有高学历和热门专业，找到一份工作并非难事。但在工作和家庭无法兼顾时，她们选择了家庭。就像林云萍所说：“我希望陪着小孩成长”。³⁵ 孩子成为她们生活的首选。在这些案例中，没有男权的压迫，移民女性自觉扮演“好母亲”“好妻子”的传统性别角色。

Brenda Yeoh (eds.), *Gender and Migration*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2000), p.425.

³⁴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进行的个人访谈，文中女性名字为化名。

³⁵ 同上。

但并非所有家庭主妇都会如此坦然从容。有些女性成为全职家庭主妇是一种被迫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女性往往会感到十分迷茫。《扬时代》里有这样一个案例。晏青在1996年来到新加坡与丈夫团聚。抵新不久，就顺利地是一家IT公司找到了工作。可是在工作了7个月后时，她因为意外怀孕不得不辞职准备生孩子。生完孩子后，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晏青很难找到工作，只好从此在家里炒汇。尽管有了些收益，可她却感到十分迷茫。“在家里炒炒汇率、相夫教子，应该算是很美满的。但我一直问自己，是否要这样一直走下去？在异乡做一个烦琐的家庭主妇我还能撑多久？内心的孤独渐渐弥散的时候我感到烦躁，老公只是安慰我，‘孩子大些，你就会轻松些。’可我人生的意义真的只是对于老公和孩子吗？我个人的价值难道就只能在这里体现吗？”³⁶

2、工作女性，向女佣或父母求助

寻求女佣或父母的援助，是大多数工作女性的选择。例如，本地优频道前主播王熻青请了女佣来照顾自己的女儿。但是这样的安排要付出代价的。一方面，外国女佣不能替代母亲对孩子进行有效的教育，另一方面，外国女佣与孩子相处融洽，也可能威胁母亲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与形象。王熻青说：“家里的佣人充当起妈妈的工作。所以当她的（其女儿）晚上睡觉不要我，宁愿要佣人陪她睡觉时，我想当时我的心情还是很复杂的。”

³⁷

在经济和其他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有些女性把父母从国内接来，以把自己从养育小孩等家务中解脱出来，投身于劳动力市场中。在一个案例中，来自北京的吕老师在2001年带着外孙女加入在新加坡工作的女儿、女婿。她女儿认为：“我们能三代同堂，关系融洽的关键是都爱这个家。母亲的无私奉献解除了我们儿女们的后顾之忧，使我们能在异国他乡幸福地生活。”但将父母从国内接来，三代同堂不可避免地出现家庭关系复杂的局面。吕老师女儿承认：“矛盾怎能没有呢？我和老公对母亲的看法是一

³⁶ 郝老师〈远离迷失，感受生命的精彩〉，见《扬时代》2004年3月、4月刊，页33—

34。

³⁷ 清苇〈与嫣青有约〉，《扬时代》2004年11月、12月刊，页22—23。

致的，就是首先要尊重老人。遇到问题，我先和老公商量解决，再跟母亲解释。”³⁸ 但并非所有家庭都能像吕老师一家这么幸福。在同篇文章中，同样来自北京的另一位老太太，也是为照顾外孙女，来到新加坡加入女儿一家。她退休前也是中学教师。由于职业习惯，她在家里爱唠叨。女婿受不了，家里挑起了战争。由于女儿李静站在母亲一边，女婿提出离婚。为了女儿婚姻完整，老太太不得不黯然回国。³⁹

3、夫妻轮流照顾小孩

有些夫妻的工作时间比较灵活，可以轮流照顾小孩。例如：一对夫妻均为国立大学在读博士，分别在不同的学院就读。由于多数时间自己做研究，仅有少数时间需要去学校，两人就自己照看小孩。当需要做田野调查时，丈夫先出国半年，再轮到妻子出国做田野调查。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有这样的灵活时间的人只占很小的比例。这种懂得分工合作的夫妻，通常感情较好，双方共同付起养育责任，地位比较平等。

一般而言，在新的国度里，生育抚养问题变得较移民前更为困难复杂的情况下，抚养幼儿的重担使女性要么更多地退回家庭，要么寻求佣人或父母的帮助。移民女性大多比男人承担更多的教育责任。她们对家庭付出很多，也更加依赖家庭。固然，女性更加依赖家庭，不同的家庭具体原因不同。例如：孩子的托儿费比妈妈的薪水低不出多少；妈妈希望给孩子更好的照顾等。但从根本上来说，女性更加依赖家庭这种现象的广泛存在有其深刻的生理因素和社会根源。

二、女性更加依赖家庭的生理和社会根源

1、生理因素

李银河认为：“在19世纪，一种普遍为人们所接受的理念认为，女性有特殊的素质，比如生育和抚养子女就是女人的天性。因此女人的天职就是留在家中生育和抚养儿女。”⁴⁰ 卢梭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他认为男女两性的特质和能力是不同的，这种生理上的差别决定了两性在社会中

³⁸ 峻凌〈女儿的天平，母亲的心〉，见《扬时代》2005年4月、5月刊，页6—7。

³⁹ 同上。

⁴⁰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页121。

扮演的角色不同：男人成为公民，女人成为妻子和母亲。这种观点受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者的猛烈抨击。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第二性》认为：妇女解放与做母亲二者相互对立，而生育是女性受奴役的直接原因。因为“母性毕竟是使妇女成为奴隶的最技巧方法……只要人们仍然认为妇女的主要工作便是养育小孩，妇女便不会投身政治、科技。进一步说，她们便不会怀疑男人的优越性。”⁴¹ 激进女性主义者在此问题上更为激烈。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其代表作《性的辩证法》中认为，生理原因造成妇女受压迫。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人类一些永存事实：婴儿的成熟期较长。在很长的时间里，婴儿要依赖母乳才能生存。而生育使妇女在很长时间里，不得不依靠男人才能生存。⁴² 总而言之，尽管女性主义者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观点各异，但都认为女性的生育抚养责任与女性受压迫的社会现实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在移民研究中，引进女性主义者关于生育抚养的理论，具有特殊的意义。其原因在于：首先，由于中国实行严格的“一胎”政策，渴望拥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高学历夫妇往往因此而选择举家出国。其次，移民后，抚养责任的承担往往使女性处境更为艰难。许多高学历女性被局限在家庭中，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不得不靠丈夫才能生存。

在新加坡，女性的产假比中国少得多（中国一般为六个月，新加坡直到2004年才从两个月改为三个月），在公司无法请假或双方父母不能前来本地的情况下，女性往往不得不辞职回家照顾幼儿；由于生理因素，女性跟男性相比，在事业上占据不利的位置，因此也更需要家庭。正象新移民王嬾青看到的：“美貌是天生的，青春是短暂的，不可能靠努力获得，并且它们像权力一样都是过期作废的……女人易老又要持家生孩子，不可能赚一辈子的钱。”⁴³ 而男人却可以在外面打拼，不受生理的限制。既然生理上决定了要有一段时间里离开劳动力市场，女人也就至少在生育的时间里要靠丈夫而活。在加入劳动力市场前，那些持依附者准证加入丈夫

⁴¹ 同上，页 132。

⁴² 同上，页 135。

⁴³ 王嬾青〈只要你的精子〉，《联合早报》，2005年11月26日。

的妻子通常都需要经过一段或短暂或漫长的等待期，再加上生育的时间，她们依赖丈夫的时间较长，因此也就更加依赖家庭。很多女性认识到这一点，自觉地扮演好妻子、好母亲的角色。就像在访谈中，一个女移民说的“工作上的事情，你不是无可替代的；而在家里却非你不行。”⁴⁴

2、社会根源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对现代社会做出了激烈的批判。他指出，“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体都受到极其严厉的权力的控制。那些权力强加给它各种压力、限制或义务。”权力通过各种方法“使得人们有可能对人体的运作加以精心的控制，不断地征服人体的各种力量，并强加给这些力量以一种柔顺——功利关系。这些方法可以称为规训。”⁴⁵ 福柯将权力对身体的统治概括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人类身体为中心的，由人文科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将身体功能标准化；另一种则是由人口生理政治中运用的调查统计方法来监测和管理人的生与死、健康水平以及预期寿命等等。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身体被权力搞得相当驯服，规训的目的在于使身体具有生产性和生殖性。传统社会对身体的惩罚是极其残酷、醒目的；现代社会对身体的规训则表面上看去并不明显，实际上却渗透到日常生活当中。⁴⁶ 为了更好地阐述“惩戒凝视”（Disciplinary Gaze）的思想，他用“环形监狱”的比喻这样描述道：“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⁴⁷

福柯的“惩戒凝视”的思想被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运用到研究中。在她们看来，女性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压力之下，不仅要服从纪律，而且要遵从规范，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的身体。”例如，女子去做隆胸术，

⁴⁴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的个人访谈。

⁴⁵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页135。

⁴⁶ 同上，页185。

⁴⁷ 转引自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页184。

从旧式女权主义的逻辑来看就是：男人命令女人为愉悦自己而做这个手术，女人是男人权力的受害者。但运用福柯的“惩戒凝视”思想来看就会有不同的解读：女人去做隆胸术不仅是男人压迫她的结果，也是她自己的自我管制，自我统治。在生育的问题上，她们认为“女性的心理为社会所强加”。⁴⁸ 换句话说，抚养小孩并非女性的永恒责任。女性扮演一个好母亲的角色，是社会凝视以及自我凝视的结果。

这些理论给笔者带来很大的启示。Nicola Piper and Mina Roces 指出：“移民法律常常不给女性以单独的法律地位，而是主观上认定她们是依赖于男人的。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移民法律是有性别的。”他们也认为法律的一些概念反映了社会上的一些共同价值和观念。⁴⁹ 在这里，Katie Willis and Brenda Yeoh 认为：“在1999年以前，新加坡移民法律允许外国出生的妻子进入，却否认外国丈夫的进入权。”这种法律上的性别差异反映了本地社会视男性为赚钱养家的一家之主、女性为依附者的观念。“尽管新加坡的性别规范对男性和女性都有限制，但对女性的期望和控制更为严厉。”⁵⁰ 无论是中国还是新加坡都存在着一种既定的家庭性别秩序。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为女性制定了“好妻子”、“好母亲”的标准，女性只有符合这种标准才是“正常”，反之就是“不正常的女人”。女移民承担了更多的照顾幼儿、教育孩子的责任，在很多情况下是社会约定俗成的。例如，王嬾青对社会提出质疑：“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其实完全是男人的教育，一样争学分，一样进职场，结果呢，他们可以专心事业，我们却

⁴⁸ 同上，页 185。

⁴⁹ Nicola Piper and Mina Roces, “Introduction: Marriage and Migration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Nicola Piper and Mina Roces (eds.), *Wife or Worker? 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 (Lanham :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p.15.

⁵⁰ Katie Willis and Brenda Yeoh,, “Gender , Marriage and Skilled Migration: The Case of Singaporeans in China”, in Nicola Piper and Mina Roces (eds.), *Wife or Worker? 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pp.101-119.

还要兼顾家庭。而学校里并没有教我们该如何处理婆媳关系和换尿片！”

51

生育责任作为生理原因客观上使女性在新环境里不得不依靠自己的配偶才能生存，因此很多女性心甘情愿地投入到婚嫁这个一辈子的职业上去。在她们眼中，对家庭更多的付出是值得的。但是她们这种自愿牺牲也有社会凝视、以及女性自身内化凝视的因素。她们用男性制定的“好妻子”、“好母亲”的标准凝视自己、监督别人，并依靠家庭在异国生存。

第四节 结语

在本研究中，家庭作为个人与社会间的中间单位在女性移民本地的过程中举足轻重。前文探讨了一些与女性的家庭密切相关的核心问题，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在移民前，移民决定的作出多是家庭成员共同协商的结果，以家庭利益为主要考量。多数女性持依附者准证入境的事实并不代表她们被动地参与移民过程。事实上多数移民女性都积极卷入了移民决定，她们并非单纯意义上的“追随丈夫的妻子”。由于她们往往作出与丈夫同样的决定，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其作用常常被忽视。在这项有关家庭长远利益的重大决定上，仅有18.42%是男方自行决定，与女性自行决定的比例大致相当，这说明男性并没有呈现出太多的性别优势。男性的家长权威在这里并不明显。由于多数女性文凭学历不输给丈夫，她们拥有同样的智慧和能力为自己和家庭的未来作出明智的决定。

其次，多数人的家庭地位在移民前后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本地仍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以及新移民学历层次较高等因素有关。在这里，由于中国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文化的影响，女性自觉地或被迫地承担了多数家务，但她们并不认为家务工作量是衡量家庭地位的一个指标，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家庭事务决策权。移民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家庭地位的变化，在一些女性眼中，生育、家庭关系、知识学历上的差距等

⁵¹ 王嬿青〈只要你的精子〉，《联合早报》，2005年11月26日。

都可能导致自己家庭地位的变化。移民总体上对男性的家庭地位较为有利。这也与女性在移民后更多退回家庭，而男性则更多地被推倒前沿为家庭打拼有关。

最后，在移民后，照顾幼儿等家庭责任多由女性扛起，这直接影响了她们对新环境的适应情况。在缺乏外援的情况下，她们对家庭投入更多的精力，甚至退回到家庭中去，不得不更多依赖丈夫。无论她们主动还是被迫地投身家庭，除了生理因素外还有社会“凝视”的作用。在社会既定规范的影响下，移民并没有为女性带来更多的解放空间，反而使她们更多地羁绊于家庭。依靠家庭，从家庭中汲取力量来面对这个陌生的新环境。反之，移民将男性更多地推到社会上，使男性得到更多的历练，从而更为独立，更有魄力迎接未知的挑战。

第三章 移民与婚姻

在传统移民研究中，移民从第三世界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往往被认为是由于经济因素或工资差异。直到最近，“对性别研究敏感的人或女权主义者，才开始将视角转移到刺激移民的非经济因素。但是移民对婚姻关系的影响并没有在他们的多重视角中得到充分的阐述。”¹ 对中国新移民的研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一方面，通过婚姻关系嫁到国外的人往往被视为经济利益的追求者，女性出国的其他原因被忽略了；另一方面，由于过于强调经济动机，学者们很少去关注女性自己对婚姻的理解，也很少研究移民对她们的婚后生活施加了怎样的影响。笔者认为，在对本地新移民（尤其是女性）的研究中，婚姻是重要的核心问题，不外乎以下三点：首先，婚姻是女性对外移民的重要原因。38.2% 的女性被调查者承认，移民新加坡是为了婚姻完整；相反，仅有 11.76% 的男性为婚姻而移民。² 其次，与新加坡人或新移民的婚姻关系是女性得以进入此地的有利条件。在我们的调查中，52.64% 的女性调查者，是以新加坡人配偶或新移民配偶的身份入境的。相反男性调查者却无一人凭此入境新加坡。³ 最后，由于较多女性持依附者准证入境，其法律地位相对脆弱，因而保全婚姻的渴望往往比在法律上所依附的丈夫更为强烈。

那么，什么是婚姻？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对其定义的内涵与外延有所不同。在西方，许多国家要求重新定义婚姻的焦点在是否允许同性结婚上。例如，2005年4月9日，约有两万五千名来自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渥太华的加拿大人在首都国会山集会，抗议加政府提出的更改婚姻定义，使

¹ Nicola Piper and Mina Roces, “Introduction: Marriage and Migration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Nicola Piper and Mina Roces (eds.), *Wife or Worker? 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pp.1-23.

²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 2005 年 3 月开始的社会调查。

³ 同上。

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一项法案。⁴ 但就中国而言，中国政府对婚姻虽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各种社会权威教材都在一点上达成共识：婚姻是男女两性的合法结合。中国否认同性婚姻，强调婚姻的合法性。当然这并非无懈可击，例如：那些举办过传统结婚仪式、却没有进行婚姻登记的男女之间，是否是一种婚姻关系呢？但由于来到这里的移民夫妇的夫妻关系必须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所以本文的讨论也排除同性婚姻以及不受中国法律保障的事实婚姻。

本章关注的是凭借婚姻关系进入此地的中国女性（包括嫁给新加坡人或新移民的女性），它试图阐述三个问题：当代女性通过婚姻关系来到新加坡的动机是什么？她们以何种方式进入涉外婚姻（本文特指中国女性与新移民或新加坡人的婚姻）？移民对其婚姻产生了何种影响？

第一节 女性凭借婚姻关系进入新加坡的动机

一些学者认为，亚裔妇女嫁往发达国家，经济原因是唯一的考量。

⁵ 但是当我们考察中国女性的动机时，这个论断很成问题。我们发现，女性凭借婚姻关系进入新加坡存在多种原因，一些并不直接与经济因素有关：如为与丈夫团聚，为事业前景，为在新加坡接受高等教育，喜爱新加坡的环境等。

一、有些女性来到新加坡是为了与丈夫团聚

根据笔者的调查，在以新加坡人或新移民配偶身份入境的女性中，60%的人都表示出国是为了与丈夫团聚。这在各种原因中居首位。⁶

⁴ <25000人国会山集会反对更改婚姻定义>，见《大纪元》，2005年4月12日。

⁵ Tomoko Nakamatsu, "International Marriage through Introduction Agencies: Social and Legal Realities of Asian Wives of Japanese Men", in Nicola Piper and Mina Roces (eds.), *Wife or Worker? 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p.186.

⁶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的社会调查。

这反映了很多中国女性都将婚姻视为生活第一要素。“（工作）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念仍然具有很大的市场。在一个案例中，Annie 曾在90年代留学新加坡，这期间认识了新加坡籍男友，两人相爱。后来，她拿到英国一家著名大学的奖学金，远赴英国读书。在英国的两年里，两人的爱情不仅没有随着距离的遥远而降温，反而走向成熟。在她毕业前夕，他们结婚了。但是，婚后的 Annie 被上海的一家国际大公司看中，她选择将自己的事业放在上海，两人过起了中国、新加坡两地分居的生活。上海的生活安逸舒适，用 Annie 的话说，“蛮‘小资’的。”先生仍然每天晚上打电话给她，而她全力在事业上冲刺。一次，在她利用中国节假日来新探望先生时，无意中看到先生的抽屉，突然间被触动了。“看到一抽屉的电话卡，体会到每次他送我入海关时依依不舍的心情，我动摇了。想来想去，终究觉得不能因为这可估计的事业而毁掉无可衡量的家庭。周末考虑了两天，周一在公司做完晨训后，我毅然向老板呈交了辞职书。作出这个决定后，我感到很轻松。”⁷

二、接受更好的教育，是一些女性来到此地的主要考量

自1978年以来，越来越多中国学生到海外留学。含金量更高的文凭给他们的事业带来了广阔的前景。他们的榜样作用鼓舞了很多中国大学毕业生。由于新加坡的大学知名度高，用英文教学，便于学生毕业后融入国际环境，而且学费相对西方发达国家低，奖学金比较容易申请，所以有些年轻夫妻在作出移民决定时就有了这种考虑。在笔者的调查中，35%的女性移民新加坡是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⁸ 在丈夫以工作准证或学生准证身份到新加坡后，妻子就通过婚姻关系入境新加坡，然后向当地大学提出申请继续深造。若是已经成为永久居民，妻子付的学费也较少。通过接受英文高等教育的方式，女性为自己的事业打好根基。在一个案例中，1995年，小雨的丈夫被公司外派到新加坡。当时小雨正在国内读硕士没有随行。一年半以后毕业前夕，她向新加坡国立大学提出申请，顺利拿到奖学

⁷ Annie〈Annie重返新加坡〉，见新加坡家园物语网站《新加坡的中国女人》专题，

<http://www.4sgfamily.net/ShowArticle 2.asp?Article ID=315>。

⁸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的一项社会调查。

金来到这里。对她来说，尽管夫妻团聚重要，但是能让自己做一个经济独立、积极进取的现代女性更为重要。她说：“其实我们将来会在哪里定居还是一个未知数，未来有无限可能。我和先生都认为，为了将来必要的牺牲是值得的。当前夫妻团聚不是最重要的，让自己羽翼丰满未来更有本领去选择才是最重要的。”⁹

三、有些女性来到新加坡，是为了更好的事业前景

在笔者的访问中，20%的新移民或新加坡人配偶选择新加坡是为了拓展自己的事业。¹⁰ 例如，雨林当初在中国时，为了上重点大学而选了社工“这个连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专业。”但是，“毕业找工作时才发现，根本就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只有忍痛放弃了学习了四年的专业。”在丈夫到新加坡满一年的时候，也就是2002年底，“我狠心把年幼的女儿丢在国内，以Dependent Pass（指依附者准证）的身份来到新加坡。因为思念老公，也因为我必须先到新加坡来找到我的事业基础。”到此地的第八个月，在已经不记得自己发出了多少份简历后，她终于找到了一份社工的工作。她说：“从不曾想到，最终是新加坡给了我在自己的专业上发展的机会。在新加坡，社工作为一种助人的职业，发展已具相当规模。渗透了福利、政府、学校和医院等各个领域，也因此提供了相当多的工作职位。呵呵，却不知我大学老师们若是知道我的境遇，会感觉讽刺还是欣慰了。”¹¹

歌唱家刘小红也是如此。刘出生于湖南衡阳，1979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音乐系；1984年获“衡阳之春”声乐比赛一等奖；湖南省“建设者之歌”最佳歌手奖和全国“建设者之歌”优秀表演奖；1986年获全国民族民间鼓舞调演三等奖；1987年，入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声院歌剧系深造；1989年在北京音乐厅成功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可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她爱上了一个酷爱音乐的狮城男人，毅然远嫁到了新加坡。这个选择除了爱

⁹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的个人访问，文中女子名字为化名。

¹⁰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

¹¹ “雨林”（网友名）〈狮城追梦〉，见新加坡家园物语网站《新加坡的中国女人》专题，<http://www.4sgfamily.net/ShowArticle 2.asp?Article ID=333>。

情的因素，也因为这里可以给她提供更多的事业机会。1991年，她接受新加坡南方艺术研究会的邀请担任该研究合唱团的声乐指导。1992年，在新加坡大会堂举办了个人独唱音乐会。目前担任新加坡南方艺术研究会合唱团、新加坡长虹艺术研究会合唱团声乐指导。她认为：“在新加坡从事艺术工作，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如果真能为本地华族音乐作些贡献，那种成就感是在（中国）国内所没有的。”¹²

四、有些女性选择新加坡，是因为喜欢此地的环境

25%的新移民或新加坡人配偶，表示来到这里是因为喜欢这里的环境。¹³ 例如，萧乐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硕士时邂逅了新加坡籍男友。在毕业时，她面临着留在香港还是跟男友回新加坡的难题。男友带她来新加坡旅行，她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的环境。她说：“香港空气污染太严重了。这里绿草如茵，空气清新，干净整齐。我当时想，如果能在这里生活一定很不错。”¹⁴

一般而言，女性通过婚姻关系来到这里，或许因一种动机，也可能是几种因素的结合。那种将女性视为经济利益的追求者的看法过于片面了。毕竟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找到很多个经济上女强男弱的例子。例如国际影星巩俐，年薪900万美元，而其丈夫本地人黄和祥为一个高级打工者。在经济上女强男弱，从结婚时就是事实。恐怕没有人会认为巩俐为钱嫁到新加坡，而逃脱当时不愉快的环境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当时巩俐刚刚与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结束了八年的恋情）。

Nicola Piper 和 Mina Roces 指出：“外国妻子能从跨国婚姻中得到同样国籍的妻子得不到的好处”。¹⁵ 除了嫁给新加坡人的女性外，嫁给新

¹² 肖洁〈映日荷花别样红——访旅新中国歌唱家刘小红〉，见《中国女子的新加坡》

（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2年），页40—48。

¹³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的一项社会调查。

¹⁴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的个人访问，文中女性名字为化名。

¹⁵ Nicola Piper and Mina Roces, “Introduction: Marriage and Migration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Nicola Piper and Mina Roces (eds.), *Wife or Worker? 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 (Lanham :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pp.1-23.

移民的女性们也同样如此。这种婚姻好处很多，其中一些与经济因素无关。我们不能将中国女性通过婚姻关系来到新加坡的动机过分简化为唯一的经济因素，她们在实际生活中恐怕有更加复杂的考虑。

第二节 涉外婚姻的促成手段

凭借婚姻关系来到此地的女性当中，一部分人的丈夫是新移民。双方在中国相识、结婚，后来丈夫出国，妻子跟随前来。这些婚姻可视为（中国）国内婚姻。另一部分是中国女子通过种种方式与在这里的新移民或新加坡人相恋、结婚。这部分可视为涉外婚姻。那么，背景差异如此之大、相隔如此之远，中国女性如何穿越国界走入涉外婚姻？

Nicola Piper 和 Mina Roces 指出，女性总被刻画为社会经济结构的牺牲品，“婚姻也许让女性在经济上更加安全。”¹⁶ 笔者认为，不能用传统意义的“牺牲品”来形容这些选择涉外婚姻的女性。与老一辈的女性无权选择丈夫、婚姻多由父母做主相反，她们自己选择丈夫，积极采用四种方法进入涉外婚姻。

一、通过中介机构相识、成婚

在新加坡，有些婚姻介绍所的顾客为在中国的女性。收费从 1000——3000 新币不等，介绍成功后不少还要另加红包。通常情况下，以女性持社交访问签证到本地相亲最为普遍。除了合法的婚姻介绍所外，也有的个人（既包括新加坡人，也包括一些新移民）跟在中国的婚姻介绍所或个人相互配合，共同从事这门生意。例如，《中国女子的新加坡》的一个案例中，一名上海新娘就是在嫂子的介绍下嫁给了一个本地男子，她给了嫂子两万人民币作为酬劳。¹⁷

在中国，由于近年来中国政府严厉禁止婚姻介绍所从事国际婚姻介绍，这反而刺激了利用网站来提供国际婚姻服务生意的火爆。这些网站扮

¹⁶ 同上。

¹⁷ 肖洁〈梦断狮城——一个上海新娘的悲惨遭遇〉，见《中国女子的新加坡》（新加坡：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2年），页8—18。

演了中介的角色，跟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各个国家的婚姻介绍所合作。例如中国新娘网，根据女性的不同要求收费不同。其中仅将征婚者资料放到网上一项，收费就从 240 元人民币到 700 人民币不等；帮征婚者在美国《国际日报》上刊登征婚广告要收取 5200 元人民币。所有这些中介在中新两国间共同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婚姻市场，从中赚取巨额利润。

一般而言，选择通过中介嫁往国外的新娘，有明确的非感情意图。而且教育程度低的以及离婚或寡居的中年女性更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进入跨国婚姻市场。中介机构的便利和高效率更可能使她们梦想成真。

二、通过亲戚朋友介绍

有些新加坡华人通过在中国的远房亲戚或朋友介绍认识自己的另一半。此外，随着中新建交，大批中国人来到这里定居下来。有些中国人也会把自己的亲戚朋友介绍给适龄的单身男移民或本地男子。例如，一个在深圳工作的新加坡男人恳求朋友介绍个中国女朋友，结果其朋友找到了从事新闻工作的饶巧巧。没见面之前，巧巧心里有点排斥，不愿意随波逐流涌出国门，但经不住朋友的劝说还是去相亲了。一见之下才发现这个新加坡男孩是如此没有心机，单纯可爱。她说：“事情的发展让我始料不及，当时只觉得丈夫是个可托付终身的人，也不敢想太多，反正是嫁鸡随鸡，也就这样豁出去了。”¹⁸

三、无中介，通过报纸、网站自己征婚

有些在中国的女性通过本地的报纸或新移民网站公开征婚。例如，在 2002 年的前 10 个月，有 19 名中国女子，通过新加坡报章公开征婚。年龄从 21 岁到 61 岁不等，职业包括工厂女工、会计员、文员、营业员，也有的是女商人，拥有自己的生意。在 2002 年 8 月 31 日，公开征婚的远在吉林的李晓莉说：“我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嫁给一个疼爱我、又有责任感的新加坡男人。”¹⁹ 此外，征婚的帖子在新移民的网站上也时有所见。例如，一个叫“花鱼”的网友这样写道：“我一直向往干净、文明的新加坡，希

¹⁸ 〈移民作家狮城打造幸福家庭〉，见《联合晚报》，2002 年 4 月 12 日。

¹⁹ 〈狮城中国新娘三大苦恼：被当狐狸精、经济不独立、生活压力大〉，见《联合晚报》，2002 年 11 月 3 日。

望有一天能嫁过去，在那边好好的生活。我会善待身边的一切，照顾好身边的人，我想我会为实现我梦想的人而为他做得很好很好，相信我。”

20

四、自己相识、相恋、成婚

随着中新交流的加深，双方人员交流的日益频繁，中新两国人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相识、相恋而走入婚姻。此外，自1994年互联网在中国登陆以来，随着中国网民的不断增长，跨国网恋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有些人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婚姻。在四川省的一项调查中，61.82%的网民承认曾经发生网恋。²¹ 虽然我们无法确知通过跨国网恋嫁到新加坡的人数，但这样的例子在周围人当中并不少见。

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女性主动积极地采取四种方式进入跨国婚姻，婚姻决定是由她们自己作出的，她们操纵自己的命运，为自己负责，显示出巨大的勇气。这与过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方式截然不同，也与“牺牲品”的被动、消极、无奈恰成鲜明对照，在此意义上她们不是牺牲品或是受害者。

第三节 移民对女性婚姻的影响

以婚姻关系入境的女性（包括新移民配偶和新加坡人配偶），其法律地位脆弱。她们可以靠婚姻关系申请上永久居民。若是离婚，在证件五年有效期内不会被剥夺永久居民资格，可是再续时就会发生问题。但是法律地位的脆弱不一定就能使她们对先生言听计从。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女人们总喜欢对丈夫说：“我的钱是我的，你的钱也是我的”，与此地一个中国男人所说的“太太们在努力争取平等自由的同时，把男人当成一棵大树的心态也从来不会放松”有异曲同工之妙。²² 这些话生动地概

²⁰ “花鱼”（网友名）《想嫁去新加坡的我！》，见狮城华人网

<http://www.sgchinese.com/bbs/dispbbs.asp?BoardID=19&ID=505857&replyID=&skin=1>。

²¹ 《61.82%的网民承认曾经发生网恋》，见<http://news.enorth.com.cn>。

²² 小麦〈“全职太太”：亦喜亦忧的选择〉，见《扬时代》2005年第4期，页11。

括了许多女性既要婚姻提供安全感，同时又要追求自身与丈夫平等地位的复杂心态。移民使婚姻遭受了冲击，使她们面对复杂的局面。但是在这些冲击面前，她们也积极主动采取措施，努力经营婚姻。

移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女性入境前夫妻的暂时分离，入境后女移民的适应情况，都可能对她们的婚姻带来一定的影响。总体来看，大致有感情更好、感情变坏两种情况。

一、感情更好

南洋理工大学郭建文副教授认为：“全球化时代，‘远距离’婚姻将越来越普遍。婚姻的坚固程度取决于一开始双方的投入程度以及之后的有规律联系的紧密程度。”²³ 在当代，互联网等多种通讯手段的使用使分隔两地的夫妻感情的维系变得更为容易。在1994年互联网引进到中国后，网民数量急剧增加。据统计，到2004年7月，中国互联网用户增加到8700万，位居世界第二，网上性别差距继续迅速变小。²⁴ 互联网降低了夫妻联络的成本，使长期的、有规律的、频繁的联络成为可能。而这种特别的努力，再加上夫妻双方具有一起分享人生的愿望，使得分离成为爱情的考验，夫妻团聚时的感情变得更好。例如，雨林的丈夫在2001年来到新加坡。在丈夫申请出国时，她已经有了四个月的身孕。他出国后，“我们不得不忍受夫妻分居千里相思之苦，而我们的女儿也在他来到新加坡后一个月出世了，他连女儿的第一面都没见得上。好在信息时代网络通讯发达，每日我与老公网路传讯，倒也苦中作乐，找到一点最初认识时网恋的感觉。”一年后，她来到新加坡加入丈夫，似乎在度第二个蜜月。

25

在这个案例中，夫妻在结婚前就有深厚的感情，双方有共同分享生活的愿望。他们共同作出移民决定，有风雨同舟的决心。因曾经彼此分离

²³ 薛建华〈女人，孤独的守望者〉，见《扬时代》2005年5、6月刊，页9。

²⁴ 《中国互联网用户增加到8700万，位居世界第二》，见

http://www.ab-da.com/news_show.asp?id=123www.sina.com。

²⁵ “雨林”（网友名）〈狮城追梦〉，见新加坡家园物语网站《新加坡的中国女人》专题，<http://www.4sgfamily.net/ShowArticle 2.asp?Article ID=333>。

过，双方更加珍惜婚姻，移民使爱情焕发了生机。女性虽持依附者准证入境，但在婚姻中与丈夫地位平等。保全婚姻的渴望对妻子和丈夫是同等存在的。在夫妻团聚后的日子，女方往往能为了家庭积极适应外部环境，也依靠家庭面对新世界的困难。

二、感情变坏

Maria W.L. Chee 在对台湾陪读妈妈的研究中发现，与丈夫分隔两国的经历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孤独、冲突争吵不断、不满，甚至离婚”。²⁶ 此地的女移民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下面，我们分别就卷入涉外婚姻的女性和在卷入中国国内婚姻后、跟随先生移民的女性两种情况分别讨论。

1、卷入涉外婚姻的女性

对那些卷入涉外婚姻的女性来说，移民新加坡后所带来的一些冲击使感情可能变坏。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可概括为由于虚拟世界的完美与入境新加坡后现实生活的缺陷，强烈的反差可能导致感情变坏。

在上节所列四种促成涉外婚姻的方式当中，互联网的应用已经非常普遍。那么，在移民过程中，这种迅速发展的技术的广泛应用对中国女性的婚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根据 Koo Chiew Tee，在网络世界里，身份（Identity）是与身体或物理特性脱离开来的，它是多重的和有伸缩性的。IRC（Internet Room Chat 网络聊天）存在前台和后台的区别。在前台，互联网为每一个使用者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好机会。这是一个自由世界，没有年龄、种族、宗教、身体等物理特征限制，聊天者们往往非常友好、热心、善良和幽默，他们隐瞒那些真实生活中的挫败，尽可能设法表达最佳状态。但是在后台（例如私人聊天或交换电子邮件），没有令人难堪的目光接触或其它令人尴尬的反应，人们不再刻意展示最好的自我，更可能泄漏一些真实生活中不开心

²⁶ Maria W.L.Chee, “Migration for the Children: Taiwanese American i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in Nicola Piper and Mina Roces (eds.), *Wife or Worker? 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 (Lanham :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p.149.

的细节。²⁷ 看起来这个虚拟空间，包含了往往与后现代主义相伴而生的碎片断裂、多重主体以及多种经验。它为女性提供了一个逃脱真实世界男性霸权的理想空间。那么，当我们讨论的对象是利用网络聊天进行联系、分处两个国家的恋人时，情况会怎样呢？

几乎所有的恋人都在私人空间里聊天或交换电子邮件，聊天转入后台。恋人们在后台的表现如何呢？在一个案例中，吴颖告诉笔者，在1999年，她在广州时在网上认识了在本地某大学读博士的先生。当时，网络世界里的男友是个活泼、善解人意的恋人，对她问寒问暖，倍加宠爱。双方都对网络里的恋人非常满意。半年后，男友飞回去跟她结婚，网恋修成正果。但在她来到这里真正开始婚姻生活后，却发现丈夫对自己十分冷淡，热情不再。原来，在跟她网恋的那半年里，他在现实生活中有个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由于无法说服他放弃“网恋”，他的女友愤而分手，并且很快就跟他同一实验室的师兄结婚了。他受不了这个刺激，就抢在女友结婚之前赶到中国去跟吴颖结婚。先生的隐瞒让吴颖大为受伤。她说：“以前在网上，他说我是他唯一的女人。他怎么能够在网上跟我谈情说爱，结果生活中还有一个女朋友？我还能相信他吗？”²⁸ 在后台，双方都掩饰了一些现实世界里不太让人愉快的细节，在虚拟世界里相互协商，达到了一种完美的境界。同时也对对方产生了美好的幻想，呈现出前台的一些特点。然而那些被掩饰的缺点一旦遇上现实生活就暴露出来，强烈的失落感就此产生，感情在婚姻的开始就要遭受巨大的考验。

在虚拟世界里，中国女性既作为客体又作为主体，积极地将网络视为社会资本与其协商。互联网的好处显而易见——它加速婚姻决定的作出。但是它的缺点也同样明显在——一个乌托邦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张力，不可避免地对新夫妻的婚姻生活带来威胁。在上面这个案例中，由于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强烈落差，女方失去了对丈夫的信任。虽然在法

²⁷ Koo Chiew Tee, *Exploring Internet Relay Chat (IRC):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a Cyber Sub-Culture* (Singapore: A Thesis Paper f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99), pp.10-14.

²⁸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进行的个人访问，文中女性名字为化名。

律上依附先生，但是她仍然坚持既要婚姻中的平等地位也要婚姻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她并不愿意妥协：“我要一个真正爱我的的人。我不管他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我努力挽救婚姻，若是做不到，我不后悔。”²⁹

2、卷入中国国内婚姻、跟随先生移民的女性

长期的分居，对婚姻伤害极大。若是经历了一段分居两国的日子，在夫妻团聚后没有作出特别的努力来维系感情也有可能婚姻变味。例如，在狮城华人网上，一个网名为“闷闷”的已婚女性倾诉了自己的烦恼。

“在孩子出生之前，我们（指她和丈夫）是恩爱的一对。直到我怀孕，他却来了新加坡。孩子两岁多时，我们也来到这边。不知道是分别得久了，还是因为孩子一直依赖我，我们一直分床睡：我和孩子睡，他一个人睡。久而久之，我们的关系就变成了无性婚姻。”她的母亲角色与一个妻子的角色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在双方分处两国的日子里埋下的。在家庭团聚后，丈夫没有作出特别的努力来使爱情常新。她曾坦白跟先生讨论过，结果无疾而终，心中充满了挫折感。两人之间十分生疏冷淡。她说：“我的矛盾就在于自我和家庭不能两全，我要健全的性生活是对自己负责，要维系家庭的完整是对家庭负责，可是对我来说，这两者就是一对矛盾。”³⁰

由于生理和社会等方面的因素，女性对孩子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在这个案例中，母亲角色与妻子角色在分居时处于一种对立冲撞的地位，再加上移民出国的严苛审批手续，更使她处于一种选孩子还是选先生的尴尬境地。她不得不艰难地在这两种角色中被迫抉择。但是家庭团聚后，她的自我牺牲就希望能有所补偿。她既渴望婚姻稳定又对婚姻不满，希望自己不仅是一个好母亲，更重要的是渴望丈夫尊重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权利。

总而言之，移民使婚姻经受考验，它对不同人的婚姻影响是不同的。套用一句俗语，对女性来说，“幸福的婚姻是相似的，不幸的婚姻各有各的不幸。”但无论是爱情因移民而得到重生的机会还是因移民而遭受巨大

²⁹ 同上。

³⁰ “闷闷”（网友名）《面对无性婚姻，我该怎么办？》，见

<http://www.sgchinese.com/bbs/dispbbs.asp?BoardID=44&ID=470692>。

的挫折，中国女性对婚姻的要求都显得比较严格。它既要能提供安全感，又要能够给予自己与先生平等的地位。这种观念是女性生理以及中国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在移民前，男女双方法律地位平等，这要求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移民后，不少女性在法律上处于弱势地位，这要求就显得十分矛盾。男人们被推到社会的前沿，为家庭打拼，而女性在对家庭的经济责任相对减轻的同时又似乎在给男人更大的压力，无视自己在法律上的脆弱地位。女移民对丈夫这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双重标准，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社会问题。

第四节 结语

对于凭借婚姻关系来到本地的女性的婚姻，从以上三节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那种认为女性从发展中国家移民到发达国家是由于经济因素的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笔者认为，女性选择婚姻的动机多种多样，例如为了追随丈夫、为了在国外受教育、喜爱新加坡的环境、追求更好的事业前景等，有些动机并不直接与经济因素有关。学者们在进行外部分析的同时，倾听女性自己的声音也同样重要。

其次，女性积极地通过多种方式卷入了涉外婚姻。这些婚姻，有通过中新两国的婚姻介绍所促成的；有女性自己通过报纸、网站征婚成功的；有亲戚朋友介绍促成的；还有自己在生活、工作中相恋、成婚的。无论何种方式，女性积极主动地卷入了婚姻决定。她们不再象老一辈的女性们那样，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自己的命运自己作主，显示出巨大的勇气。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不是社会经济制度下的牺牲品，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协商者。

最后，移民使女性的婚姻经受了一定的冲击。这种冲击会产生两种结果——一种是爱情重获新生；另一种是爱情遭受巨大挫折。移民后，不少女性的法律地位变得脆弱，成为先生的依附者，但她们并不愿意逆来顺受，对婚姻的要求十分严格：一方面要求男人继续充当法律上的一家之主，为家庭打拼；另一方面，也追求婚姻中的平等地位，从不放松从婚姻

中寻求安全感。这种心态是移民前女性生理上和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在移民后由于法律地位的改变，而变得矛盾突出。但无论怎样，女性在婚姻中并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依附者，她们显示出了自己的主体性。

中编 性别与移民：社会领域

第四章 中国女人与新加坡社会

从1990年中新建交后到1999年之前，新加坡媒体对中国女人的报道往往侧重负面新闻，追求耸动效应，中国女人与本地社会在媒体上表现为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尽管近年来媒体的报道已经比以前平衡了不少，但以往的一些负面报道在社会上的影响很难在短时间里消除。由于媒体舆论与公众舆论界限模糊，而且媒体也是中国女人与本地社会作为两个群体对话交流的主要平台，讨论二者如何通过媒体看对方，可以为我们考察双方在社会领域里的关系提供重要的参数。

何谓“他者”（Otherness）？尽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但一般都认为与“自我”（Self）相对。例如托马斯·麦克维利认为，“‘自我’由其对‘他者’的理解而创造出来；‘他者’因区别自我而创造出来。它们彼此创造，并维持彼此的经验，每一种均使对方成其所成。”

¹ “他者”是西方人在殖民扩张的过程中首先提出来的，实际上蕴含着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西方人将“自我”以外的非西方世界视为“他者”，“他者”往往代表野蛮和未开化的世界，与理性和文明的欧洲世界——“自我”相对。² 但这一对概念并不仅仅用于东西方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也可用于东方世界内部。“在一个民族强大，或自认为强大的时候，就很容易产生自我中心的思想，并以其权力话语来构建‘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强势的民族（或国家、社会）才有资格使用这种话语。一个民族或国家只要拥

¹ [美] 欧阳楨著、周发祥译《作为自我的他者——诗歌中的异同身份》，见《文学评论》，2000年第5期，页135—145。

² 参见林丰民《东方文艺创作的他者化》，见《国外文学》，2002年第4期，页25—33。

有足够的自信，就一样可以把其他的民族或国家视为‘他者’……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既是他们相互交流的必要前提，也是他们之间互为‘他者’的前提。”³

Daniele Joly 也认为：“占当地大多数人口的本地土著的民族特征，以保守而非现代、内视而非外向表现出来。但这种民族性的新形式正在卷入一个现代性的框架中。社会生活的解体和那些让政治制度遭受挑战的一般性社会危机就成为种族主义滋生的基本理由。经济的衰退、民族国家的危机和意识形态的崩溃，使当地占人口多数的土著感到不安全和茫然。随之，这个闭塞的民族就通过排斥外来群体而强化自己。对这个‘他者’的歧视和种族主义就被激化，建立在共同表现型差异基础上的种族主义就将其标准扩展到文化和宗教的差异上。”⁴ 尽管 Daniele Joly 的研究是对西方社会里属于不同种族的主流社会与外来移民之间的歧视来说的，但也适用于同一种族间。

在新加坡，有些本地人与部分新移民互为“他者”（尤其是在1999年之前），这种情况在媒体上表现非常明显。一方面，一些本地人拥有某种程度上的优越感，自视“高等华人”，以傲慢的态度看待来自贫穷国家的同族——中国新移民。这种“自我”与“他者”的意识，是以新中两国文化与社会经济制度上的巨大差异为基础的。首先，在文化上，新加坡发展出了不同于中国的、独特的融合东西方特点的多元文化。在这种文化下，这个城市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各项“世界第一”。对一些人来说，本地的文化是优越的、先进的；而中国文化是落后的、过时的；其次，新加坡建国以来的经济持续增长，使得这个弹丸小国经过短短三十几年的时间就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土生华人已经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享有富裕安定的生活。尽管祖先也来自中国，但随着第一代移民的凋零离世，华人与中国的感情已经疏远。很

³ 同上。

⁴ Danièle Joly, “Introduction”, in Danièle Joly (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 : Glob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Burlington, VT : Ashgate, 2004), p.4.

多人对于中国的印象还是停留在祖父、父亲当年离开时的描述中——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对新移民往往暗存偏见。在1990年新加坡与中国建交后，大批中国女人怀着好奇的目光登陆新加坡时，蓦然发现：她们竟是一些华人眼中的“他者”——“小龙女”。正如肖洁在编辑《中国女子的新加坡》时所说：“当我向来自中国的女性作者约稿时，她们无一例外地说了同一句话：‘希望这本书真能替我们中国女性正正名……什么叫做正名？用某种手段来修正别人对某种事物的某种错误看法，还来名声的清白。如果我们原本就是洁白的，还用‘正’和‘还’吗？于是我越发觉得这本书的编写具有它特殊的意义。”⁵

而另一方面，一些有着不愉快经历的中国女性也将新加坡视为“他者”——罪恶之城。本地人微风看完了中国女作家九丹以其在新加坡的生活为素材所写的《乌鸦》一书，不禁感叹“被其以新加坡这‘花园城市’为背景，展开的一幅新中国移民的‘他人即地狱’的沉重生活场景而压得喘不过气来。”⁶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女人被“他者化”的过程中，媒体的炒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媒体对社会的影响，王雄认为：“新闻舆论具有较大的权威性和导向性，其活动有明确的价值指向。新闻媒体是社会公众的‘耳目’和‘喉舌’，能够迅速传播社会中新近发生的事实，也能够极大的范围内传播某种意见和观点，它在客观上已经具有为公众‘立言’的功能，是当然的社会‘舆论领袖’。媒体也因掌握相当多的社会资源，其权威性自不待言。”⁷ 在新加坡，媒体与社会的联系尤其紧密，媒体是社会的窗口。由于国家小，市场上只有三份华文报纸：《联合早报》、《联合晚报》以及《新明日报》，均属于报业控股

⁵ 肖洁〈编者的话〉，见《中国女子的新加坡》（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2年），页1。

⁶ 微风〈花园城市之梦：实话，总是伤人的！〉，见《新明日报》，2001年5月31日。

⁷ 王雄《新闻舆论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页22。

集团，而电视频道也控制在新传媒集团手中。媒体因少而使公众注意力集中，轻而易举发挥对本地大众的引导作用。

那么，中国女人被“他者化”是如何从媒体视点变为公众观点的？“自我”与“他者”是如何相互转化的？二者在现实中是如何相互映照、相互疏离的？

第一节 “小龙女”——被“他者化”的中国女人

何谓“小龙女”？《乌鸦》的作者九丹给出了一个定义：“中国女孩在新加坡被称作‘小龙女’，我想更确切的意义上是：使尽招数，不惜出卖色相以达目的。如一个新加坡文人描述的：‘以龙的精神不屈不挠地向新加坡男人索要钱财。’”当笔者对“小龙女”这一名称追本溯源时发现：它在新加坡社会的广泛传播，很可能起源于媒体。而媒体在使用中往往是不加选择的，甚至是非常轻率武断的。无论是否出卖色相，来自“龙之传人”国度——中国的女子就是“小龙女”（其意义指向第三者），隐含着媒体人深深的成见。

很多人认为，“小龙女”这一不雅名称，是从狮城媳妇施昉离婚案开始，进而扩展到指所有的中国女人。但是这一名称，事实上在这之前就已经出现。施昉离婚案见于报端是在1995年7月。而在1995年4月，《新明日报》就已经出现了“小龙女”这一称呼，在这篇题为《月赚数千：龙女跳龙门，大马捞够本》的新闻中，记者写道：“中国‘小龙女’目前已成为寻芳客的新口味，一些淫媒集团也趁此热潮以各种途径引进‘小龙女’，使她们成了这个市场的‘后起之秀’”。⁸ 在这里，“小龙女”泛指中国女子，具体从事卖淫业。由于新闻为从马来西亚吉隆坡报章转载，这说明“小龙女”这一词很可能是从马来西亚引进的。在新加坡本地，从事色情交易的中国女子第一次走进媒体视线是在1995年4月24日。在《新明日报》第六版《西区一组屋：藏着4‘二奶’》的新闻中写道：“如今，这股中国二奶风也悄悄吹进本地。据

⁸ <月赚数千：龙女跳龙门，大马捞够本>，见《新明日报》，1995年4月3日。

悉，在西区某座组屋，就同时住着4个‘二奶’”。对这些女子的描述是“都是持学生准证的小龙女；有的已婚，有的未婚；每月零用3千到6千。”⁹ 在这个新闻中，“小龙女”一词同样指中国女人，从事的是色情交易。在1995年7月19日，狮城媳妇施昉离婚案的报道中，媒体使用的名词为“中国女郎”。新闻中这样写道：“30岁的施昉与本地富家子许丕发结婚近一年多，婚姻便亮起红灯。去年1月26日，两人以离婚收场。当时，法庭还下令许丕发必须每月付2300元赡养费，以及一笔4万4700元一次过的款额给施昉。过后，施昉以2300元赡养费不足以应付日常开销为理由，入禀高院，争取更多的赡养费以及其他婚姻资产，案件还未了结。”¹⁰ 但在1995年8月14日的新闻中，《联合晚报》直接称呼施昉为“小龙女”，使得这一名称的使用，从从事色情生意扩展到争取权益的狮城媳妇。¹¹ 五天后，《新明日报》登载了一篇题为《单身桃太郎急征小龙女》的新闻，文中写道：“虽然日本是个经济大国，国内有钱人又不少，但是口袋满满，爱情生活却交白卷的男士，却大有人在。于是有些生性内向害羞、却急于找另一半的男士，转面向深圳一家由中国人经营的婚姻介绍所求救。”¹² 这则新闻把日本单身男人贴上“桃太郎”（色情的日本人）标签的同时，也将“小龙女”一词扩展到在中国的单身女子，显示了媒体的轻率与武断。1995年9月1日，《新明日报》登载了《为6‘小龙女’16大汉酒廊外大打出手》，新闻中写道：“当晚，他（指律师）的当事人带了六名中国女郎到酒廊去，结果这6名‘小龙女’成了众人目光的焦点，因为要‘与龙共舞’导致了误会，发生了群殴事件。”¹³ 这则新闻把跟朋友一起上酒廊娱乐的中国女子也归类到了“小龙女”中。随后，第二天，《新明日报》登载《8“小龙女”酒廊偷赚》，“小龙女”指的是在酒廊当

⁹ <西区一组屋：藏着4“二奶”>，见《新明日报》，1995年4月24日。

¹⁰ <中国女郎大骂律师是骗子>，见《新明日报》，1995年7月19日。

¹¹ <索赡养费小龙女：我要34万，半间洋房>，见《联合晚报》，1995年8月14日。

¹² <单身桃太郎急征小龙女>，见《新明日报》，1995年8月19日。

¹³ <为6‘小龙女’16大汉酒廊外大打出手>，见《新明日报》，1995年9月1日。

服务生的中国女学生。¹⁴ 到此为止，“小龙女”尽管全都出现在负面新闻中，但并不具备今天公众心目中那种明确一致的意义——“色情交易、第三者”。由于它所指范围太大，没有根据从事色情交易行为的女性也被囊括其中，可以说在使用中一片混乱。

那么，“小龙女”到底从何时起被统一赋予今天公众心目中这种明确的“色情交易、第三者”的特别意义呢？接下来的一则关于“小龙女”的新闻给我们提供了有用的线索。在12月24日《新明日报》登载的一则新闻中提到新传媒即将开拍一部电视剧，剧中将会有两个中国“小龙女”，剧中角色均被指派为第三者。¹⁵ 这则新闻说明：在使用上的一片混乱中，是谁让“小龙女”这一字眼有了明确的意义——“色情交易、第三者”。笔者认为，电视剧的播出让“小龙女”等于“第三者”的印象深入人心。

从以上对1995年4月到1995年12月长达九个月的关于“小龙女”的媒体报道的回溯中，我们可以发现：1、反映新加坡本地现实的新闻中，明确从事色情交易的中国女子的报道仅有一则（《西区一组屋：藏着4“二奶”》）；2、无根据从事色情交易，却被冠上“小龙女”标签的本地新闻多达五则。由此可见，“小龙女”应该指的是“中国女人”，而不是“从事色情交易的中国女人”。

为什么笔者不厌其烦重新回溯10年前发生的这些旧事呢？因为这些新闻对本节的论点十分重要：媒体引导了新加坡社会部分公众，将中国女人视为他者“小龙女”，而“小龙女”从事色情交易、当第三者，由此中国女人均有了从事色情交易的嫌疑。这种成见让本地多数正当生活工作的中国女人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在媒体应对社会起何种作用的问题上，王雄认为，理想的媒体舆论往往较之公众舆论更为冷静、客观，更合乎事务自身发展的逻辑，因而更接近真理性判断。它在表达的理论水平和思辨程度上高度自觉，并且

¹⁴ <8“小龙女”酒廊偷赚>，见《新明日报》，1995年9月2日。

¹⁵ <《5c老公》反映征婚奇趣，“小龙女”现身说法>，见《新明日报》，1995年12月24日。

能够“过滤”和加工来自民间的意见诉求。“公众舆论中那些偏激、狭隘、缺乏理性和属于情绪发泄的成分就有可能被‘过滤’掉，而那些代表民众共同意见的倾向则会被凸显出来。因此，新闻媒体不仅是社会事实的‘过滤器’，也是社会意见的‘过滤器’，它对公众舆论所进行的‘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滤和加工，是一个理性化和思辨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进入媒体并融入新闻舆论的公众舆论提升到自觉的高度。”¹⁶ 在对社会新闻的报道中，媒体应避免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显然，在对中国女人的报道中，本地媒体还是处于纷纷攘攘的大众舆论阶段，侧重负面新闻的报道，追求耸动效应，在喧扰中失去了方向感，无法理性、冷静、客观。

那么，媒体的观点怎样对大众发挥影响呢？铺垫效果理论阐明了人类认知的来源和结果，很有启发性。根据 Susan T. Fiske, 和 Shelly E.

Talyor, “铺垫效果描述了以前的语境对新信息的诠释所造成的影响。”对这一效果有几种解释模型：一种是 Higgins 和 King 提出的激活模型，这一模型认为，如果最近或者持续受到某种信息刺激，这一信息或概念的潜在活力就会非常强大，将对新的信息产生影响；另一种是 Wyer 和 Srull 提出的存取模型，认为人脑的记忆就像一个一个的储藏箱，某个信息或概念的使用频率越高，那么它就会放在最容易拿到的地方，也就是位于顶端的箱子。第三种是 Collins 和 Loftus 提出的网络模型，认为人类的记忆是一个意义网络，某个刺激会与相关的信息和概念建立联系，就像电流传导一样，在一定时期内影响其它的信息朝着同样的方向发展，产生相同的意义。¹⁷ 铺垫效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刘海龙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把人脑信息处理的中间过程看成是一个黑箱的话，铺垫效果可以简化为下述模式：如果某个人最近接受到了某个

¹⁶ 王雄《新闻舆论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页22。

¹⁷ 刘海龙〈译后记：议程设置研究发展的重要一环〉，见 Shanto Lyengar and Donald R. Kinder 著、刘海龙译《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页223。

信息或者经常接触某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就成为最方便获得的信息，在遇到新的信息刺激时，这些旧信息就会努力让新到来的信息与之建立联系。”¹⁸ 而在实践中，美国学者 Shanto Lyengar 和 Donald R. Kinder 为了考察电视新闻对人们选举总统的影响，用了八年的时间，对几百个不同背景美国人进行实验。他们发现：当电视新闻把报道的重点放在国防上的时候，受到电视影响的公民会把国防问题作为评价一个总统表现的主要标准；当媒体焦点在通货膨胀的时候，公民又把是否能够降低物价作为评价总统政绩的标准。当对一个复杂的现象进行判断时，人们不会全面考虑他们所了解的一切，其判断来自第一感觉，突然浮现在脑海中的政治记忆碎片。电视新闻是能够决定在大众脑海中闪现什么的最重要的力量。通过铺垫效果，事先强调国家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忽略另外一些方面，电视新闻把人们的政治判断和政治选择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他们的实验证明了李普曼提出的命题：新闻媒体对人们不可能接触到的政治世界的描述，对人们具有重大的影响。而新闻的观点，最终会变成大众的观点。¹⁹

具体到本地，在 1999 年之前，媒体报道中国女人时主要侧重负面新闻，“小龙女”是最常见的字眼。这些负面报道在一些公众的脑海里留下了一些记忆碎片。当以后遇到新的信息时，他们的判断往往不会那么全面、理智，而是很自然地将新信息与旧的记忆碎片相联系，同样潜意识中就会出现以往关于“小龙女”的报道，从而也将新的信息与“色情交易、第三者”相联系。通过铺垫效果，中国女人被幻化为“他者”——“小龙女”，与“色情交易、第三者”有不解之缘。

但应该看到的是，大众舆论并不是铁板一块。媒体报道中的“自我”与“他者”的相互冲突，能够部分反映现实，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疏离。在生活中，很多本地人对中国女人都很友好。在访谈中，有些新移民表示与周围新加坡人相处和睦，在本地的经历都很愉快。

¹⁸ 同上。

¹⁹ Shanto Lyengar and Donald R. Kinder 著、刘海龙译《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年），页 1—9。

第二节 《乌鸦》风波

1999年之前，媒体的炒作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女人的整体形象。虽然“小龙女”这一名称在近这些年来几乎从媒体上绝迹，但在坊间仍然有一定的市场。一些有着不愉快经历的女性也将本地人视为“他者”。曾留学狮城的中国女作家九丹在《乌鸦》一书中，“针针见血地剖析了这些他乡女子在被归类为‘小龙女’后不平衡的心理状态”，²⁰ 反映出一些本地公众与部分女移民互为“他者”的现实。

《乌鸦》的作者是曾出版了长篇小说《爱殇》与《漂泊女人》的中国女作家九丹。九丹原名朱子屏，江苏扬州人。1990年从中国新闻学院毕业，1995年留学新加坡。在本地学习和生活了5年之后，于2000年回国。在《乌鸦》一书中，九丹用刺耳的声调，揭示了一些女移民眼中新加坡的黑暗一面。王瑶芬、海伦等一批中国女大学生，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盲目地来到新加坡。但在残酷现实的压力下，她们丧失了人生方向，一步步沦为妓女、情妇。肉体成为这些令本地女人鄙夷又恐惧的中国“小龙女”谋生的主要工具。为了在这个纸醉金迷的城市活下去，她们不择手段、勾心斗角，满身伤痛。在作者笔下，新加坡不是一个“花园城市”，而是一个罪恶之城，给中国女子带来的只是深深的伤害。这本小说在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一些本地人群情激昂、口诛笔伐，炮弹落处难免刺伤整个中国女人群体。于是，一些新移民也加入了争论。根据笔者统计，从2001年5月31起的一个月中，关于《乌鸦》的新闻与评论共计52篇（仅指三大华文报上正式发表的文章，不包括数量庞大的网上评论），平均每天1.7篇，不可谓不激烈。在这争议中，对于九丹和“小龙女”这一现象，新加坡人大致有以下几种态度。

第一种：深恶痛绝中国欢场女子

²⁰ <揭中国女子旅新黑幕小说《乌鸦》>，见《新明日报》，2001年6月1日。

去掉20篇新闻以及九丹本人的6篇文章，在26条评论中，共有4人持这种态度。她们对大批中国女人象乌鸦一样到来感到不安：“在新加坡欢乐场所进出的商人，都知道新加坡的卡拉OK夜总会，陪唱的绝大多数是在新加坡读书、工作的中国女人……很多新加坡女人都同意，如果有中国女人来抢丈夫，我们一定打败仗。很多新加坡男人也同意，要抗拒中国女人的诱惑，也不简单。不是新加坡女人比较笨，或美色输人；也不是新加坡男人都不守夫道，爱拈花惹草，问题是对方处心积虑，目标明确，如果关系到生存之道，更难挡架攻势。”²¹ 在作者眼中，妓女有罪，偷吃的丈夫无罪，于是发出宣言：“乌鸦这几年在新加坡繁殖的特别快，它们适应了城市的生活，从城市人丰盛的残羹中，养得肥肥胖胖，但它发出的嘈声，它无处不放的排泄物，令人非常反感，恨不得将它们赶尽杀绝。”²² 接着，作者笔锋一转，从讨伐“小龙女”转而对准整个新移民团体：“新移民的苦，全世界上的每个角落都一样。新移民的拚搏，自古以来，都是一篇篇的血泪史。新移民的生存力，也像全世界的乌鸦一般……但中国的姐妹，可以选择不当乌鸦，如果她看清了新移民的崎岖路。”²³ 在以作者为代表的一些人眼中，女移民为了生存很难不做“乌鸦”，因此还是呆在中国比较好。

也有人气愤地直说：“叫中国欢场女子回家去，不要把狮城搞到乌烟瘴气！”²⁴ 一般而言，她们承认中国女子与狮城男人的情色纠葛，但却很少谴责那些操纵了中国女子命运的本地色情男人，把矛头对准中国的欢场女子，必欲除之而后快。

第二种：轻描淡写承认现实，炮轰九丹

有3人采取这种态度。尽管也讨厌中国欢场女子，但他们承认新加坡的一些社会现实，相对较为理智。余云写道：“无可否认《乌鸦》作

²¹ 林凤英〈天下乌鸦一般黑〉，见《新明日报》，2001年6月20日。

²² 同上。

²³ 同上。

²⁴ 李腾宝〈歌颂欢场女子·贬低狮城女男作家遭炮轰〉，见《新明日报》，2003年3月3日。

者有一定的感悟和洞察力。比如她揭示了一个现象：在新加坡，对某些中国女人而言，‘小龙女’竟像纹在额头的红字。《乌鸦》也展现了部分真实，而且十分强烈：新加坡，这个华人占多数的男性金钱社会对同种的那一群中国女子的伤害。”但作者九丹“显然无法从她自身的创伤里抽离出来，她的刻骨铭心的仇恨损害了她的文学。她所展示的真实，或许有社会学上的意义，或许能让新加坡人从另一个角度反观自己，但纵览全书，失控的发泄像毒汁淹没了一切：除了污秽还是污秽，除了邪恶还是邪恶，尸肉横陈，几无美感。只有肉没有灵，只有污浊丑恶没有沉淀升华，这样的世界，未免离文学远了”。²⁵ 而另一个女作家蓉子也认为，由《乌鸦》引起的这场热闹的讨论不是件坏事。“新加坡人也好，中国人也好，可以通过讨论更深入了解对方的想法，拉近彼此的距离。”对于作者本人，她认为书中有80%的情节是九丹真实经历，“有的女人自己要做‘乌鸦’、要卖肉，那是她的选择、她的生活方式，可是她不应该一竹竿打翻全船人。”若有人认为这本书是经典，也只是“无耻的经典”。²⁶

第三种：痛恨九丹抹黑狮城

有7篇评论持这种态度。在这些作者心中，新加坡是天堂、是净土，不容亵渎。所以他们攻击的目标是九丹本人，而不是中国欢场女子。因为这些女子的存在也就代表了好色新加坡男人的存在，也就代表了新加坡天堂神话的破灭。例如：在蔡再丰的眼中，《乌鸦》里面的那个新加坡是作者杜撰的。他写道：“一个真正的作家，品格是美丽的，心胸是宽宏的，这样的作家绝对不会杜撰事实，更不会攀附任何权势或惧怕任何权势”。《乌鸦》这样的作品，显然是不受欢迎的，“盼望作家们多写些有益人类、关怀人心的温馨作品。”《乌鸦》像“被毒汁硫酸淹没了的失控发泄的情绪之类的小说”，而九丹本人，“赢得出名，却输了人格。很多人想出名想到疯了，结果走火入魔，便会做出各种匪

²⁵ 余云〈论海外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若干关系〉，见《联合早报》，2001年6月9日。

²⁶ 〈女作家蓉子：《乌鸦》只是“无耻的经典”〉，见《联合晚报/新明日报》，2001年6月23日。

夷所思的怪事。”²⁷ 这场讨论，影响恐怕不只在本地，在中国留学的本地女孩李慧敏也隔空加入战团：“针对《乌鸦》一书中的指责，一些本地读者认为要心胸开阔地接受别人的批评。这已经不是心胸开阔或者狭隘的问题了。是批评，还是别人因为思路不正确的恶意中伤，这一点我们得搞清楚，不要是与非都往自己身上揽，这么做只显示自己没有自信、没有立场。”²⁸

第四种：虚心接受批评

有两名新加坡人认为《乌鸦》虽然使本地人受伤，但是应该勇于接受批评，显示了宽宏大量的态度。微风写道：“外来移民问题一向是新加坡的‘私处’，非常敏感，而且具有爆炸性。从新加坡的角度来看，虽然《乌鸦》只是透过一群中国‘留学生’的眼睛来探讨在新留学生的方方面面，但也挖开了新加坡‘严刑峻法’、‘花园城市’之外的另一面。伤人的实话，你想不想听？”²⁹ 邹文学也认为：“新加坡的花园城市外衣底下，原来还隐藏着不少污秽的人性。我想，像许多大都市一样，新加坡绝非净土是不容争议的。《乌鸦》反映的故事背景仍是有迹可寻的。说实话容易伤人，带点夸张的实话更容易引起反击，只是毕竟去除言过其实的部分后，实话仍是实话。我们应该勇于接受批评。”

30

综合各种意见，在16篇新加坡人的评论中，14篇都抓住九丹以偏概全、夸大其词的缺点进行抨击，或公开或隐讳地表示出对这些中国“女留学生”的不齿，表现出一种“同仇敌忾”的姿态；而全部16篇中却无一人明确提到本地男人也该为此负责。在此，对大多数人来说，国籍决定了立场，“自我”与“他者”界限森严、壁垒分明。

此外，20篇有关新闻中，有的也显示了一种强烈的感情倾向。例如，一篇题为《‘乌鸦’被当礼物送》的新闻，写的是一个与新加坡男

²⁷ 蔡再丰〈别因《乌鸦》而伤了新中友谊〉，见《联合早报》，2001年6月27日。

²⁸ 李惠敏〈我看《乌鸦》现象〉，见《联合早报》，2001年6月27日。

²⁹ 微风〈花园城市之梦：实话，总是伤人的！〉，见《新明日报》，2001年5月31日。

³⁰ 邹文学〈我们应勇于接受批评〉，见《联合晚报》，2001年6月4日。

友同居的单身中国女学生，拒绝与其朋友上床的要求而被男友暴力对待。在文中，记者并没有交代这个男人是否已婚，就将这个受害的女学生冠上‘乌鸦’的名称，难免有打击范围过大之嫌。³¹ 所有这些都给新移民带来巨大的舆论压力。在一篇新闻报道中，受访新移民均表示，《乌鸦》风波“确实会影响本地人对中国女人的看法。”³² 这显示，这场争论虽然是在媒体上发烧，但已经成为现实生活里新移民与本地社会关系的风向标。

根据学者王雄的看法，在舆论的形成过程中，“支配性氛围”会逐渐凸现出来，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所谓“支配性氛围”，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舆论氛围。它一旦形成，就成为权威的、甚至是无端的评判标准，个人和集团要么去服从和遵守而获得认同和接纳，要么坚持己见遭到攻击，被淘汰出“主流社会”而成为边缘性意见持有者，或慑于压力保持沉默。³³ 在《乌鸦》风波中，主流社会里批判九丹和中国一些女学生的支配性氛围已经形成，成为社会的权威舆论。在这种情况下，处于边缘地位的新移民要么加入攻击的大合唱，要么同情女同胞悲惨处境受到攻击；要么慑于压力保持沉默。据笔者统计，在同一个月中，共有10名新移民在报纸上公开立场，态度两极：一派猛烈攻击九丹和私立学校的某些中国女学生；另一派表示出同情。

一、痛恨九丹和中国有些女学生的行为

2名新移民攻击九丹，避免对中国女学生发表看法；同样也有2名旗帜鲜明将那些女同胞看作“害群之马”。桑叶写道：“现在，新加坡无端飞来了一只恶毒的乌鸦，本来不值得一提，大家不理它，不去喂养它，也就自生自灭或一枪了结的事。可偏偏有人撑腰，给这只乌鸦提供鼓噪的机会。本来是一只浑身糜烂的败类，一个偷吃的贼，却要把它的毒液中换上甜酸的汁，让它粉墨登场，招摇过市，甚至有人以点代面，

³¹ <“乌鸦”被当礼物送>，见《联合晚报》，2001年6月26日。

³² <中国留学生：卖肉的只是少数>，见《联合晚报》，2001年6月21日。

³³ 王雄《新闻舆论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页132。

伤害到其他无辜的鸟类。现在紧要的问题是灭鸦，不要再让它的噪音、污秽弄脏了环境，千万不要互相指责，伤了和气引起误会，不值得！如果你发现了乌鸦，一定要通知灭鸦行动组来灭鸦，还要小心灭鸦的子弹不要伤到无辜的路人。”³⁴ 在这里，作者看到在论战中炮火扩大伤害到其他无辜中国女人的事实，于是加入到大合唱中，跟这些同胞划清界限。

二、同情私立学校女学生

有6名中国作者对私立学校女生持同情态度。艺庭认为，私立学校女生在中介的诱骗下出国，却不知道新加坡的移民法律如此严格，花光了父母的毕生积蓄，结果只能换来9个月在本地的居留（指就读语言学校的女生），谁能够甘心离开呢？“同样的肤色，同样的文化，同样的血肉之躯，却被烙上如奴隶烙印的‘小龙女’。曾听人说：‘投胎是天底下至深至大的学问’，终于明白这句话的真理和无奈。”她呼吁道：

“请自小就享受英明政府多年无微不至疼爱，视平稳、富裕、无忧的生活为理所当然的新加坡人，降低对外来人的责难与伤害；请宽容这批伤痛已深的‘乌鸦’，他们会离开的，当输掉了东凑西借的路费；输掉了自尊、肉体；输掉了对生命的梦想，请放心，他们会离开的。”³⁵

另一名女作者肖洁也认为：“九丹是令人恼怒的，她直白而赤裸的文字对大多数在新加坡的中国女子是一种伤害和丑化，因为这里依然有那么多勤恳的中国女人通过她们自己的努力生活在阳光下，健康而有活力地为这个城市作出贡献。”但九丹又是值得饶恕的，“毕竟她大胆地为文学开辟出一条相当真实的道路。”同时，她对“乌鸦”表示了同情：

“饶恕吧！忏悔吧！原谅九丹，原谅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只乌鸦吧。用我们的基督精神。作为一只乌鸦是悲剧的。从乌鸦的悲剧里，我们看到女人的悲剧，男人的悲剧，以及整个人类的一些悲剧。”³⁶

³⁴ 桑叶〈让我们大家来“灭鸦”〉，见《联合早报》，2001年6月23日。

³⁵ 艺庭〈《乌鸦》的伤痛〉，见《联合早报》，2001年6月15日。

³⁶ 肖洁〈原谅这世上的每一只乌鸦吧〉，见《联合早报》，2001年6月23日。

九丹本人也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她共发表 6 篇文章，对本地舆论的抨击给予了坚决地回击。她的文章中值得一提的有两点：（1）、她希望这本书能够让新加坡女人反思，给予这些可怜的异乡女子一点同情而不是蔑视。她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下了一些充满了血泪的句子：

“这些从外地来的女孩真的撼动不了你们的任何东西，你们该打麻将就打麻将吧，你们该化妆就好好化妆吧，你们该演戏就演戏吧，你们该存私房钱就存私房钱吧，因为中国女孩永远不是你们的对手。”³⁷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她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如果说因为我写了《乌鸦》这本书，全人类的人都把我当作了肮脏的妓女，如果因为你们把我当作妓女看，而使你们真的干净了起来，使得你们的精神有了亮点，使新加坡的女人能够开始分析自己，从而对于一些其他的弱者对于一些可怜人表现出真正的同情，那么你们全都把我当作妓女又有什么不好呢，我就当这个妓女了。”³⁸（2）、作者隐讳表示，本地要对许多中国女人变成妓女这一事实负责。在这里，很多人无法生存。偷偷打工的结果，就算不被当局发现，随时都可能受人挟制。新加坡对很多中国女人来说是地狱。“这些中国女人在去新加坡之前，也许并不是妓女，而且新加坡也并不像是我笔下所描写的罪恶的新加坡。然而一旦把中国女人和新加坡联到了一起，当中国女人在新加坡的时候，那么《乌鸦》里所描写的那些所有的女人，就突然从冬眠状态中开始活动起来，而她们所面对的城市，就像一个沉沉的夜幕下的背景，也突然间有无数目光像灯光一样照亮了它，像《乌鸦》里所描写的一样。”³⁹ 她对来自中国新移民的指责，也坚决否认：“如果指责我的小说让新加坡人对中国女人的印象糟透，那我要坦白说一句：那只是让新加坡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和带有偏见的潜在性格有了新的出口和更堂皇的借口。这种优越感和潜伏特性在《乌鸦》出现之前早已存在了，否则一些原本品行优良的

³⁷ 转引自余云〈伤痛的乌鸦〉，见《联合早报》，2001年6月9日。

³⁸ 〈若能使世人干净九丹愿当妓女〉，见《联合晚报》，2001年6月28日。

³⁹ 九丹〈《乌鸦》作者九丹的心里话小龙女和你我他〉，见《新明日报》，2001年6月17日。

中国女子就不会在新加坡活得那么辛苦，一些原本对新加坡印象良好的中国人也不会接触新加坡人之后梦幻破灭。”⁴⁰

在笔者看来，有关《乌鸦》的这场争论有一定的社会意义。首先，它破除了在中国人心中新加坡的“城市花园”的天堂般美景，人们开始对本地关于移民的种种限制条规注意起来，可以自行核算到新加坡私立学校读书或是陪读的成本，让那些无法在新加坡找到专业人士职位的中国女人了解到未来移民路上的艰辛，从而能够更理智地选择是否应该出国。其次，对新加坡人来说，外来移民问题一向是新加坡的“私处”，非常敏感。由九丹挑起的这场争论，第一次让社会大众看到了在新加坡还存在着这样一个无助的女大学生群体。尽管在争论中，短期来看，蔑视这些中国女人的仍然占据多数，但毕竟已经有人开始思考，开始省思内心，开始寻找人性中失去的那些美好品性。

在《乌鸦》风波中，媒体上支配性舆论所表达的观点，代表了多数新加坡公众的观点。后来本地男作家卡夫被公众炮轰，也说明了这一点。在一篇文章中，他写道：“‘中国女人’”经《乌鸦》一书完整而又形象地诠释后，在新加坡这个特定的时空下有了另一层新的社会涵义，最可怕的是这一种由舆论、文学作品和社会现象所逐渐形成的标签式看法，不断由媒体反复强调后，会成为社会上一般大众的共识。在缺乏足够的理性思考的情况下，人们很容易的便对和这一方面有关的任何话题，在心理上产生不安的情绪，进而会形成一种无意识的骚动，这是我动笔写《我这滥男人》所始料未及的，由于我是一个新加坡男人，敢于正面冲击这个敏感的禁区，似乎又加深与丰富了这种标签式的看法。”⁴¹这段话生动地写出了媒体或文学作品对公众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自己因《乌鸦》开始关注中国欢场女子，写下了《我这滥男人》这部小说，但因为被指同情中国欢场女子而备受公众批评。这里，“自我”不仅是排他的，甚至连自身内部的一些不协调的声音，也同样施加压力，以排除为目的。

⁴⁰ 九丹〈不要把我当妓女〉，见《联合早报》，2001年6月25日。

⁴¹ 卡夫〈中国女人与《我这滥男人》〉，见《新明日报》，2003年3月20日。

围绕《乌鸦》所展开的讨论，是自1990年中新建交后中国女人登陆以来，新加坡当地主流社会与新移民这个边缘群体最激烈的一次舆论冲突。一方面，新移民从媒体那里感到舆论压力，认为“乌鸦”风波确实会影响本地公众对中国女人的看法；另一方面，在本地记者的访问中，一些公众表示不是所有中国女人都做“乌鸦”，表现了理智成熟的态度。这也显示社会舆论的多样性，媒体观点不能完全代表社会，还是存在着一定的疏离。

第三节 “黄娜事件”

2004年发生的黄娜事件，在11月8日之前曾让新加坡人与新移民心灵相通，度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蜜月期。但在11月8日之后，由于媒体爆出了各种内幕，以及帛金事件带来的种种冲突，导致裂痕重新产生，在一些人心目中的“自我”与“他者”形象又重新清晰起来。

黄娜是个8岁的中国女童，2002年跟妈妈黄淑英来到本地读书。黄淑英在菜市场批发中心工作，母女俩生活俭朴。2004年10月，妈妈有事回福建家乡，把女儿交给朋友照顾。结果轰动新加坡的事发生了。10月10日，黄娜离奇失踪。10月12日，黄淑英从中国赶回新加坡。10月13日，警方发布黄娜失踪消息，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新加坡公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自发发动起来张贴寻人启示，到处找黄娜。10月30日，嫌犯马来西亚华人阿豪向警方自首。10月31日，警方在直落布兰雅山找到藏有一个女童尸体的纸箱。11月1日，马来西亚男子卓良豪（阿豪）被控谋杀黄娜。11月3日，法医确认女童尸体是黄娜，黄娜是窒息而死。11月7日，黄娜停柩在金文泰西2街，大约有2000多人前往吊唁。2005年8月26日，阿豪因涉嫌性侵犯并杀死黄娜，被判死刑。

在长达七八十天的时间里，有关黄娜及其父母的报道日日占据报纸头条。这样铺天盖地的长时间报道，让黄娜事件成为舆论的中心。舆论关注的焦点可以黄娜葬礼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媒体报道的重点为：小女孩失踪到发现的过程，媒体对黄淑英基本上是同情。公众对一名中国女孩的生死如此关心，让新移民倍感温暖。在狮城华人网

上，一个人写道：“黄娜小妹妹尸体被发现，她的亲人悲痛万分，我们这些和她同样来自中国的同胞亦为她幼小生命的夭折感到惋惜，当然同样悲痛的也有不少本地的善心人士。不过，联合早报两千多人拜祭黄娜小妹的新闻多少还是让我意外，以我六年来在新加坡的感受，本地人向来是缺乏一种真正的人文关怀。读完报道后，我的内心可用震撼和惭愧来形容，甚至还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以及久违的一丝感激。”⁴² 笔者在采访中，也有一个新移民感叹道：“没想到新加坡人这么善良，这么多人关心黄娜，真让人感动。尤其葬礼那天，据说有2000多人呢！这是对一个外国小孩，难能可贵！”⁴³ 这一阶段，可以说新加坡公众与新移民水乳交融。正如新加坡人蔡深江所说：“当初的善良本意和同情心的挥发，是这起事件拢聚人心人情的出发点”。但在第二阶段，媒体关注的重点发生了转移，在涉及到利益的情况下，“无可否认，后期的发展显示，这已是个认知分歧的事件。”⁴⁴ 新加坡公众与新移民发生了一些分歧。

在第二阶段，新加坡社会舆论的焦点主要有三个：帛金事件、黄娜父母的复杂背景、媒体的作用。那么我们就分别来看看，对这个事件，新加坡公众与新移民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分歧。

焦点一：帛金总数

在帛金事件中，媒体的作用让人诟病最多。媒体对谣言不加过滤照登出来加上其他一些草率的行为，将部分公众有争议行为合理化，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2004年11月7日，黄娜停柩在生前所住组屋楼下时，大约有2000多人前往吊唁。当天《联合晚报》第三版，登载了标题为《近600人送上帛金》、《国人慷慨捐助，帛金每小时就装满一铁罐》两则新闻。

⁴² 《有感黄娜夭折背后的故事-----媒体万勿成为谋杀人性的推手》，见

<http://www.sgcity.net/bbs/dispbbs.asp?boardID=142&ID=325440&page=1>）。

⁴³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的个人访谈。

⁴⁴ 蔡深江〈谁的过意不去〉，见《联合早报》，2004年11月22日。

⁴⁵ 公众中开始谣传当天黄娜父母所收帛金高达人民币百万。11月8日第六版，刊登了《数千人送帛金数以万计，存放帛金的铁箱已更换六七次》的新闻，继续渲染帛金数量之大。⁴⁶ 11月9日头版刊登了《黄母有意捐部分帛金为黄娜祈福》，在第四版刊登了《黄母将以黄娜名字做善事为女儿祈福》，并且配发了黄母将公众所捐的礼物、水果转捐给慈善机构的照片。⁴⁷ 在随后的星期一播出的新传媒第八频道《人人爱理》节目中，主持人强烈质疑黄娜父母为何不公开帛金数目，他说：“黄淑英之前表示，他们两夫妇经济许可。郑文海（黄娜养父）也说过会将部分钱捐出来做慈善用途。两人现在好像没有什么动静，难免引起公众揣测。”⁴⁸ 他的说法得到部分公众的共鸣。节目曾在开播之前，要求黄娜父母亲临现场向公众说明帛金总数，被拒绝。在节目进行当中，工作人员连续六次拨打电话，试图提出同一要求。节目的播出引起公众两极态度。一派批评主持人咄咄逼人，拿节目压人，另一派支持主持人。11月17日《联合晚报》第一版，刊发了《黄娜帛金该公开吗？》的新闻。文中写道：“本报采访102名读者，赞成：50，反对公开：44。”在第四版刊发了《公众提九大理由，吁公开帛金数额》及《不公开显得神秘》两则新闻。文中指出，要求公开的公众提出的一致理由是“黄娜的事件，已经成了全国人的事件，既是大家的事，就该公开。”第五版刊发了《人人爱理》主持人的自辩《问题较直接，但非问不可》，以满足公众知情权为由为自己的做法进行辩护。同样在第五版，刊出了《善心人中13万，捐出万元帛金，若重来，只会捐1000

⁴⁵ 〈近600人送上帛金〉、〈国人慷慨捐助，帛金每小时就装满一铁罐〉，见《联合晚报》，2004年11月7日。

⁴⁶ 〈数千人送帛金数以万计，存放帛金的铁箱已更换六七次〉，见《联合晚报》，2004年11月8日。

⁴⁷ 〈黄母有意捐部分帛金为黄娜祈福〉、〈黄母将以黄娜名字做善事为女儿祈福〉，见《联合晚报》，2004年11月9日。

⁴⁸ 〈问题较直接，但非问不可〉，见《联合晚报》，2004年11月17日。

元》。⁴⁹ 在18日同样有关于帛金的报道。这些新闻的连续刊出，给黄娜父母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让一些人开始对媒体作用产生质疑。

媒体关于帛金的连番炒作，刺激了一些公众采取了激烈的行动。11月18日，在初级法庭外，数十公众群情激昂，为帛金展开激烈骂战。有人守在法庭外，仅仅为了当面质问黄娜父母为什么不能捐钱。他们提出“她既然答应了新加坡人，就应该要做到这件事（指捐钱），如果连这样的承诺都做不到，她怎么面对对他们这么关心的新加坡人？”也有人说：“黄娜事件，牵动了许多人的心，让我觉得是新加坡人在帮助外国人。如果郑文海（黄娜养父）夫妇没有给予任何交待，以后有外国人遇到事故需要援助时，国人的热心可能会减退。”⁵⁰ 这种关心在以后的日子里也继续发酵，甚至有些人专门等在黄淑英去警局的路上，把她乘坐的出租车截了下来，质问她到底给没给黄娜买过保险。

不可否认，有些新加坡人对这些同胞的做法不以为然。例如一个基督徒在网站上写道：“公众基于同情把钱给他们，就是他们的了；还要什么公布数目的？基督徒帮助人的时候，是否也是这样？我们把钱给人，就是给了主，不要去追究，不要去想它。基于同情给了，也就是了。不能因为发现黄娜的父母复杂的背景，就要追究。”⁵¹

但是要求黄娜父母捐出部分帛金给本地慈善事业的人显然占了多数。联合早报时事评论员吴俊刚对于帛金的用途提出疑问：“黄娜死了，帛金不计其数（黄妈妈说她不会透露数目）。问题是，这些帛金能用来做什么？如果不能为黄娜做什么，那又捐那么多做什么？只因同情？只因中了马票？我们社会里还有很多人是同样值得同情和需要帮助

⁴⁹ <黄娜帛金该公开吗？>、<公众提九大理由，吁公开帛金数额>、<不公开显得神秘>、<问题较直接，但非问不可>、<善心人中 13 万，捐出万元帛金，若重来，只会捐 1000 元>，见《联合晚报》，2004 年 11 月 17 日。

⁵⁰ 邴辉《谁能代表公众》，<http://www.4sgfamily.net/ShowArticle2.asp?ArticleID=820>。

⁵¹ Stephen《黄娜事件的反省，看新加坡人的心态》，见

<http://cclw.net/etbbs/viewthread.php?tid=3799&PHPSESSID=8a2200d2d06cbdbba8862f469c80d3ae>。

的。我们的资源有限，但是，我们往往让宝贵的资源配置错位，只因许多人不是以理智行事。”⁵²

在这件事上，11月7日之后，媒体的连番炒作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一些公众的偏激行动，无视黄娜父母痛失爱女的事实，引起了新移民的反感。一个女移民在帖子上写道：“强迫丧家捐钱，与理不通……作为真正施恩的人，既然如此有同情心，怎可能在人家伤口上撒盐呢？更不可能盛气凌人、傲慢地要人回报。何况，给帛金的，有不少还是借黄娜真字发了财的。”⁵³ 在笔者的访问中，童克说道：“还不是为了钱吗？发现给多了，就眼红了！”⁵⁴ 这种看法，在新移民中非常有市场。由于将外国人视为“他者”，一些人不断在媒体上、行动上施加压力逼迫黄娜父母捐出帛金用于本地慈善事业，这种刻意的“新加坡人”、“外国人”的二级划分，将部分新移民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在11月17日之前一些曾经模糊的“自我”与“他者”的界限重又清晰起来。

焦点二：黄娜父母的坐牢纪录

2004年11月7日，就在黄娜停柩、许多人送出帛金的当天，报纸爆出黄娜父母的一些不良记录。一个新加坡基督徒在网站上这样描述道：“报章报道黄娜的母亲、继父、生父都有犯过法：1、生父是非法居留新加坡被解送回中国；2、继父曾经在新加坡打劫同乡，坐了牢；3、母亲是用另一个名字来新，原来以前跟前夫也是非法逾期居留的。这么大的披露，更令很多人觉得他们不简单，仿佛不该帮助他们。从对他们的同情，变成对他们的数落。对他们痛失女儿的事情，似乎大家都忘

⁵² 吴俊刚〈黄娜案折射的怪象〉，《联合早报》，2004年11月12日。

⁵³ 郦辉《谁能代表公众》，见

<http://www.4sgfamily.net/ShowArticle2.asp?ArticleID=820>。

⁵⁴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进行的个人访问，文中所用名字为化名。

了。”⁵⁵ 新移民虽然也不齿黄娜父母触犯法律的行为，但认为他们已经坐过牢受过惩罚，在这件事中是受害者，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例如：邴辉写道：“一次做贼不代表终身做贼，就算以前有不良记录，在黄娜事件中，黄父是受害者，二者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对一个失去了孩子的痛苦父亲，痛下杀手，频出重拳，如此炒作，用意何在呢？”

⁵⁶ 在笔者看来，双方的分歧很难克服。新加坡公众作为本地公民更加关注社会安全，对触犯法律的外国人显示出冷漠无情的一面，显示出法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极高。反之，而新移民毕竟是来自中国，这种置身事外也能让他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事件的本来面目。

焦点三：媒体作用

在黄娜事件中，媒体对社会的“双刃剑”作用充分显露。也正因如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媒体对社会的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新加坡社会工作者黄明德所说：“媒体对黄娜事件铺天盖地的报道，当然也是为了满足读者 / 观众 / 听众的‘知情权’和好奇心，无非是商业运作上的供求自然模式，然而，媒体与消费者的主体关系并非如此单纯。媒体在民间所产生的力量确实是举足轻重的，除了传播报道的功能，媒体也发挥了‘引导’，甚至‘主导’的作用。媒体能影响并引导民间的观念及想法，也可以进一步主导民间的某些行动。以黄娜命案为例，媒体的大幅度报道及讨论，促成了民间自发的搜寻行动；也正是媒体报道有人因猜测与命案相关数字而中奖，掀起了一股‘黄娜红字’热潮。”⁵⁷ 对于黄娜葬礼前的媒体报道，新加坡知识分子与新移民社会没有争议，一致认为媒体发挥了主导作用，而这些作用使黄娜得到了一个风风光光的丧礼，也给失去爱女的黄娜父母带去了许多安慰。11月11日，《联合晚报》曾总结了黄娜

⁵⁵ Stephen 《黄娜事件的反省，看新加坡人的心态》，见 <http://cclw.net/etbbs/viewthread.php?tid=3799&PHPSESSID=8a2200d2d06cbdbba8862f469c80d3ae>。

⁵⁶ 邴辉《谁能代表公众》，<http://www.4sgfamily.net/ShowArticle2.asp?ArticleID=820>。

⁵⁷ 黄明德〈社会能量的释放与疏导〉，见《联合早报》，2004年11月17日。

事件的“十最”，这包括东南亚最长佛教灵车；最多人参与搜寻；最多吉蒂猫玩具的葬礼；最多祭品；最大型法会等。⁵⁸ 黄娜得到这一切，媒体功不可没。但葬礼后，媒体报道由同情丧家走向代表“社会正义”审判丧家，新加坡当地社会与新移民发生了分歧。

确实，黄明德、蔡深江这样的本地华文精英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在早报投书，小心翼翼，婉转希望媒体自省。例如：黄明德写道：“黄娜事件的连续报道过程中，也有若干地方招致非议。就有辅导专家致函报章，吁请媒体让此案件的报道告一段落，以免让受害女童的家属承受过多的外在压力，因为亲人遇害的创伤已是晴天霹雳，而没完没了的媒体报道无形中也造成了第二次伤害。对此笔者深有同感，只希望我们能让司法找出真相，主持公道，也能让黄娜家属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治疗心灵创伤。公众的好奇和媒体的挖掘不应该跨越我们的社会向来良好保持的自律警戒线。”但他同时却为媒体背书“本地媒体是克制谨慎的，”⁵⁹ 态度模棱两可。另一个早报著名编辑蔡深江在《谁的过意不去》中，也显示了矛盾的一面：“要不是媒体积极从侧面参与，许多问号不可能这么快得到解答；本地媒体在一些时候甚至是跑在官方之前，看到并提供必要的参考信息。然而，除了引导公众追知事态的发展，在报道尺度的拿捏，是过犹不及，是放大了某些枝节，还是渲染了猜疑的部分等等，应探讨未来可以更恰当处理的模式。不要忘记，内省力量是媒体的公信力的基础。”但同时认为“但这不是说，详尽报道和满足读者的知情权有错。”⁶⁰ 显然，作为媒体人（两人均为“人人爱理”电视节目的主持人）两人左右为难。他们的文章一发表，在网上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大马华人论坛（很多网友均为本地新加坡人）上，有些网友对二人一方面发表文章，似乎代表社会良心，另一方面却又主持了强迫黄娜父母公布帛金数目的“人人爱理”节目，批评十分严厉。闻达星写道：“读书人以社会良心自居，先把黄娜事件炒作起

⁵⁸ 〈黄娜命案创 10 大之最〉，见《联合晚报》，2004 年 11 月 11 日。

⁵⁹ 黄明德〈社会能量的释放与疏导〉，见《联合早报》，2004 年 11 月 17 日。

⁶⁰ 蔡深江〈谁的过意不去〉，见《联合早报》，2004 年 11 月 22 日。

来，又来评论这个事件，一方面又怕‘屠狗辈’（指下层华人）的好心被人滥用，假‘道德’之桂冠，讨论‘帛金是否有公开的必要？’被人识破司马昭之心，还一幅冤屈的模样，实在我见犹嫌……社会工作者黄明德就是《人人爱理》的主持之一……他肯定没有拒绝上《人人爱理》节目……回头来看黄明德的这篇文章，可以知道：这些精英的理论知识 and 为人处世根本联系不起来，为了己方的利益，心机太重；不惜伤害别人来成就自己，成了负心郎。”⁶¹

但笔者以为，二人的小心翼翼正说明，希望媒体自省这种观点在当时的社会处于边缘地位，并不占据主流。所以这些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无论自己真实想法如何，都不得不卷了进去，在实际行动中，违心地符合了媒体支配性氛围下大多数人强迫丧家捐钱的意愿。归根结底，对很多本地人来说，媒体是否该反省，要看它是否伤害了本地人的利益，而外国人的利益并不在考虑之列。时事评论员吴俊刚的观点就是最好的注脚。他认为黄娜父母应该公布帛金数目，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对媒体对黄娜父母的二次伤害视而不见，媒体不必反省。但在对本地社会造成伤害的事情上，“媒体人是应该反省和检讨的。黄娜案确实有它的新闻性，但是，炒作号码和万字票，却有宣扬赌博和迷信之嫌。大众媒介的社会影响力是巨大的，媒体人应该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能一味为了刺激销路而进行毫无节制的新闻炒作。”⁶²

本地某些媒体是否该反省实际上代表了当地社会如何对待外来新移民的问题。一些新移民批评媒体倡导民众利用黄娜真字发财的丑陋行为。在狮城华人网上，一个中国人写道：“及至昨日早晨某某广播主持人在‘空中’大肆宣传某某与黄娜小妹死亡相关数字中了4D（指由4个数字组成的一种彩票）头奖并呼吁民众继续跟进购买其它相关数字时，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有联合早报那篇报道。也许联合早报的编辑和我一样宁愿相信人性善良？待得今晨地铁上见到某某报纸头版大篇幅报道相关

⁶¹ 闻达星《回应：早报选读：黄明德—社会能量的释放与疏导》，见

<http://www.malaysia-chinese.com/cgi->

⁶² 吴俊刚〈黄娜案折射的怪象〉，《联合早报》，2004年11月12日。

数字与4D的新闻的报道时，我出离愤怒了！在注意到拜祭者因为4D中奖急剧上升到超过两万，相关数字买到赌博公司能够受理的极限时，我无言了，心里凉透了。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透过某报纸自豪称之为所谓二十年没有出现过同样关注的这么一个事件，一些本地人世俗化、一切向钱看的丑陋心态昭然于世。”⁶³ 而在另一个网站上，邴辉也抨击了媒体代表“社会正义”对痛失爱女的黄娜父母进行审判的行为。她认为：“公众想要的，是一个不会将自己的收视率和报纸销量，建立在别人（尤其是受害者）的痛苦上的媒体；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有道德坚持的媒体；记者或主持人不会滥用工作之便推销自己的个人的、主观的判断的媒体；不会利用本地人掌握资源的优势，从外国人中找到几个害群之马，就大做文章，诱导本地人说出一一些以偏概全的重话，伤害外来族群的媒体；懂得纠正某些观众或读者偏激看法、维持社会族群间和谐的媒体；一句话，就是高雅的媒体。”⁶⁴

黄娜事件暴露了当地公众与新移民族群在利益方面的分歧。若说它有什么积极意义，一方面，也许就如蔡深江所说：“所有的讨论和关注，我更愿意相信是出自善意和为了促进更大的沟通理解。”⁶⁵。另一方面，陪读妈妈这一弱势群体走进了人们的视线。首先，陪读妈妈们开始自我反省。蔡建秋投书《联合早报》总结教训：“中国学童黄娜从失踪到发现被谋杀一案，对许多家长，特别是陪读妈妈来说，是个教训，我们应自我反省，改进自己与年幼儿女的相处关系。在黄娜案件发生前，已有些陪读妈妈带着年幼的孩子退学回国了，理由可能是当妈妈的没法找到工作，没有收入，怎能生活居留下来呢……黄娜案件，给陪读妈妈敲了警钟，既要让孩子接受良好教育，也有责任与义务管好年幼儿女的生活，照顾孩子的安全。虽然新加坡的治安相对较好，破案率也

⁶³ 参见狮城华人网帖子《有感黄娜夭折背后的故事----媒体万勿成为谋杀人性的推手》，<http://www.sgcity.net/bbs/dispbbs.asp?boardID=142&ID=325440&page=1>）。

⁶⁴ 邴辉《谁能代表公众》，见
<http://www.4sgfamily.net/ShowArticle2.asp?ArticleID=820>。

⁶⁵ 蔡深江〈谁的过意不去〉，见《联合早报》，2004年11月22日。

高，但犯罪的事仍然会发生，没有中国中介所宣传的‘样样都好’的说法。”⁶⁶ 其次，更多的新移民了解到陪读妈妈生存的艰辛。2003年8月，警方在整顿国内多家美容按摩院时逮捕了23名涉嫌卖淫和从事非法职业的女子，其中20名是陪读妈妈。由此社会问题浮出水面。对于陪读妈妈，新加坡公众的态度很少出现什么分歧。以狮城女作家蓉子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蓉子长居上海，长期为《新明日报》回答读者信件。根据《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采访，曾有陪读妈妈向她诉苦，她回答道：“每一个社会，都会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有些随着时间会改善，有些则永远‘巡回演出’……如果我是你，我不会留下来。你大可回老家当你的财务经理，让孩子留在中国，跟13亿人的儿女去竞争。在家乡好好的日子不过，为什么要跑到国外成为需要关注的群体？你的民族尊严就投在孩子的学习上吗？难道除了这一途，孩子就无法学习双语吗……对不起，恕我严词苛责，希望能唤醒你：安分守己才是正道。无论路怎么难走，也不要成为乞求者。”⁶⁷ 而新移民对陪读妈妈往往有较深的同情。一些人认为，“如果一只乌鸦不小心使缸里的水染黑，我们应该设法把它打捞起来，替它梳理羽毛，或者默默清理这潭被染黑的水。这才是我们该具有的真正的基督精神。而不是用喇叭转告天下人：‘我不是从这个缸里出来的，我来自天堂’”。⁶⁸ 因此专业人士也越来越多地以实际行动来帮助陪读妈妈。新加坡家园物语网站开设“陪读妈妈专题”，为陪读妈妈答疑解惑，提供信息。而狮城华人网上也开辟了“陪读专栏”，为陪读妈妈们提供一个缓解压力、交流信息、寻找工作的平台。在狮城华人网上经常能看到新移民发布的工作信息，从护士、华文教师等正式工作到家务、打扫等兼职工作，都指定要陪读妈妈。

总而言之，在黄娜事件中，媒体的大幅报道激起了本地公众对黄娜的同情心，但也因后来有争议性的帛金等议题令本地社会与新移民的蜜

⁶⁶ 蔡建秋〈陪读妈妈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见《联合早报》，2004年11月17日。

⁶⁷ 〈新加坡作家蓉子〉，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9月22日。

⁶⁸ 肖洁〈编者的话〉，见《中国女子的新加坡》（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2年），页1。

月提早结束。媒体通过连续多天的报道将自己的观点传播开来，营造出一种支配性氛围，对社会施加巨大的影响。媒体的观点成为多数公众的观点。应该看到，由于大众舆论混乱无序，媒体的观点不能完全变为所有人现实生活里统一一致的观点，但至少其营造的支配性氛围会对多数人发生影响。它令内部反对者要么冒着与多数人对峙的风险，要么保持沉默。它如何描述新移民至少能够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影响多数本地公众的态度。

由于利益不同，新加坡当地社会与新移民的分歧不可避免。但是通过在媒体上的讨论与交锋，双方毕竟了解了对方的观点，这就为适当地调整双方的关系留下了一些可能。

第四节 结语

1990年中新建交后，中国女子通过婚姻、留学、工作等方式登陆狮城。对于这股突然降临的大批生力军，当地华人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一方面，当地人们停留在老一辈对贫穷中国的描述中，潜意识中就有中国女子前来淘金的成见。每当社会上出现有关中国女子的轰动新闻的时候，这种成见就会发酵，成为一种社会共识，中国女子被贴上“小龙女”、“乌鸦”等具有贬义的标签。媒体关于“小龙女”的描述出现在施昉离婚案见于报端之前，其本意指“中国女人”，但由于成见，不负责任地将其意义指向“色情交易、第三者”，显示出一些本地人的轻率与武断。由于铺垫效果，媒体的观点变为大众的观点。而“小龙女”这一名称从九丹的《乌鸦》开始有了完整的定义。但也因《乌鸦》描写了一些私立学校女大学生沦落风尘的故事，而使中国女大学生成为众矢之的。“小龙女”的名称在本地人的眼中与“乌鸦”等同。女童黄娜事件让本已显示端倪的“陪读妈妈”这一弱势群体进入社会的眼帘。尽管黄娜葬礼前，中国新移民第一次集体感受到新加坡这个社会的温暖，但后来媒体的炒作，围绕帛金等问题的争论，也让他们更加感受到自己作为边缘群体的事实。中国女人在“他者”的路上，恐怕还要继续无奈地走下去。

从以上三节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自我”与“他者”的交锋。这种冲突在短时间里似乎是双方关系的倒退，但从长远来看，双方通过相互过招已经对彼此的脾性和底细有所了解，也就有了未来改善关系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新移民的生存环境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善。这种改善首先表现在媒体的报道上。在1999年后，“小龙女”这一蔑称基本上从报纸、电视里消失；除了在九丹的小说《乌鸦》出版前后，“乌鸦”这一称呼，在媒体上也很少出现；以往，有关中国女人的负面新闻充斥报纸、电视，严重影响了一般新加坡人对女移民的印象。但现在，《联合早报》特设的新移民专刊每星期三都会向公众推介一些成功人士的案例，期望能够客观平衡地反映现实生活。此外，《新明日报》也招聘了中国记者，努力使报道让新移民产生更多认同。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中国女性漂亮的成绩单也越来越进入人们的视线，从而使新加坡人逐渐改变了观感。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乒乓球女将身上。来自中国的选手井浚泓曾代表新加坡打进奥运会前四名，但一些本地人却不承认她自己人的身份；四年后，来自北京的李佳薇打进奥运会前四名时，基本没有什么人对她的身份提出质疑，这充分显示出公众随着了解的加深对外来人才显示出宽容的一面。此外，前优频道张海洁、第八波道主播徐冰等人也得到人们的喜爱。这些都说明了社会在进步中。而未来，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在狮城的成功人士越来越多，虽然有些时候还会出现自我与“他者”的角力，但长期来看双方的关系还会进一步改善。

第五章 中国女人与劳动力市场

Katie Willis and Brenda Yeoh 认为，以往的移民研究不注重研究女性在居住国的工作情况。“尽管移民（包括国内和国际移民）常常与在移居地的雇佣机会有关，但很多关于工作移民的研究都没有认识到移民的性别因素，要么研究者主观认定所有的移民都是男性，女性不会为工作移民，要么根本就没有认识到移民性别的重要性。”¹ Hania Zlotnik 也指出：“尽管女性为工作而移民的历史已经很长，但人们一般都认为，女性应该留在家庭里，这就必然低估女性作为一个移民和一个工作者的贡献。”

² 在中国，女性工作有多重的原因，经济收入并非她们工作的唯一目的。在移居新加坡后，女移民也积极投入到劳动力市场中。在笔者的调查中，81.58%的女性都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仅有18.42%的人为家庭主妇（其中包括一部分受移民法律限制，暂时不允许打工的女性）。³ 这无疑要比新加坡居民女性就业率高出很多（在1990年，新加坡女性就业率为48.8%；2000年为50.2%）。⁴

既然多数女移民都会拥有一份工作，那么她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与本地人口的关系如何呢？笔者认为二者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合作是任何企业、部门、机关等单位员工都必须拥有的素质，在此不做赘述。关于竞争，最近的一个事件很能说明问题。2005年，新加坡教育部将从中国招聘

¹ Katie Willis and Brenda Yeoh, “Gender, Marriage and Skilled Migration: The Case of Singaporeans in China”, in Katie Willis and Brenda Yeoh (eds.), *Wife or Worker? 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pp.101-119.

² Hania Zlotnik, “Migration and The Family: The Female Perspective”, in Katie Willis and Brenda Yeoh (eds.), *Gender and Migration*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2000), pp.27-46.

³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的社会调查。

⁴ *Census of Population 2000, Advance Data Release* (Singapore: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1), p.4.

70名优秀华文老师的消息不胫而走。据说在中国有两万多中文教师在角逐这些职位。这一消息经媒体报道后掀起了轩然大波。本地人纷纷投书报章表达对聘请外国人的不满。例如，张梅宁在2005年9月19日《本地的姜不够辣？》的文章中指出：“放弃本地大好的华文师资不用，反而要去中国聘请70名华文教师。难道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本地师资训练学院国大及南大培养不出人才？”⁵ 在这里，“你们”、“我们”泾渭分明，排除外国“他者”的情绪跃然纸上。来自中国的华文女教师也反唇相讥。她们的观点，以张春玉为例，认为本地人的排斥有着狭隘的岛国心态，单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句颇不友好的质疑，就已经显出了作者的眼界和心胸了。”她进一步提出规劝：“何必只把眼睛盯在那区区70名中国教师身上，好象教育部是‘引狼入室’来抢您的饭碗似的？大方一点，豁达一点，在全球化的今天，把个人的生存空间局限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未免会限制自己的发展。”⁶ 在她们眼中，这些排斥外国人的本地人也同样是“他者”。这场争论实际上是多年来社会上关于外国人才争论的延续，反映了部分本地人与一些外国人在劳动力市场上互视“他者”的现实。那么这种“自我”与“他者”的主观想象，是如何投射到现实劳动力市场上的？二者之间是如何相互映照、相互疏离的？本章试图从女移民入境新加坡的背景、工作信息的获得、劳动力市场对移民女性的限制及女性应对策略三个方面来提出这样的论断：尽管中国女人在本地劳动力市场上面对很多的限制，但她们仍然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表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姿态。

第一节 女移民参与新加坡劳动力市场的背景

在笔者的调查中，13.16%的女性来到新加坡前已经在本地找到工作，而30.25%的学生准证持有者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在毕业后加入劳动力市场。

⁵ 张梅宁〈本地的姜不够辣？〉，见《联合早报》，2005年9月19日。

⁶ 张春玉〈何必小家子气——也谈外来教师〉，见《联合早报》，2005年9月30日。

⁷ 除了这些靠自己入境的以外，那些以依附者签证入境的女性也会在入境后积极寻找工作。显然，进入劳动力市场与移民密不可分。那么中国女人是在何种情况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呢？笔者认为，女移民之所以能够大量进入新加坡劳动力市场，主要有两大因素：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变化；二、新加坡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变化。

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方面的变化

1、中国政治的变化

首先，中国政府改变了限制人口流动的政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采取严厉措施限制人口迁移。结果大规模的国际迁移几乎停止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中国新移民也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定居下来。

其次，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东南亚政策进行了调整。

1980年代初期，中国极“左”的内政和外交政策走进了历史，经济建设成为最重要的任务。务实的外交和经济战略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指导原则。1982年，胡耀邦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宣布：中国将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从此中国的外交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中国来说，东南亚的地位比以前更重要了。赵紫阳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特别重视发展同邻近国家的睦邻关系，因为这不仅仅关系到我国的安全和发展，而且影响到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⁸ 同样，中国政策的变化也减低了东南亚国家的疑虑。随着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的建交，新加坡的顾虑也不复存在，两国于1990年正式建交，为大批有知识、有技术的新移民落户新加坡扫清了障碍。

2、中国经济的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逐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国民生产总值连续多年两位数增长，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使得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家庭有实力送孩子去国外读

⁷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的社会调查。

⁸ 〈政府工作报告〉，见《人民日报》，1984年6月2日。

书。新加坡处于东西方交汇之地，实行双语政策，能够满足家长们让孩子既接触西方文化又保留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愿望，因此大量学生来到此地进入大、中小学学习。很多学生（包括女性）在毕业后会进入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企业到中国投资，中新双方交流加强。大量中国人因为接触到新加坡人、新加坡企业而产生好奇之心，希望能够到新加坡来工作、生活。许多女性也和男性一样参加新加坡企业的招聘，在面试成功后来到此地工作。

3、社会观念的变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越来越多中国女性与男性一样投身劳动力市场。1991年的一项大规模调查表明，中国女性的劳动就业代间变化显著，有87.2%的被调查者在业或曾经在业（指离退休者）。“这一比例虽然比男性被调查者低9.8个百分点，但比其母亲一代高20.7个百分点。”⁹ 工作在女性心目中的地位在另外一份调查中也得到了体现。对于“如果社会承认干家务带小孩是一种社会必要劳动，并付给某种形式的报酬，你该如何选择”这一问题，69.7%的女性仍选择出外工作。在无经济必要下的工作意愿，北京女性为93.8%，广州女性为92.2%，均高于香港女性（90.3%）。由此可见，经济收入并非女性工作的唯一动机，工作已经成为女性“自我”的一部分，“如果让她们脱离劳动，这部分自我就不能实现”。¹⁰ 很多女性与男性一样有事业心，出国接受高等教育和出国工作不可能成为男人的专利，因此大批女性靠自己而无须仰仗男人来到新加坡接受教育和工作。

二、新加坡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

1、在经济上，新加坡的继续发展需要中国人才

首先，参与中国市场需要大量懂得中新两国文化的人才，中国人才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在1980年代，东盟国家也加快了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步伐。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发展后劲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事实上，马来西亚早在1974年、菲律宾和泰国于1975年就与中国建交，主要原因之一

⁹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页37。

¹⁰ 同上，页246—247。

就是加强经济联系。正如马来西亚外长在1986年所说，他的国家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发展特别感兴趣，并希望能加强直接投资，扩大贸易和其他经济关系。参与中国的发展，新加坡具有民族、语言、文化等方面的优势，在各方纷纷抢占中国市场的情况下，新加坡不可能坐失良机。高瞻远瞩的新加坡领导人敏锐地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吴作栋认为，从短、中期来说，东盟国家将从与中国日益频繁的经济往来中获利，东南亚将随着中国的繁荣而繁荣起来。¹¹ 李光耀也曾表示：“为了要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我决定吸收聪明的中国人才到新加坡工作和学习，以便他们了解新加坡人，并成为新加坡的一分子。”¹²

其次，随着新加坡迈进工业化国家的行列，国内对人才的需求也比以往更为迫切。根据新加坡人力部的统计，在1988到1998这十年间，新加坡对半熟练工人（指初中毕业生）以及非熟练工人（指小学毕业或初中未毕业的人）的需求逐年下降。半熟练工人的比例由31%下降为28%，预期未来的10—15年内会下降到20%；而非熟练工人的比例由50%下降为38%，预期未来的10—15年内会下降到15%；反之，对熟练人才（指初院、理工、大学本科甚至更高文凭的毕业生）的需求却从19%升为34%，预期未来的10—15年会增加到65%。¹³ 但是新加坡仅有四所大学，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有限，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引进外国人才就成为当务之急。吴作栋曾经指出：“从全世界搜罗人才对新加坡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¹⁴ 李光耀也认为新加坡“必须到国外招揽人才”，否则将

¹¹ 中国东南亚商委会《来自新加坡的商机之四：新加坡正孕育新一轮在华投资热》，见中国涉外网http://trade.9c9c.com.cn/dnyshw/sjdn/topic_695.html。

¹² 〈即使新加坡人都用华文，水平也比不上中国大城市〉，见《联合早报》，2000年10月16日。

¹³ Linda Low,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igrant Worker Policy in Singapore”, in Yaw A. Debrah (ed.), *Migrant Workers in Pacific Asia* (London and Portland, OR :Frank Cass, 2002), pp.95-116.

¹⁴ 《新加坡的中国白领现象》，见中华出国网<http://www.6xue.net/PDxinjiapo/hwsl/gzjl/200511/1806.html>。

在竞争中被淘汰。¹⁵ 在这样的人才政策下，大批的中国人来到新加坡学习、工作。

2、在社会方面，新加坡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倾向于迟生育或不生育，生育率长期偏低。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越发明显。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资料，在1990年到2000年十年间，所有种族的生育率都下降了。每个华人家庭从平均拥有2.8个孩子下降到2.5个；马来人从3.2下降为3.1个；印度人从2.7下降到2.4个；其他族裔从2.3下降到2.0。¹⁶ 此外，“在家庭规模和女性的教育程度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联系。一般上，在所有年龄的女性当中，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生育的孩子最少。在2000年的统计中，40—49岁的结过婚的女性，有1.9个孩子；在初中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平均有2.4个孩子。30初头的大学女毕业生仅有1.3个孩子，而在初中以下教育程度的人，则有2.1个。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学毕业生迟婚引起的。”¹⁷ 长此下去，必然会对未来经济发展带来影响。吸引外来人才可以解决生育率低所带来的问题。李光耀在2000年发表讲话，认为政府积极吸引受过良好教育的外国人移居新加坡的政策取得良好的进展，所吸引的外来人才数目足以填补因新加坡人口的生育率偏低所造成的达不到替代水平的问题。

其次，在新加坡走向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当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经济地位普遍提高了，但有些社会观念仍然滞后。“社会规范认为，女性应该嫁给比自己学历高的、来自更高社会阶层的男子；男人寻找配偶应该方向相反（即应该娶学历比自己低的、社会阶层比自己更低的女子）。这反映了社会规范视男性为一家之主，男性应该负起养家的责任。”¹⁸ 这

¹⁵ <李资政：不招揽人才将被淘汰>，《联合早报》，1999年8月15日。

¹⁶ *Census of Population 2000, Advance Data Release* (Singapore: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1), p.67.

¹⁷ 同上，页67。

¹⁸ Katie Willis and Brenda Yeoh, “Gender, Marriage and Skilled Migration: The Case of Singaporeans in China”, in Katie Willis and Brenda Yeoh (eds.), *Wife or Worker?*

使得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两个婚姻比较困难的群体：一个是高学历的女性，一个是低学历的男性。很多低学历男性把目光投向国外，而中国女人由于同文、同种的优势很受欢迎。在婚后，很多女性也会加入劳动力市场。

虽然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以及新加坡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中国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必要条件，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够来到新加坡工作。工作信息的取得对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至关重要，它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第二节 工作信息的获得

爱丽森·玛齐（Allision Munch）等人1997年的研究表明：养育孩子使得女性在社会结构网络中的信息流和物质流的获得方面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导致女性总体上在就业信息、工作经验等方面相对男性较低。

¹⁹ 那么这种说法适用于来自中国的女移民吗？社会网络对女移民的就业有怎样的作用？新移民是怎样获得工作信息的？

根据笔者调查，关于目前工作信息的来源，对男性来说，位居前三位的依次是：通过报纸网站（52.94%）；通过中介机构（25.49%）；熟人朋友介绍（15.69%）；通过亲戚介绍的人最少（1.96%）。而对女性来说，虽然通过报纸、网站仍占第一位（34.21%），但居于第二位的是通过熟人朋友（32.89%）；中介介绍与亲戚帮助并列最后（2.63%）。²⁰ 这种情况说明：1、女性比较擅长于借助社会关系的力量，对亲戚的依赖也比男性略高。2、男女两性获得工作信息的主要来源相同，依靠自己的比重不断增加。3、中介机构仍然是主要的信息渠道。

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 (Lanham :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pp.101-119.

¹⁹ Allison Munch, "Everyone Gets to Participate: Floating Community in an Amateur Softball League", in Calvin Morrill, David A.Snow, and Cindy H.White (eds.), *Together Alon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in Public Plac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2005), pp.111-133.

²⁰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进行的社会调查。

一、女性擅长于借助社会关系的力量

在大多数社会里，女性都在构建和维持社会网络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女性对发展基于亲情或友情之上的社会网络是十分积极的。

Janet.W.Salaff 在对香港移民的研究中发现，华人女性在家庭里的性别角色分工能够帮助促成国际移民。“在她们的日常生活中，男性负责开拓关系，女性联系亲人、朋友和社区网络。她们这种构成移民工作核心的活动帮助降低移民风险。”女性肩负维系丈夫、自己双方的家人及朋友感情的任务。“即使她们不是移民的主申请人，但移民工作重重地压在了女性的正式工作、生育、家庭关系维系之上。”很多移民信息的取得就有赖于女性负责维系的社会网络。²¹

爱丽森·玛齐的社会网络说看到了女性承担着主要的抚养、看护责任的事实，但也许适用于一个非移民社会，对于一个移民社会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也就是说，生育是多数女人都要经历的事情，但是移民女性往往能够克服这些不利条件，充分发挥女性相对耐心、细致、考虑周到的性别优势让社交网络不断扩大，从而服务于移民的目的。因为一般而言，女性在社交方面比男性有更大的优势。发展社会网络意味着有可能实现出国的梦想，意味着在陌生环境里有更多的生存机会，这一点对在异乡打拼尤为重要。即使孩子幼小，也需要克服这些不利积极主动去发展社会关系。若是拿到了新加坡的工作准证，就等于拿到了出国的通行证。因此寻找工作的努力往往是和出国混在一起的。在寻找工作、移居国外这件事上，中国女性在构建社会网络上的角色十分活跃，她们往往比男性更善于借助社会关系的力量。

孙亚的例子非常典型。在毕业后的一次同学聚会上，她偶然听说一个大学同学目前在新加坡工作。她们曾经很要好，但毕业后慢慢失去了联系。她知道这个消息，就在校友录上找到好朋友的联系方式，写了封信给她。她在信里表示对自己目前的状况感到十分厌倦，希望能出国看看。同

²¹ Janet W. Salaff, “The Gendere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igration as Work”, in Katie Wills and Brenda Yeoh (eds.), *Gender and Migration*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2000), pp.153-177.

学很快来信了，热情地告诉她有什么途径，应该怎样办。她以社交访问准证来到新加坡，又通过朋友的朋友的推荐参加了某公司的招聘面试，并且很快拿到了工作准证。她忍痛把刚刚两岁的孩子留给国内的丈夫和婆婆照顾，一个人来到此地。独自一人在这里的日子，她一直是一个新移民圈子的活跃分子，每个星期都参加聚会，也与别人结伴去邻近国家和地区旅行。在到此地的第三年末，在中国博士毕业的丈夫也通过她朋友的帮助找到了工作，一家人终于在新加坡团聚了。²²

尤月在本地找到华文教师的工作与姐姐有很大关系。六年前，姐夫在美国博士毕业后接受了新加坡某大学的教职，姐姐一家人迁到了这里。新加坡对华文的重视，让姐姐感到很好奇。她打听到申请华文教师的程序，跑去新加坡教育部拿了份申请表格，寄给了在中国家乡从事语文教学的妹妹。妹妹通过教育部的初选后来到新加坡面试。面试期间就住在姐姐家里。大约回国1个多月后，尤月接到教育部的录取通知，顺利来到了新加坡。她与丈夫分居两国，怀孕时丈夫不在身边，都是靠姐姐和朋友们照料她的。至今她仍然在教育部分配的某中学从事华文教学，孩子已经四岁了，刚刚从国内来上幼儿园。谈到这些往事，她笑说：“我很幸运，找工作省了一大笔中介费。虽然一个人在异乡生孩子，可是有姐姐和这么多好朋友，让我没有觉得受过什么苦。”²³

由于在中国家庭中，通常女性负责维系与双方朋友、亲人之间的感情，因此对亲属的依赖相对男性更强。在陌生的土地上，至少有两个原因使女性对社会网络的构建比丈夫更加积极。一个是在面对生存压力的情况下，女性可以发挥比男性更长袖善舞的社交本领，从社交网络中汲取信息，从而给自己或丈夫带来更多机会。第二个原因是养育孩子通常是女性的职责，由于幼儿园对外国人的收费较高等不便条件，女移民在生育期间以及抚养幼儿期间也会更加渴望得到亲戚朋友更多的帮助。

二、男女两性移居国外的最主要信息来源相同

²²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进行的个人访问，文中女性名字为化名。

²³ 同上。

对男女两性来说，找到目前工作的最主要信息渠道是通过报纸、网站（男性为 52.94%，女性为 34.21%）。这与老移民时代，他们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同乡、朋友介绍有着很大的不同。原因有二。

首先，当代传媒业发达，信息传递速度快，渠道多，远非老移民时代可比。

老移民时代，信息的传递主要靠书信或口耳相传。因此，无法接触到国外移民的人往往无法得到关于出国的具体信息。这也是老移民相对集中在东南沿海的一个原因。而在当代，科技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05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北京发布了“第十六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止到6月30日，中国上网用户总数首次突破1亿，达1.03亿人。中国网民数和宽带上网人数均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网上性别差距迅速缩小。男性网民约占总数的59.6%；女性网民超过四成。²⁴ 随着科技以及传媒业的发展，信息覆盖范围变大。通过报纸和网站，每一个人都能够平等地得到信息。

其次，老移民与新移民的来源地不同，新移民的信息来源也随之发生变化。

老移民来自传统侨乡，出国闯世界在很多地方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习俗。一人出国往往会将同乡宗族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带出国去。新移民是第一代移民，缺乏老移民那么宽广的人脉，没有在国内的亲戚同乡可以依赖。在无法借助亲戚朋友力量的情况下，选择报纸、网站无疑是一种快捷有效的渠道。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新移民往往无法依靠亲戚朋友取得出国工作信息，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移居出国的过程中他们不会向已经移民的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求助。移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异乡的吃住行都是一个大问题。一个陪读妈妈这样写道：“在这里还要感谢狮城论坛，我人还在国

²⁴ <中国网民总数突破一亿，宽带上网人数首次超过拨号上网>，见《南方日报》，2005年7月26日。

内，就通过狮城论坛找到了合适的房子，如果是通过中介又要被宰一下子。真是千辛万苦来到了新加坡。”²⁵

三、中介机构是主要的信息渠道

与老移民相比，新移民缺乏亲戚同乡的支持。在信息不畅的情况下更可能向中介机构求助。他们通过中介机构来到新加坡工作，通常有几种形式。一种是中国与新加坡两地的中介合作，这种方式在中介市场上处于主流。例如，1998年，电脑工程师杨莺被一则承诺协助出国的广告吸引，决定放手一搏出国闯世界。在交了三万元人民币给中国的中介机构后，她顺利入境投到本地代理的门下。新加坡中介公司给了她一些工作信息，她自己去面试并在通过后上班了。按照在中国时所签下的合同，每个月的薪水都必须交给本地中介公司 300 新币作为酬劳，100 新币作为押金。每个月的薪水，都直接打入中介公司的账户，她自己则在固定的日子，拿 400 新币去中介那里换回自己的薪水。²⁶ 第二种是中国中介机构单独办理。在中国，有些人希望能够来新加坡工作，而中国中介就利用人们不习惯看英文、不了解工作渠道的不利条件为她们办理。在一个案例中，1998年，在北京某大学工作的曹樱看到北京中介机构在报纸上的广告，决定请中介办理到新加坡当华文老师，中介费为一万元。随后，所有事务委托中介办理，通过本地教育部的面试后，她来到了这里。但是这种中国中介单独办理，风险很高，一旦服务对象与新加坡的用人单位直接建立了联系，中国中介就很可能被甩掉。在另外一个案例中，由于服务对象与中国中介约好办成收费，一个女华文教师利用来新加坡面试的机会，更改了自己的通信地址。这样，她直接和教育部建立了联系，甩开了中介。²⁷ 第三种是新加坡中介单独代理。选择这种方式的往往是已经来到这里却无法申请到工作准证的人，或是通过在本地的亲友或是新移民网站与中介建立了联系的人。在狮城华人网上，有不少在国内的中国人或是在新加坡即将毕业的

²⁵ “雪莲花”（网名）《陪读一条艰辛的路！！（来新加坡前后的经历）》，见

<http://www.sgchinese.com/bbs/dispbbs.asp?boardID=115&ID=431047&page=1>。

²⁶ 资料来源于 2005 年 3 月开始进行的个人访问，文中女性名字为化名。

²⁷ 同上。

学生纷纷表示“欢迎中介”。一般来说。这种方式提供的服务对象数量较少，不能满足要求，因此公司的主流生意还是会跟中国中介建立联系，而很少采取这种方式。例如，在狮城华人网上，经常能看到新加坡经纪要求与中国经纪建立联系的帖子，却几乎没有新加坡中介主动发帖，招收更多服务对象。

无论何种方式，中介费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中介们各自定价，大概从人民币1万元到7、8万元不等。中介既包括中新两国一些合法的公司，也包括一些非法的私人。由于利润丰厚，甚至有些新移民本身就做起了中介这一行。中国人对于这些中介们的态度是非常矛盾、复杂的。一方面，在中介市场上，从业人员良莠不齐，由于一些人恶意骗取钱财，使中介们往往成为过街老鼠。尤其是那些没有通过中介过来工作、留学的人，对中介更加深恶痛绝。网上声讨黑心中介的帖子，往往能得到大家一致的响应；但另一方面，有些人缺乏进入新加坡劳动力市场的渠道，因此对中介也有一定的需求。在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眼中，中介还是有些用处的。他们通常被迫付了巨额中介费，但是心里并不甘愿，对中介也多有抱怨。新移民对中介的复杂矛盾心态，狮城华人网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在分类广告一版，版主一方面表示“我们开这个版块是为了方便大家交流工作机会，需求帮助什么的，但是最近有人利用这里来骗取大家的钱财……因此我们在这里提醒大家注意非法中介，一定要在确认对方身份以后才可委托。”²⁸ 但是由于网站的特性，他无法验证哪些是黑心中介，感到很无奈，只能“同时告诫那些有欺骗之心的朋友，华人网不是你摇钱树的温床；也希望你能有点良心不要整天都想着欺骗自己的同胞。”²⁹ 在中介市场上龙蛇混杂。版主的态度表现出既承认好中介的积极作用，同时又

²⁸ “fgyhgj”（版主网名）《请大家注意非法中介！违法贴子的登陆IP,联系方式将备案必要时协助警方调查》，见狮城华人网

<http://bbs.sgchinese.com/dispbbs.asp?boardID=163&ID=383061&page=1>。

²⁹ “fgyhgj”（版主网名）《友情提示：警惕理工学院招生骗局》，见狮城华人网

<http://bbs.sgchinese.com/dispbbs.asp?boardID=163&ID=563131&page=1>。

担心网友被黑心中介欺骗的矛盾心态。而一般需要求助中介的网友，也大致都有此种心态。

总而言之，在出国前的信息准备方面，新移民缺乏亲属同乡的照顾，存在着先天不足之处。于是他们采取其他方法（例如通过报纸网站或中介机构），通过后天的努力来弥补。他们不得不更多地靠自己，但是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决不放弃机会向已经在移居国的人们求助。相比较而言，女性更擅长于借助社会关系的力量。她们长袖善舞，在踏上异乡之后，逐渐形成以新移民为主体的社会网络。

第三节 劳动力市场对移民女性限制

Morokvasic 在对欧洲移民的研究中发现，移民后，男性和女性都经历了职业地位的下降，女性的下降比男性更为厉害。³⁰ Hania Zlotnik 也认为：“事实表明，女性，尤其是国际移民女性，薪水要低于移民男性以及非移民的女性。”³¹ 在笔者的调查中，69%的女移民（男移民为84%）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其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为52.62%（男移民为66.66%）。而持有同等学历女性的百分比与男性相差不大，约少14%左右。然而在经济收入上，约54.74%低于配偶或未婚夫；20.55%没有收入。

³² 这说明，本地劳动力市场对移民女性的限制要比男性多得多。那么劳动力市场对女性进入存在哪些限制？对那些成功找到工作的女性，有哪些因素影响她们升职呢？

一、影响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因素

³⁰ Mirjana Morokvasic, “‘In and Out’ of the Labour Market: Imigrant and Minority Women in Europe”, in Katie Willis and Brenda Yeoh (eds.), *Gender and Migration*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2000), pp. 65-91.

³¹ Hania Zlotnik, “Migration and The Family: The Female Perspective”, in Katie Willis and Brenda Yeoh (eds.), *Gender and Migration*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2000), pp.27-46.

³²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进行的社会调查。

1、英文程度

71.05% 的女性认为英文程度是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障碍。余林毕业于北京某重点大学，2002年持依附者签证来到新加坡。在发出了很多封简历后，她得到了面试的机会。尽管她早已经做好了用英文面试的准备，每天都跟英语磁带练习，她觉得自己表现不错，但还是没能过关。面试的人告诉她：“你拿这种准证，如果有一天你先生辞职，你也要走，那我们怎么办呢？”但她认为这理由不成立，肯定是因为英文不过关。毕竟她申请的是社工，需要跟当地社会打交道，讲一口流利的英文是最基本的要求。可是她还不能用英文充分地表现自己。为此她去语言学校学了几个月的英文口语课程，后来终于如愿以偿申请上了社工的工作。在工作了100天后，她接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硕士录取通知，并且提供奖学金。在国大学习的两年里，她“终于彻底过了语言关”。也在毕业后，顺利找到新的工作。³³

一般而言，女移民在找工作初期会遇到英文沟通不良的问题。她们通常采取三种形式提高英文能力：一种是参加英文培训班；第二种是到新加坡大学或私立学校接受英文教育。在获得本地更高文凭的同时，也大幅度提高了英文程度；第三种是看英文频道电视剧，多和讲英文的人交流以提高口语的能力。高学历女性过不了语言关也往往只能和低学历女性一样去做餐厅助手等薪水少且劳累的工作。能够认识到英文程度这个不利因素，正说明她们能够理性面对现实，客观分析形势，心平气和地面对困难。

2、在中国的工作经验和学业文凭不被承认

25% 的女性认为在中国的工作资历和学业文凭不被承认使她们很难进入劳动力市场。众所周知，有三种渠道获得中国的大学文凭：一种是高中毕业前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第二种是通过自学考试；第三种是通过成人高考。中国政府对三种文凭都承认，因此很多拥有自学考试文凭以及成人高考文凭的女性可以在国内找到较好的工作。但移民后，由于新加坡政府不承认通过自学考试和成人高考取得的大学文凭，这使一些女性移民很难找到跟国内专业有关的工作，很难拥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可是笔者在访谈中

³³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进行的个人访问，文中女性名字为化名。

发现，国内著名大学的正规毕业生在寻找工作的时候也会面对这种困难。春爱毕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酒店管理专业，学士学位。1998年来到新加坡。按理来说，国内重点大学毕业，英文又好，似乎找到一个对口的工作不成问题。但她无数次碰壁。等到终于有一家酒店同意接受她做前台接待员，仍然不承认她的学历，仅仅按照本地初级学院毕业生对待，薪水只有1000多新元。春爱无奈接受了这份工作。后来心有不甘的她辞职参加了英文注册会计师的考试，取得证书后从容地转业了。³⁴

在新加坡，是否承认中国大学的正规毕业生是由用人单位自主决定的。节省成本往往是最大的考量。接受苛刻的条件就要忍受剥削；不接受则根本没有工作，这让女移民进退两难。持依附者准证过来的女性，即使是高学历、英文好、工作经验丰富，也往往被雇主以不具备本地学历、工作经验为名付给较低的薪水。相反，男性很少有人持依附者准证入境，他们的工作多是新加坡雇主去中国招聘时得到的，因此很少面对原有学历、工作经验不被承认的问题。

至于那些持工作准证来到这里的女性，她们在中国的学历均受到新加坡雇主的承认，但是不少人也同样面对限制，这主要体现在工作经验上。以教育部为例，在中国两年的教书经验相当于本地的一年，由于从事教师工作的性别比例在中国一向严重失调，因此女移民受到的影响更大。无论是在工作起薪还是工作经验的算法上，她们都无法跟本地女性相比，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这种情况既然无法改变，女移民们也只能坦然接受，要求自己做得更好。很多人利用业余时间攻读更高的学位，就很能说明她们这种积极向上的心态。

3、社会歧视

22.37%的女性认为社会歧视是妨碍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因素。新加坡钩球协会主力队员张君在一篇文章中写下了自己多次面试求职的经历。“很多机构听到是中国人就是一个回答：不请中国人！毫无一点考虑的余地。好不容易有了一次面试的机会，可是那个老板用华文对我讲：‘你们这些中国人，总是不守本分，新加坡真的是遍地黄金吗？’面

³⁴ 同上。

对这样的问题我哑然，坐在椅子上不寒而栗，脑子嗡嗡直响，恨不得立即夺门而出。他又用回他的英语：‘Sorry, I am not interested in Chinese’（对不起，我对中国人不感兴趣）”。她感到羞辱万分，“背后像有千万只手在指指点点、冷冷戳向我的脊背……有一种冲动想立刻回国。”但最后她仍然选择了坚持。“在这种心境下我再应征了几份工作，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找到一间公司肯给我一个机会，虽然不是很理想，但回想这几天的奔波和自身有限的工作能力已经很安慰了。”³⁵

对陪读妈妈的社会歧视最为明显，于是有些人干脆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在一个案例中，陪读妈妈宋凤在中国时是会计师，可在这里只能靠打零工来维持生活。她在访谈中表示：“跟谁（指雇主）我都不说自己是陪读妈妈。谁敢说呀？我就跟他们说，我是永久居民，嫁了新加坡人过来的。他们也不会仔细问。毕竟谁愿意花钱去替我申请准证呀……有一次，我去唐城坊找工作，人家一听我说话，就说：‘中国人？是小龙女吧？’我就半真半假笑说：‘我是小龙女她妈！’”后来她辞了这种不固定的工作，托朋友找了一份酒店打扫卫生的工作，成功了。³⁶

4、法律上的限制

2.63%的人认为中国女性也面对着法律限制的问题。首先，以家庭团聚入境的女性会受到一定的法律限制。Hania Zlotnik指出：“不仅一些社会藩篱妨碍移民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在一些国家，以家庭团聚名义入境的女性也禁止进入劳动力市场”。³⁷ 新加坡也有这样的法律规定。以旅游签证过来结婚、后来得以延签的女性不可以工作；持依附者准证不可以工作。这些规定虽然限于一定的时间里（例如一旦女性拿到永久居民身份就可以出外工作），但至少缩短移民女性的工作年限与工作经验，使她们

³⁵ 张君〈在新加坡打球的日子〉，见《中国女子的新加坡》（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2年），页79。

³⁶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的个人访问，文中名字为化名。

³⁷ Hania Zlotnik, “Migration and The Family: The Female Perspective”, in Katie Willis and Brenda Yeoh (eds.), *Gender and Migration*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2000), pp.27-46.

的薪水无法跟同样教育程度、同样年龄的新加坡女性相当。相反，移民男性很少因家庭团聚入境，因此也很少受到这种法律上的限制。

其次，新加坡的一些有关规定对陪读妈妈的限制较多。一般来说，从中国到新加坡的前半年时间里，陪读妈妈要支付的各种费用最少也要6万元人民币。而孩子要在新加坡完成从小学一年级到中学毕业的课程至少要准备100万元人民币。除了少数人家境富裕可以从中国带钱来支付外，大部分人只能在这里打工赚钱。2003年政府曾经收紧陪读妈妈工作签证条例。后来在各方的争取下，同年11月新加坡人力部推出了陪读妈妈工作条例最新修订版，其主要内容是：（1）、凡2003年11月1日之前来新加坡的陪读妈妈，除少数不允许工作的行业（如：按摩、酒吧、陪舞等）外，均可以申请工作；（2）、凡2003年11月1日之后来新加坡的陪读妈妈，应该以陪护自己孩子学习为目的，至少在孩子正式进入政府中小学学习的第一年内不能申请工作。这意味着她们必须准备足够的资金维持母子的正常学习和生活。条例内容还包括，如果有证据显示孩子不能正常学习，已工作的人将会被强行劝阻继续工作，全身心照顾孩子。³⁸ 不够富裕的妈妈们在花了一大笔钱来到新加坡后，还要准备一年的生活费用（至少人民币七八万元），坐吃山空，在重压之下只好偷偷地打工。在到此地满一年后情况也并不乐观，她们所能申请到的工作种类实在少得可怜，大部分是餐馆服务员、加油站杂工等工作。在狮城华人网，网友“一无居”写道：“在新加坡的中国陪读妈妈连脚底按摩师的工作政府都不给做，只给马来西亚女子做，看来中国陪读妈妈只有偷偷跑去当野鸡了。”³⁹

综上所述，从女移民的调查结果来看，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障碍高居榜首的是英文程度（71.05%）。这说明她们对自己以及外在环境有清醒客观的认识：只有适应英文社会的要求才能生存得更好。在陌生的环境里，她

³⁸ “skyblue”（网名）《转帖：陪读妈妈工作准证最新条例》，见狮城华人网

<http://www.sgchinese.com/bbs/dispbbs.asp?boardID=115&ID=397620&page=1>。

³⁹ “一无居”（网名）《陪读妈妈》，见狮城华人网

<http://www.mysingapore.org/bbs/cgi-bin/topic.cgi?forum=1&topic=44>。

们懂得努力打拼、积极进取，而不是自怨自爱、怨天尤人，反映了一种乐观平衡的心态。

二、影响移民女性升迁的因素

有些女性或顺利或历经磨难找到工作，但是却发现单有努力工作是不够的，她们仍然面对升职难的问题。那么在她们眼中有哪些因素影响职位升迁？

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发现高居第一位的仍是英文程度（64.47%）；其次身为外国人（46.05%）；工作表现（34.21%）位居第三；以下依次为社会偏见（23.68%）、性别差异（22.37%）。⁴⁰

1、英文程度

新加坡虽然华人占多数，但和传统的华人社会仍有很大的差别。社会通用的官方语言不是华语而是英语。女移民作为外国人，与本地人相比语言是明显的劣势。由于英文为第二语言，很多人在充分表达上还是有点局限。这劣势使得她们能够做好自己的事，但却无法用英语和同事进行充分的讨论和交流，因此很少能够领导一个跨部门小组，这无形中影响了她们的晋升机会。在一些案例中，有的学校的女教师努力工作了五年也没有机会升职，被提醒应该加强英文能力。也有的学校，女教师在工作合同期满后不获续聘，被告知是因为语言能力较差，无法融入跨部门的合作和讨论。⁴¹ 为了克服英文这个障碍，很多人选择继续进修。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每年都有一些华文教师攻读兼职硕士或博士学位，除了必修的学分外，她们也趁机利用国大设施参加额外的对外国学生开设的英文课程。希望在读一个更高的学位的同时也能提高英文。她们将英文视为升职的最大障碍，说明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长处与局限。

2、身为外国人

影响升职的因素中第二重要的是身为外国人（46.05%）而非工作表现（34.21%）。这说明在女性移民的心目中，她们并不认为升职制度有多么公平。俗话说，“英雄莫问出处”，这种理想化的形式在本地一些大学中

⁴⁰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进行的社会调查。

⁴¹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进行的个人访问。

可能存在，但在企业、机关内部一般都是本地人优先。在本地人优先升职的同时也意味着外国人无论能力、工作表现如何，她们的机会都要在一段时间里被扼杀。

Linda Low 认为：“尽管政府不断解释引进外国人才以及加大力度的必要性，但是在新加坡本地人之间，一种本能的害怕被更廉价更有竞争力的外国人取代的想法非常盛行”。⁴²

那些直接跟外国人才竞争的本地人觉得自己作为新加坡人应该有优先权。大学毕业后没能找到工作的李慧敏这样写道：“我并不是很明白，在本地受大专教育的外国人毕业后对新加坡所能作出的贡献跟本地学生的有什么差别？如果一个外国人所能做的事，新加坡人也胜任有余，老远把人吸引过来意义何在？为什么我们不把这笔教育费用使用在另一名新加坡学生身上？”⁴³

本地大学生小钉儿写道：“我也认为，吸引外来人才的政策势在必行，不过，也许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一点的是，让人才自然的加入我们的队伍，融入我们的社会，而不是让外来人才以高姿态直接取得竞赛机会。体育运动如此，各类校际比赛更应该如此，以双赢的方式消除彼此的矛盾。”⁴⁴

本土专业人才梅子也认为：“上层决策人一味往外看，倘若有才干的人不受到国家的重视，社会的肯定，在外才和内才之间又缺乏适当的评估制度，得不到重用，他们只好离家‘出走’，另谋高就，到一个会被把他们当作‘人才’看待的地方。期望那个地方，也像我们现在这样歌颂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外来的道士会捉鬼……。这将是一场新世纪国际都会的

⁴² Linda Low,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igrant Worker Policy in Singapore”, in Yaw A. Debrah (ed.), *Migrant Workers in Pacific Asia* (London, Portland, OR: F. Cass, 2002), pp.95-116.

⁴³ 李慧敏〈从无业游民的心声看外国人才政策〉，见《联合早报》，2001年8月22日。

⁴⁴ 小钉儿〈以双赢方式接受外来人才〉，见《联合早报》，1999年9月1日。

‘换血’运动！试想，如果我们的国民一直很努力（体现于所谓的终生学习），却老是捉不牢那个向上爬的梯子，那是多令人气馁的事。”⁴⁵

新加坡人向来很少公开反对政府的政策，因此在平面媒体上的文章并不一定能真实反映多数新加坡人的真实想法。但是在网上我常常能看到当地人的心理状态。在新传媒的网站上，在一个议题《外来人才是否跟本地人抢饭碗？》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一般新加坡人的真实想法。本地人

“lala” 在回击一个网名为“菲菲”的新移民时说：“我们当地人（能力）根本不输给你们。我们输（指被抢饭碗）的主要原因是，你们的薪水比我们低……许多外国人把新加坡当作跳板，他们永远不会放弃原本的国籍……他们只是来这里赚更多的钱……如果我们需要他们，我们本地人必须首先被喂饱。”

一个自称“美女”的人写道：“菲，你说你是外国人才？哈哈！别臭美！不是所有的外国客工都是人才。有很多来本地工作的外国人都跟你一样臭屁！你不知道本地人要求高，新加坡老板为了省钱才请你们这些外国人。如果你真的要说你是外国人才，我想我家的女佣人应该是和你一样等级，我真的是请不起本地女佣。”

“烤肉”回应道：“是啊！是啊！那些收碗碟、倒垃圾的清洁工人都成外国人才了！因为他们来了，害得我们的uncles aunties 都在40岁时变老。没有雇主愿意请他们。这样算不算是外来人才抢走了本地人的饭碗？听说那些外地来的清洁工人赚的少得可怜，让他们继续来，真的是抢走了很多本地人的饭碗。”

“Talk Facts”写道：“不是外国人比我们聪明，而是他们比我们便宜。这就是他们能够抢去饭碗的原因。也许对你们这些家伙，新加坡只是一个名字，但对我们，新加坡不是一个名字，它是我们的国家！50年、100年之后，甚至永远，它都是我们的新加坡！”⁴⁶

⁴⁵ 梅子小钉儿〈只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见《联合早报》，1999年8月20日。

⁴⁶ 《外来人才是否跟本地人抢饭碗？》，见新传媒网站

http://forum.mediacorp.com.sg/ch8cforum/view.php3?bn=channel8_chucrossfire2&key=1110363815&first=1116262448&last=1114266631&here=。

网上讨论呈一边倒之势，本地网民的观点比较一致：他们在能力上不比外来人才差，被抢走饭碗是因为他们“贵”而外国人“贱”。有些人混淆了外国人才与外来劳工的差别，显示出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狭隘心态。这种观点在新加坡社会颇有代表性。

新加坡人“贵”而外国人“贱”，在何种程度上是事实呢？一般而言，持工作准证入境的中国男性和女性，多是新加坡企业去中国众多的应征者当中挑选的佼佼者，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雇主选择面大，他们在能力上更可能高于本地同事，他们不一定比本地同事“贱”。但是，若是这里的“外国人”指的是那些因家庭团聚入境的女性那么很可能是事实。雇主出于节省成本的考虑，而女移民也迫切需要将依附者签证或长期社交准证换成工作准证，双方互有所求，因此女移民很可能接受比本地同事低的薪水。但是在升职上，企业通常还是本地人优先，因此新移民无论男女都同样受影响。

女移民阿乐看到中国人在升职上的局限，“中国人大部分做的工作是新加坡人不屑去做的，就算有本事的中国人凭自己实力做到了较高的职位，但就再也升不上去了，因为管理层岂能让中国人给占了去？就是让给别国人，也得拱手给老美老英（指美国人、英国人）呀！”⁴⁷

在这种局限之下，移民女性的工作相对男性更为低层次一些。上面提到，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女性比男性约少 14%，但是在职业上这差距进一步拉大。在新的土地上，成为专业人士、技术人才和管理人员的女性比男性少 22.04% (28.94%vs 50.98%)；而从事低层次销售、服务业以及生产制造业的女性则多出了 17.51% (26.31%vs 8.8%)。此外，18.42% 的女性被调查者为家庭主妇；而男性却无一人为家庭主夫。⁴⁸ 根据调查结果，多数移民女性对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己的长处与弱点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也会根据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一般而言，较为成功的女性大约从事三类工作：第一种为艺术、体育类人才。由于新加坡从事这种行业的人少之又

⁴⁷ 阿乐〈活在阳光里〉，见《中国女子的新加坡》（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2年），页 66。

⁴⁸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 2005 年 3 月开始的社会调查。

少，水平较低，缺乏竞争，因而也就比较容易闯出名堂。例如，乒乓球女将井浚泓、歌唱家刘小红、舞美设计师吕萍。第二种为从事保险、推销业的女性。她们的成功是靠后天的勤奋苦干。从事这种行业，不必受外国人身份等条件限制，甚至不必受语言限制（有些人的推销对象均为中国人，甚至比公司中其他本地人业绩更好）。对她们来说，新加坡是一个公平的地方，努力就能成功。第三种为专业人士。尽管受外国人身份所限很难升上管理职位，毕竟薪水比多数非专业人士要好得多。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只有移民女性面对种种限制，对移民男性的限制也同样存在。但多数男性（除了学生）在来新加坡前就已找到工作，因此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面对的问题就显得比较突出。在就业方面，女移民比男移民受到的限制更多，更不用说与新加坡女性相比了。在新的国度里，在种种不利条件下，虽然要面对一些人怀疑的目光，但她们能够主动参与劳动力市场，积极克服那些可以克服的困难，显示出不断向上的进取心态。但我们也应注意到，虽然女移民在媒体上总是跟负面消息相关，是一些人心目中的“他者”，抢本地人的饭碗，但是在现实的劳动力市场上，冲突并不总是存在。很多本地人都能和女移民同事和睦相处，反映出在一些人心目中“自我”与“他者”的主观想象，在现实的劳动力市场上虽然能够呈现一部分真实，但也存在一些疏离。

第四节 结语

本章的讨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女性进入本地劳动力市场与移民过程密切相关。这一过程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化以及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之下发生的。这些因素为她们加入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必要条件。

第二，爱丽森·玛齐等人的社会网络理论，当我们应用到来自中国的女移民身上时，只能说部分适用。爱丽森等人看到女性承担了养育幼儿的大部分责任的事实，但是移民女性的社会网络并没有因生育而缩小。为了实现出国的梦想，移民女性往往能够克服养育责任所带来的种种不利而发挥女性擅长构建及维护社会网络的特点，使社会关系为自己或丈夫出国工

作、生活铺路。她们比男性更依赖社会关系。此外，在出国工作信息的获得上，依靠报纸和网站都是新移民最主要的渠道，在信息不畅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向中介机构求助。

第三，大批新移民的到来以及加入劳动力市场，给本地社会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当地人的感受是可以想见的。关于“外来人才抢饭碗”的讨论，实际上是一些人心目中“自我”与“他者”的意识在就业市场上的客观反映。由于多数男性移民（除了学生以外）在来这里前就已经找到工作，女性在就业或升职时受到的限制就会比较明显。这些限制包括：英文熟练程度、外国人身份、在中国的文凭、工作资历不被承认等。一般而言，高学历女性只要过了语言关，又肯接受较低的薪水，还是可以找到工作的。新移民无论男女，无论有多能干，其升职机会也无法跟本地人相比。在现实生活里，女移民往往能够在这限制中争取机会，显示出积极向上的心态。虽然她们在媒体上总是与负面新闻相关，但是也要注意现实生活中并不总是冲突的一面。很多本地人都能够与女移民同事和谐相处，这也反映出一些人心目中的“自我”与“他者”的主观想象，与现实的劳动力市场还是有一定疏离的。

下编 性别与移民：民族国家

第六章 新移民与民族国家——中国

“民族国家”（Nation-State）这个源自西方的概念出现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是建立在固定疆域上的政治实体。在这疆域内，国家的制度有权通过法律实施政策。在国际法下，这些疆域是固定的，国家有权保护其边界，控制其境内人口、资金和资源的流动”。¹ 在当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穿越国境在两个甚至更多的国家内安家，民族国家已经不能有效地控制人口、资金和资源的流动，它受到了强烈的挑战。通常民族国家也会采取各种方法将人口外迁对国家凝聚力的影响减至最低。就中国而言，20世纪90年代跟80年代相比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中国政府加大号召爱国主义的力度和国内民族主义的重新抬头，这引起了国外一些政府和学术界人士的极大注意。王赓武教授认为：“爱国主义在中国的领土内，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是建设性的，但伸展到国外的华人或华裔，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海外华人跟台湾、港澳的企业家纷纷投资中国大陆，给沿海各省的经济改革很大的刺激，这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对海外华人会不会响应爱国主义的号召？西方国家尤其关心，部分东南亚国家也发出了一些比较带有警告性的口吻，常常会问的一个问题是，海外华人将来会不会忠于大中华？会不会将文化中国演变为支配性的新东亚文明？”² 显然，一些政府和学者对海外华人（尤其是新移民）会不会响应中国政府的号召成为民族主义者充满疑虑。那么具体到新加坡，笔者

¹ Katie Willies and Brenda Yeoh, “Introduction”, in Katie Willies and Brenda Yeoh (eds.), *Gender and Migration*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2000), p.2.

² 王赓武〈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见刘宏、黄坚立主编《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页120。王赓武认为爱国主义就是变相的民族主义。

在此提出问题：面对中国政府爱国主义的号召，新移民的回应如何？是否存在性别差异？

第一节 新移民民族主义何以复兴？

“民族主义”源自西方，关于其定义，学者们没有统一的意见。Anthony D. Smith 的定义颇有启发性。他认为民族主义有四个含义：“1、作为民族形成的一般进程，有时被称为‘民族建构’（尽管这一术语常常包括‘国家建构’的进程）。2、作为一种‘民族情感’，或属于一个‘民族’的情感、态度和自觉以及关心它的利益、力量和安全的精神。3、作为一种达到或维持‘民族’地位的政治目标的行动，它利用一个或多个组织来实现这些政治目标。4、作为一个教条或意识形态，将‘民族’利益放在中心地位，寻求它的自治、统一和身份。”³

关于海外华人（华侨）民族主义，本文采用刘宏的定义。在他看来，海外华人（华侨）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一种行动，这种意识形态和行动显示出对中国利益以及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生存的深度关心。它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它也努力将海外华人社区在特定的地域里团结起来，给海外华人带来自豪感和尊严。”⁴ 由于本地特殊的政治气候，笔者更多地强调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

Pál Nyíri 认为，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复兴是中国政府成功动员的结果。⁵ 不可否认，今天海外华人民族主义的复兴确实是中国国内民族

³ 转引自Liu Hong, “New Migrants and the Revival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4, No. 43 (2005), pp.291-316.

⁴ 同上。

⁵ Pál Nyíri, “Expatriating is Patriotic? The Discourse on ‘New Migra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among Recent Migrants from PRC”, in Brenda S.A. Yeoh and Katie Willis (eds.), *State/Nation/Transnation: Perspectives on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120-132.

主义复兴扩散到国外的，但是没有新移民自身自认为属于中华民族，自身对民族主义目标的认同，中国政府外部的作用并不一定会产生效果。笔者认为本地新移民也分享了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这是新移民自身以及中国政府政策内外因的结合，两者缺一不可。刘宏指出：“正如大量有说服力的历

史性研究证明的，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产生以来，海外华人民族主义受到两组相互交织的因素的影响，中国国内政治的变化和对华人华侨政策的变化，以及海外华人社区新情况的影响。”⁶ 当我们理解本地新移民民族主义的复兴时这一框架也同样适用。

一、复兴的外因——中国政府新移民政策的推动

中国的新移民政策不是针对东南亚国家而是着眼于全球范围内的。邓小平时代，为了培养人才建设国家，他派遣大批学生、学者去美国等发达国家学习，这项政策在实践中也在不断调整。在1980年代，政府对留学生发出的号召基本上是“回国服务”，这在会见美籍华人李政道教授时和会见后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中体现出来：“人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有几万名留学生在外国，这是财富，要争取他们回来。我们要加强同他们的联系。一个是搞博士后的方法，一个是特区、开放城市招聘留学生的方法。把他们吸引回来，还要想更多的方法。博士后只是一小部分人，要从更多的方面来考虑。有许多框框束缚我们，要改革。招聘要有对象，有名单。要赶快搞规划。尤其是科学研究机构，现在就要去招聘。把最优秀的先招聘回来。所谓少讲空话，多做实事，这就是实事，要落实到单位，落实到人。最优秀的，招聘的条件要提高。”⁷ 此外，他在1986年11月3日会见美籍华人陈省身教授和夫人时的谈话中也谈到：“最好的人才不用才是真正的损失。要努力争取在国外学习的人回国，并为他们创造较好的工作条件，使他们回国后能发挥专长。国内办高科技中心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吸引人才回国。对少数尖子人才的待遇可以高一些。应

⁶ 同上。

⁷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页1061。

该向尖子人才提供较优厚的待遇。对有才能的人应该破格评级提升。”

⁸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自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以来，中国人才大量流失，很多出国的人由于各种原因不愿回国永久定居。自70年代末以来，有32万多学生出国学习，将近一半在美国，但是回来的人只有11万，仅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中1990年只有1593个回国者。根据 Zweig 在1997年的调查，在美国的大部分前留学生并不打算回国。显然“回国服务”对前留学生的吸引力并不强。⁹

1990年代，中国政府加大了调整留学生政策的力度。一个重要的差别是：对留学生的号召由“回国服务”变成“为国服务”。1993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方针，明确指出要采取多种形式鼓励海外人才为国服务。随后在《关于加速科技进步的决定》中发出号召：“欢迎他们（指海外留学人员）以多种形式为祖国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很多留学生中，有这样一个口号：“留下比回去发挥作用更大。”“为国服务”极大地激发了前留学生（尤其是那些不想回国的留学生）的积极性。所有这些都营造了一种宽松的政策氛围，极大地调动起海外前留学生为国服务的热情。

而对广大的海外华侨，中国政府基本上还是呼吁他们支持中国的统一和民族振兴。例如邓小平在《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中谈到：“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¹⁰ 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是中国主要的民族主义目标。这个目标在中国国内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中国政府在这一点上与人民是一致的。但是中国国内的政策并不必然

⁸ 同上，页1150。

⁹ Luo Keren, Fei Guo and Huang Ping, “China: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Emerging Trends of Reversal of the Brain Drain”, in Robyn Iredale, Fei Guo and Santi Rozario (eds.), *Return Mig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Cheltenham, UK;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3), pp88- 111.

¹⁰ 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362。

影响到国外。侨务政策提供了民族主义复兴的外部推动力，但民族主义复兴还需要有内部因素，这就是刘宏所说的“海外华人社区的新情况”，在本文中就是本地新移民社区的壮大。

二、复兴的内因 —— 新加坡新移民社区的壮大

中国政府的新移民政策能够部分起到外部强化的效果。事实上新移民自身如何选择、如何应对也十分重要。尤其是新移民人数不断壮大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也就更加重要。

自1990年中新建交后，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成果以及新加坡的引进外来人才政策，又一股庞大的人群踏上新加坡的土地追求他们的梦想。

《扬时代》的记者这样描述道：“他们从中国大陆通过知识移民、亲属移民、投资或劳务移民等途径移居新加坡。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已经加入了新加坡国籍或者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还有一些持其他居留身份如亲属准证、工作准证、长期社交准证、学生准证等。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到新加坡来求学、办企业、办教育的人会越来越多。现在（2004年）新加坡上市的中国企业就有28家，来新加坡旅游的人数一年就达69万。”¹¹ 而新移民的总数目前很可能将近30万。

虽然新移民与本地华人有共同的祖先，但对中国的态度存在着一些巨大的差异。陈国贵认为：“新加坡年纪大的华人还将中国视为家乡，但他们的人数已经大大减少，正在迅速地消失；而年轻的新加坡华人，中国和家乡对他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他们出生在新加坡，对祖先居住的地方没有感情。很多人没有去过中国，对中国没有什么感觉；那些少数去过中国的，他们带着负面的印象回来。”¹² 新移民对中国的感情则很不同。刘宏指出，新移民“都出生、成长在中国，中文是他们的母语；此外，他们都在中国家乡有亲友和社会关系。他们都很关心甚至有时卷入到中国事

¹¹ 宋妮〈深化友谊、增进合作——访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张九桓先生〉，见《扬时代》2004年3月、4月刊，页1—2。

¹² Chan Kwok Bun, “Interrogating Identity, Ethnicity and Diaspora: Three Cases Studies of the Ethnic Chinese”, in Danièle Joly (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4), p.188.

务中去。”¹³ 作为第一代移民，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对中国家乡的感情依恋与早期华侨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新移民“教育水平远高于早期的华侨，又限于小型的工商行业，有很多是专业人才、经验丰富的管理和行政人才、科技人才、学者、文人、记者、美术演艺人才，在经济领域又有银行财政专家、大企业家、房地产业、旅游旅馆的大企业家等等，真是数之不清。他们都有便于携带的本事和资格，移民再移民，出国再出国，都不是一个大问题。”¹⁴ 在当代资讯发达、交通便利的情况下，新移民精英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教育背景将自己认同的民族主义目标传播得更为广泛。

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中新建交至今的十五年正是中国国内民族主义重新高涨的时期，很多新移民在移居新加坡之前就具有深厚的民族主义感情。若自身对民族主义目标没有认同感，处于中国疆域之外，中国政府纵有再好的政策也很难发挥效用。新移民自身是从90年代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中国大陆走出来的。他们曾处于那样的大氛围里，历史烙印很难轻易抹去。

1990年代的中国与80年代相比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出现了民族主义的高潮。事实上其他的（前）共产党国家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克内则威克（Djurđja Knezevi）提出问题：“让大多数西方人感到困惑的是：民族主义出现得如此迅速，而且在那些共产党政权统治了半个世纪的国度里，它这样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¹⁵ 就中国而言，笔者认为近年来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基本是对国际事件的反应，表现了民众对国家安全的极大关心。例如美国1993年联合一些西方国家阻挠中国申请奥运会，两三个星期以后美国海军登上中国商船无理检查制造出的“银河号事件”，1996年美国允许李登辉入境访问，并派第七舰队来台湾海峡威慑中

¹³ Liu Hong, “New Migrants and the Revival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¹⁴ 王赓武〈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见刘宏、黄坚立主编《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页132。

¹⁵ Djurđja Knezevic著、北塔、薛翠译〈情感的民族主义〉，见陈顺鑫、戴锦华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页143—153。

国军队等事件的长期刺激，导致了1996年夏天可以视为中国民族主义宣言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洛阳纸贵。郑永年博士对中国民众的心理分析得十分透彻。他认为，“八九”北京事件后，“欧洲事件，特别是苏联解体以后，中国领导人判断此后国际上的敌人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国，并会以各种方式找中国的麻烦。国际形势的变化激发了很大一部分中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其一是海湾战争。海湾战争意味着什么？中国国内展开了一场讨论。美国显示出其强大的军事威力。这表明美国会以军事和政治各方面围堵中国。苏联的崩溃和冷战的结束，中国失去了冷战时期三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角色。美国自然会根据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建立符合其利益的世界新秩序。其二，中国申请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失利使很多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严重伤害。其三，西方知识界掀起的‘围堵中国论’使中国知识分子和领导阶层深深觉得西方亡我之心不死”。¹⁶ 这种外来的刺激，与中国过去被宰割的屈辱历史相遇时会产生巨大的爆发力。

近来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让背负民族历史包袱的中国人想到了过去屈辱的历史，从而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沉重的“中国意识”的形成，既有生为中国人、继承历史包袱少有选择的一面，也有后天文化环境大气氛的影响。尽管新移民离开中国，但长期在中国历史文化中形成的一些价值观已经内化，即使在移民后也很难彻底消除。这些价值观也包括中国历史经验总结之一——统一国家繁荣、分裂生灵涂炭。在海外，当新移民内化的价值观（包括爱国、寻求统一）遇到外部中国政府的爱国主义号召，个人对国家的义务被不断提醒，当中国利益受到外来威胁的时候，新移民的民族主义感情也就自然被激发了。

第二节 新移民民族主义复兴的途径

王赓武教授认为：“现在我们面对中国富强而号召爱国主义（他认为爱国主义就是变相的民族主义）的时期，虽然这个号召是针对本国的人

¹⁶ 郑永年《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8年），页160—161。

民，而不是对海外华人，但海外华人的反应和选择是不可避免的”。

¹⁷ 一些新移民已经内化了的民族主义感情是在中国政府的号召下激发的。那么中国目前的民族主义目标是如何传达到海外（这里特指新加坡）来，从而激发了人们的民族主义感情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

1、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的活动

在新加坡，中国大使馆作为政府的官方代表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活动来促进民族主义目标的实现。重大的民族目标首先是台湾问题。由于台湾岛内民进党人谋求独立的步伐加快，解决台湾问题就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棘手而紧迫的问题。关于台湾问题，中国国内有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任何中国政府，不管谁当政，也不管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政体，都会有差不多的外交政策。例如，不管什么样的中国政府，如果其放弃南海和台湾，都会失去其统治合法性。”¹⁸ 在这一点上，台湾问题是不可讨论的。“中国领导人已经下了决心，如果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就会不惜使用武力。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中国领导人是不会自食其言的。”

¹⁹ 为此，中国大使馆积极争取海外华侨华人的支持。2004年5月21日，本地商界、学术界、新闻界及华人团体代表（主要是新移民）等出席在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举行的“反对台独、维护统一”座谈会。“与会人士一致认为，陈水扁在其‘就职’演讲中刻意回避一个中国原则，以华丽的辞藻玩弄文字游戏，掩盖其“台独”分裂立场。他们呼吁台湾当局认清形势，悬崖勒马，不要一意孤行。”²⁰ 2005年3月15日，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举办《反分裂国家法》座谈会。旅新的中国学者、新加坡华社及中资企业和留学生代表等共30余人与会。“各界代表一致表示，《反分裂国

¹⁷ 王赓武〈海外华人的民族主义〉，见刘宏、黄坚立主编《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页134。

¹⁸ 郑永年《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香港：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8年），页6—7。

¹⁹ 同上。

²⁰ 《新加坡华人举行“反对台独，维护统一”座谈会》，见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04-05/22/content_1484404.htm

家法》的出台十分必要与及时，展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最大诚意，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反对台独、反对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坚定意志与决心。”²¹ 除了台湾问题以外，中国政府还面临一个重要的棘手问题——法轮功。法轮功政治活动目标对准中国政府，信徒分布在世界各地，人数众多，很可能会影响到中国经济建设、统一大业等民族目标的实现，因此被视为对民族国家造成威胁。对法轮功进行揭批、争取华侨华人的支持也成为中国大使馆的重要任务。2001年2月25日，中国大使馆举办了“崇尚科学、反对邪教”座谈会，各界人士100多人出席了座谈会。在会上，留学生代表、访问学者代表、中国商会代表、新中友协代表等纷纷发言，支持中国政府取缔法轮功。²² 同年中国大使馆在新加坡大酒店举办“反对邪教、维护人权”图片展，争取华侨、华人的支持。

23

通过中国大使馆的活动，中国作为一个真实存在的政治实体继续要求它的海外公民履行义务，新移民与中国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继续紧密。

2、中方官员、本地新移民团体的双向交流

在新加坡，新移民团体主要有华源会、天府同乡会、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等。华源会成立于2001年5月，成员为近年从中国来的现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目前有会员近1500人，80%以上为专业人士。它跨越地域、血缘、业缘界限，将来自不同地区、方言、行业的新移民联系在一起。成立以来，中方官员与华源会的交流不断。例如，在2005年8月27日，华源会接待江西省人民对外协会副会长王永祥率江西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友好访问团一行；半个月后的9月14日，华源会组团赴江西参加2005年海外华裔中青年杰出人士华夏（江西）行。而天府同乡会成立于2000年，

²¹ 《驻新加坡大使馆举办〈反分裂国家法〉座谈会》，中国大使馆供稿，见

<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flgif/t187559.htm>。

²² 《中国驻新加坡使馆举办“崇尚科学 反对邪教”座谈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见<http://www.mingjing.org.cn/zxxx/2010226a/08.htm>。

²³ 《张九桓大使在“反对邪教，维护人权”图片展开幕式上的讲话》，见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网页

<http://www.chinaembassy.org.sg/chn/xwdt/t165516.htm>。

主要是一个地域组织，它与家乡的联系也很紧密。²⁴ 例如在2002年，它接待了四川省人民政府的访问团。²⁵

尽管中方官员、本地新移民团体的双向交流主要着力于经济层面，但是通过与中国官员的接触，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讯息还是能够传达到新加坡，想象中的祖国在新移民的心目中变得更加具体。

3、新移民媒体、网站的传播

Pál Nyíri 认为，“在报道敏感的政治议题上（包括对中国政策和美国政策的报道），新移民媒体表达的意见与《人民日报》的差别不大。”

²⁶ 部分原因是技术需要，因为他们通常员工都很少。“他们需要从网上寻找资料来源，使用网上的《人民日报》的部分内容。”²⁷ 本地新移民网站的新闻也主要是从国内网站上转载，因此观点立场比较接近。以狮城华人网为例，在2005年12月23日，网站首页28条新闻中关于中国的新闻就有18条，基本都是从中国国内的网站上转载过来的。例如：“令人愤怒！看看台独分子跑到柏林墙边干了什么?(组图)”、“功夫vs世界职业空手道：普京保镖被当场击倒”、“舆论顿时哗然：央视曝光中国三种新型军机”等新闻，具有明确的民族主义立场。²⁸

新移民媒体与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的立场差别不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通过采访中国官员的方式将国内的信息传达出来。例如，新加坡新移民中唯一的一份刊物《扬时代》在2004年3月、4月创刊号中，社长兼主编宋妮访问了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张九桓，大使在文中提出了对新移民的期望：“新一代的中国移民大都是改革开放后来到新加坡的。

²⁴ 资料来源于华源会网站www.myhuayuan.org。

²⁵ 资料来源于天府同乡会网站<http://www.sc-overseasinfo.net/cjst/cjst10.htm>。

²⁶ Pál Nyíri, “Expatriating is Patriotic? The Discourse on ‘New Migra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Katie Willis, Brenda S.A. Yeoh and S.M. Abdul Khader Fakhri (eds.), *State/Nation Transnation: Perspectives on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126.

²⁷ 同上。

²⁸ 资料来源于狮城华人网<http://www.sgchinese.com/new/100142145.html>。

他们有着较高的知识水准和丰富的专业经验，往往是各自所在领域不可多得的人才。同时他们在中国也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对中国发展有着深刻的了解。既了解中国又了解新加坡，凭着他们自身的良好素质，新移民作为中、新两国之间的重要桥梁将起着推动中新友谊和合作发展的重要作用。一个人不管在哪里，都应该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²⁹ 张九桓大使对新移民的期望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政府鼓励留学生出国态度的真实写照。Pál Nyíri认为，中国政府鼓励出国，传达了明确的信息——“无论教育和社会背景如何，他们（指新移民）都有机会通过在海外成功的方式，证明自己是个好公民”。³⁰ 通过在海外成功才更有可能“为国服务”。而新移民媒体的出现，“在传播有关中国的信息（包括中国最新的政策）方面效率极高，并且使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³¹

总之，通过这三种方式，“不仅满足了人们对中国的信息渴求，也帮助建立了一个能潜在地分享民族主义感情的想象的社区。”³² 尽管在海外，新移民也同样分享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立场。

应该看到，新移民民族主义在本地很少表现为直接高调的政治行动，也很少在杂志报刊上流露出来，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更多地表现在网上。在网上关于中国统一等民族主义目标的讨论中，人们很少有什么分歧，充斥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性别差异并不显著。关于女性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克内则威克指出：“由于民族主义提供了集体的观念，它对女人具有很强大的、独特的吸引力。此间有着各种各样的缘由。首先，在女性和民

²⁹ 宋妮〈深化友谊、增进合作——访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张九桓先生〉，见《扬时代》2004年3月、4月刊，页1—2。

³⁰ Pál Nyíri, “Expatriating is Patriotic? The Discourse on 'New Migran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Katie Willis, Brenda S.A. Yeoh and S.M. Abdul Khader Fakhri (eds.), *State/Nation/Transnation: Perspectives on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125.

³¹ Liu Hong, “New Migrants and the Revival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pp.291-316.

³² 同上。

族主义的运动和意识中，一种‘归属’的感觉得到了有意识而且系统的发展……民族主义似乎提供了某种包容性，它并不排斥女人。”第二个原因是“她为女人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使她们能进入公共领域或政治领域，（在某种程度上）跟男人处于平等的位置；或者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并且得到世人的认可。”³³ 在19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潮中，女性与男性一样参与其中。在移民后，这种在历史文化氛围中长期熏陶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也很难彻底消失。即使放弃了中国国籍，对出生地的认同也会使她们继续在感情上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事业。

新移民民族主义在本地仅仅停留为网上感情宣泄，这与美洲、欧洲国家的新移民的有很大不同。例如，在中美军机相撞以及美国轰炸南斯拉夫中国大使馆的问题上，其他地方的华人直接示威、游行，进行大规模的高调统一行动，但是在这里仅有少数十几个学者、学生向美国大使馆递交了抗议信，规模小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新加坡特殊的政治氛围有关。这说明无论新移民在网上有多么激进，他们在现实生活里的民族主义实践都会受到居住国法律等各方面的严厉限制。

第三节 新移民的政治认同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个人的政治认同（其标准为国籍）并不冲突。也就是说即使一个放弃了中国国籍的新移民，他（她）仍然可在感情上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目标。它给个人留下较多的空间，具有包容性。但是政治认同（其标准是国籍）则不同，它给个人的选择是唯一的，具有排他性。目前多数新移民都在政治上认同中国，那么这种认同在未来能够转为大规模的政治行动，公开支持中国政府的重大民族主义目标吗？象半个世纪以前的爱国华侨支持抗战那样吗？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来探讨一下新移民的政治认同。

³³ Djurdja Knezevic著、北塔、薛翠译《情感的民族主义》，见陈顺鑫、戴锦华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页143—153。

在王赓武教授看来，“海外华人的认同问题，无论如何同中国都分不开：中国的政策、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兴旺、中国的成败，这些都是避免不了的问题”。³⁴ 那么，什么是认同呢？“‘认同’，亦称认定，是指两个以上个体（行为主体）在并存的前提下，彼此在若干方面达到一致或相同，产生心理上、感情上的认定或契合关系。”³⁵ 可分为政治认同、经济认同、文化认同和信仰认同。一般而言，新移民对中国的经济认同、文化认同、信仰认同很少有什么分歧，新加坡当地社会也不太敏感，但是谈到政治认同，不仅新移民内部分歧十分严重，而且本地社会也十分关注。到底新移民在政治上对谁效忠？有些人总会充满疑虑。

所谓“政治认同”，指的是对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吴洪芹认为：“从国家形态方面去界定民族的政治属性就是对国家身份的认同。从法律概念上说，它是以加入所在国国籍为标准的；从政治上看，对国家身份的认同必须与其对国家的效忠相一致。”³⁶ 由于并非所有新移民都能够被接受成为本地公民，而且成为公民还必须符合一定的年限，因此目前的身份并不代表以后的国籍选择。笔者认为在调查中将着眼点放在未来的选择上会比较适当。

根据笔者调查，在被访问女性的女性当中，55.26%表示未来会保持新加坡永久居民（中国国籍）的身份，位居第一；以下依次为成为本地公民（14.47%）、成为其他国家永久居民（6.58%）、加入其他国家国籍（5.26%）。关于男性，表示未来会保持新加坡永久居民（中国国籍）的身份仍居第一（64.71%）；成为其他国家永久居民（中国国籍）位居第二（17.64%）；以下依次为中国国籍、不考虑永久居民（15.69%）、成为新加坡公民（5.88%）、不好说（3.92%），无一人表示要加入其他国家国籍。此调查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将近20%的女性明确表示会加入新

³⁴ 王赓武〈再论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见刘宏、黄坚立主编《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页114。

³⁵ 向大有〈论海外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若干关系〉，见《八桂侨史》1997年第1期，页8。

³⁶ 吴洪芹〈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观念辨析〉，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页1—6。

加坡或其他国家国籍，而男性仅为 5.88%；强调保持中国国籍，不考虑永久居民（这些人将来更可能回返中国）的男性比例（15.69%）、也比女性多一倍多（6.58%）。³⁷ 这说明：相比较而言，女性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当地化倾向，具有实用主义的特点。

通常我们在平面媒体上很少能听到新移民公开谈论国籍问题。这是由于一方面，新移民并不掌握平面媒体资源，另一方面，外来人才是否对新加坡有归属感对本地公众来说非常敏感。在公众领域里，他们通常比较沉默。但是在新移民网站上，关于国籍的讨论一向非常激烈。在本地新移民中，主张保留中国国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1、中国人当然应保留中国国籍

在他们眼中，这是个不需要讨论的问题。血气方刚的留学生更多持这种看法。他们年轻，充满理想主义色彩。主张保留中国国籍的基本上占据上风。在 www.powerapple.com（主要是留学生参与的网站）的一个帖子上，一个网友表示自己在犹豫该不该放弃中国国籍，另一个网友这样回应道：“割开你的手臂，看看你血管里的血是不是中国人的血，你再决定要不要投奔他国吧！”。还有女留学生写道：“我不管别人怎么样，我自己不会换国籍，我男朋友也不许换。”³⁸ 讨论几乎是一边倒的状态。留学生这一类别持保留国籍看法的比例最大。此外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专业人士不愿换掉中国国籍。例如：在笔者的访问中，一个华文老师这样表示：“没想过这问题（指换国籍）。这也没什么可想的，中国人就是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没法改变，费那个劲做什么！”³⁹ 她目前的身份是永久居民，买了房子，与母亲、丈夫、孩子住在一起。而另外一个在会馆杂志当编辑的女移民也说：“我认识的人基本上都是永久居民。有些已经买了

³⁷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 2005 年 3 月开始进行的社会调查。

³⁸ “freefirereal”（网友名）《讨论：新加坡的中国夫妻里，谁更可能换掉国籍？》，见 <http://www.powerapple.com/modules.php?name=forum&file=viewtopic&forum=50&topic=3568>.

³⁹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 2005 年 3 月开始进行的个人访谈。

二手房，多花三万（新币）算不了什么，总不能为了三万块，就把祖国给卖了吧？”⁴⁰

2、以后（尤其是老了以后）会回去中国

叶落归根自古以来就是许多出门在外的游子的梦想。这种想法在今天依然大量存在。在笔者的访问中，一个国大博士生说道：“年轻的时候可以在外面闯荡。老了的时候，我还是要回中国去的。”⁴¹ 也有很多人，抱着给自己留一条路的心理。一个女性专业人士也说：“看看某某（某换掉国籍的著名新闻从业员）吧，她是前车之鉴。现在这里的媒体不用她了，若是没换国籍还可以回国从业呢，可是现在没办法了吧？”⁴²

3、为中国自豪，看好中国未来前景

在新加坡的胡喜梅在自己的著作《中国女孩》中写道：“我遇到一荷兰老人，他一脸的皱纹和善良，他听说我是中国人，手突然便抖起来，握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松。他念不出我的名字就叫我中国女孩。我感动自己有一个伟大的祖国，我能说一口悦耳动听的华语。中国女孩是一个很好的名字。”⁴³ 中国的快速发展表现在经济、体育、航天等各个方面。在笔者的访问中，一个专业人士说道：“中国现在发展很快，我为中国的成就骄傲。就为了以后能继续保持这种自豪感，国籍也不能换。”另一个男性专业人士也认为：“做人不能只看眼前。现在中国国力蒸蒸日上，中国崛起，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做一个大国的国民多有成就感呵！现在的中国，没有谁敢欺负，谁在这个时候换国籍只能说是井底之蛙！”⁴⁴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渴望保留中国国籍往往是基于多种考虑，并非仅凭以上任何一种。事实上，有些人的看法——狮城人的中国新娘更可能换掉国籍，在笔者的访问中并没有得到证实。四位中国新娘都仍然是永久居

⁴⁰ 同上。

⁴¹ 同上。

⁴² 同上。

⁴³ 胡喜梅〈中国女孩自序〉，见《中国女孩》（新加坡：新亚出版社，1996年）。

⁴⁴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的的个人访谈。

民身份，至于不换的原因，她们不约而同表示：“永久居民就够了，换掉国籍没有用嘛！”。

现实生活中，多数新移民仍然持中国国籍，在政治上认同中国。但是，这并没有转化为大规模的支持中国民族主义目标的政治行动。根据笔者调查，在所访问女性中，与中国的联系，位居第一位的是汇寄，占 47.37%，第二位的是帮助本地中国人适应环境，占 38.16%，随后紧跟的是投资中国（17.11%）、参与与中国有关的社区活动（13.16%）以及捐款（2.63%）；男性与女性的活动在排列次序上也出奇一致：按照由高到底顺序依次是：汇寄（60.78%）、帮助本地中国人适应环境（45.10%）、投资中国（23.53%）、参与与中国有关的社区活动（13.73%）以及捐款（3.92%）。⁴⁵ 这些活动说明：新移民与中国的联系主要是基于亲情（例如汇寄比例最高），将家列于国的前面；帮助本地中国人适应环境位居第二以及参与与中国有关的社区活动比较靠后，说明多数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实践还是种族层面的，他们喜欢与同样来自中国的人交往，停留在中国人的小圈子中。但这种交往比较分散，少有什么组织，更没有什么政治目标，并不能迸发巨大的力量。换句话说，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支持中国民族主义政治行动在本地很少能够看到。

至于未来，笔者认为，大规模统一行动的历史已经不可能重演。一方面，是由于新加坡有自己特殊的政治土壤。在政府的强有力控制下，不会允许不符合新加坡利益的行为大规模地出现。加上本地社会向来对政治极为敏感，这些压力也使新移民不会轻易自闯雷区。另一方面，新移民自身对新加坡的认同，会随着融入的加深而逐渐加深，有些人会申请新加坡国籍，转而对这里付起全部的政治义务。随着他们在此定居的时间越来越长，孩子在这里长大、受教育，新加坡在他们心目中的砝码会逐渐加重，而中国会随着父母亲加入或去世而越来越轻。此地会越来越与他们休戚相关。新移民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他们也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政治认同。

⁴⁵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 2005 年 3 月开始进行的问卷调查。

第四节：结语与展望

本章的讨论可以初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一些学者认为海外民族主义的复兴是中国政府推动鼓励的结果，却没看到单有中国政府的外部推动，没有新移民本身的选择，是很难形成目前世界各地民族主义复兴的潮流的。事实上，有些时候新移民自身的态度更为重要。在海外华人民族主义复兴的氛围里，本地新移民也同样采取了民族主义立场。他们在中国历史文化氛围里长大，背负过去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包袱，对外来威胁有着本能的敏感；而且他们是在19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因受到外来遏制而重新高涨的氛围里出国的，有些人在移民前就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对国家统一等民族主义目标的认知已经内化。在移民后，这种内化的感情当中国重大民族主义目标遭受外部威胁时还是会被激发。

第二，当中国对本国人民发出爱国主义号召时，海外新移民也同样面对选择。虽然身居国外，但中国的民族主义目标所要求的具体支持还是能够从大陆传达出去。在新加坡，新移民通过三种方式与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立场保持一致。首先是通过中国大使馆的具体活动。中国大使馆为了一些具体的民族主义目标而寻求海外新移民的理解和支持。其次是通过中国内地地方官员和新移民团体的互访活动。虽然内地官员基本是为招商引资而来，但是国内的信息也同样可以通过他们传达出来。再次，新移民媒体通过对国内媒体文章的转载，使国内的信息在大范围里传播开来。此外，新移民媒体也可以通过采访中国官员的方式跟进国内的形势，与中国内地保持一致。应该注意到，在本地，新移民的民族主义立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网上流露得非常明显，它对女性的吸引力也十分强烈。在现实生活中，新移民的民族主义感情很少在报刊或是实际政治行动中体现出来，没有在欧洲、北美那样大规模的示威。这与新加坡特殊的政治气候有关。因此可以说新移民对中国的支持有限，不可能出现半个世纪前那样大规模的爱国华侨现象。

第三，在政治认同（其标准是国籍）上，女移民的当地化导向比男性明显。在现实生活里，多数新移民都还持有中国国籍。但是对中国的政治

认同在这里不可能转化为大规模的支持中国民族主义目标的政治行动。事实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行动，很多新移民可以回避甚至与己无关。很多人至今与中国的联系仍然很多，但是很少从事国内的慈善或公益活动，多将家列于国的前面。新移民很少参加什么社团活动，几乎很难看到大规模的政治行动。而未来，由于当地社会对新移民的政治选择疑虑重重，缺乏政治层面民族主义生存的土壤，以及新加坡的砝码在新移民的心目中会随时间推移逐渐加重，当新移民离开中国时，确实有些人还保有政治层面的民族主义立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人会加入新加坡国籍，负起对新加坡的全部政治义务，像上个世纪初本地“爱国华侨”的历史不可能重演。

第七章 新移民与民族国家——新加坡

新移民作为外来的群体，与当地土生土长的华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矛盾。“小龙女”、“乌鸦”以及黄娜事件的分歧突出暴露了二者间的心结。如何解决这种矛盾？新移民与本地社会都不约而同指出了一条路：融入本地社会，让“他者”向“自我”靠拢。

在1993年于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商大会上，李光耀资政在演讲中指出：“以为我们彼此之间，以及我们同祖先的国家所拥有的共同点，多于我们同新家园里的同胞，是不切实际的……即使是在新加坡那样的一个以华人占大多数的国家，这种想法也会引起非华人之间的误解和摩擦。在离开中国大陆两、三代人以后，我们已经在我们的国家扎根。我们的利害关系都在我们的家园，而不在我们祖先的家园——中国。”¹这段话传达了两个信息：第一，在新加坡，国家认同优先于民族认同；第二，华人应该认同当地。尽管李光耀演讲的对象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但具体到对在此地的新移民，也可以说这段话代表着新加坡政府的一种期望。2002年5月，在华源会成立一周年晚宴上，李显龙副总理（现总理）明确提出了这种期望：“他们（指外来人才）需要融入我国的社会，成为我国大家庭的一分子。像华源会这样的组织，必须确保会员不会固步自封而形成小集团，以致放慢融入我国的社会。”他呼吁华源会继续联络中国新移民，协助他们在新加坡落户成为新加坡公民，为这里的发展作出贡献。²在民间，2004年3月，新加坡反对党议员谢镜丰代表一部分选民在国会上提出建议，要求政府对拥有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的外国人设下

¹ 转引自郭建文《新环球华人社群》（第五届世界华商大会演讲稿），见世界华商网
络<http://www.wcban.com.sg/index.cfm?GPID=26>。

² 夏婧〈新移民需积极融入我国社会〉，见《联合早报》，2002年5月13日。

五年期限，以迫使他们决定成为公民。³ 这些都反映出新移民是否融入当地是人们关心的大问题，社会对新移民仍然存在着一定的认同猜疑。

那么当地社会与新移民在认同上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呢？刘宏教授认为：“从土生华人以及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认同主要是一种政治选择并与固定的地理概念联系在一起。”但是，从新移民或跨国华人的角度来看，情况是不同的。“认同可以是多重而并行不悖的，而地域也更多地成为一种流动的概念。”⁴ 换句话说，对本地人来说，社会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是一致的，都与新加坡这块土地密切相关；而对新移民来说，社会认同、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可以并不一致。他们的选择可以呈现出多种可能：认同当地社会（或想象中的中国社会），认同这里的多元文化（或中华文化），政治上效忠新加坡（或中国）。

这种多重认同对新移民来说是自然而然的，但是考虑到本地社会的猜疑，新移民也要适当做出调整，做出某种程度的努力以融入社会。华源会会长王泉成表示，“新移民就像是刚嫁入婆家的媳妇，各方面都需要婆家的协助，才能更快、更好地打成一片。刚到的媳妇有些地方做得不好，也希望婆家能够宽容并给予指导……新移民已经是婆家的人了，他们一方面希望新加坡繁荣昌盛，全国团结奋进，一方面又希望能为加强婆家与娘家（中国）的联系作出贡献……借一句福建话说，新移民绝不是‘只会吃饭，不会生子’的媳妇。”⁵ 华源会前秘书长李国生也提出：“新移民有必要积极地融入本地社会……虽然新移民对本地作出了贡献，但不能因此固步自封、自我封闭。”他引用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一段话：“我们无

³ <李显龙：不赞成设定五年期限迫使永久居民申请公民>，见《联合早报》，2004年3月12日。

⁴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232。

⁵ 黄芷薇<20元人民币闯异乡狮城闯出一片春天>，见《联合晚报》，2001年11月1日。

法防止他人敌视我们，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谅解和同情，不让自己敌视他人。”⁶

那么，新移民作出了哪些努力以融入本地社会？他们采取了怎样的具体措施？

第一节 社会认同的塑造

2003年2月12日，本地人吕棕在联合早报发表《新移民宜入乡随俗》，要求新移民融入社会。在他看来，新移民自大狭隘，年轻一些因为专业文凭而瞧不起人；他们喜欢跟自己人交往，封闭在中国人的小圈子中；他们的语言和生活习惯都是融入新加坡的障碍，应该向本地人看齐。⁷ 这种观点在此地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出新移民面对着社会认同的问题。那么，面对主流社会融入社会的要求，新移民有何种反应呢？

在进入讨论之间，笔者必须先对社会认同加以界定。王春光认为，“社会认同的含义，包括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对有关权威和权力的遵从等等。”⁸ 本文中，笔者采纳“对自我特性的一致性认可和对周围社会的信任和归属”两个含义，来特指新移民群体通过对自身身份一致性的塑造，在心理上、感情上与新加坡社会契合，它是融入本地社会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新移民进行了种种重塑社会身份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极参与本地慈善、文化交流等活动

新移民有组织的以本地为导向的活动，一为以社团为组织；二为以网站为组织。本地的新移民社团主要有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华源会、天府同乡会等。其中华源会在成立后的一年里，艺术团先后到本地的学校社区举行了十多场演出；为新加坡同济医院义演筹集科研经费；主办全国华族

⁶ 李国生〈新移民要积极融入本地社会〉，见《联合早报》，2001年10月27日。

⁷ 吕棕〈新移民宜入乡随俗〉，《联合早报》，2003年2月12日。

⁸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见《社会学研究》

2001年第3期，页63—75。

文化节《今夜笑声连连》小品晚会。会员们积极参与政府鼓励国人说标准华语的努力，在假期为学生们举办“快乐华文营”，并与《联合早报》联办第四届全国华语演讲比赛，共计举行三十余次活动。⁹

在网站方面，以新移民为主的网站有华新网、新加坡家园物语、狮城华人网等。华新网是一群中国留学生成立的网站，成立于2000年。网友众多，以新加坡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在籍中国学生、学者或往届校友为主。他们经常参与本地的慈善活动。例如：2003年5月16日，华新网呼吁网友参加英勇基金筹款讲座，讲座收入将捐给英勇基金，以帮助不幸感染沙斯的医护人员和病患，以及因被令隔离而导致生计受影响的家庭。网站号召大家“支持医护人员，齐心协力抗炎，迎来新加坡美好明天”；2004年12月16日，网站号召网友参与12月18日在牛车水举办的慈济医院捐血运动，呼吁“捐血、做好事应该不分宗教（种族）”；2005年1月27日，发出信息“NUH 五岁男孩急需A+血小板”，为这个异族男孩寻找合适的捐血者；2004年12月28日，号召网友捐款给新加坡红十字会，以救助海啸灾民。¹⁰

二、塑造新移民积极向上的总体形象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本地媒体上长期充斥的都是关于中国女人的负面报道，媒体渲染下的女移民的恶劣名声，让她们忍无可忍。一些新移民网站（尤其是女性移民为主的网站）开始重新塑造自己的社会身份。“新加坡家园物语”网站，成立于2003年。截止到2005年12月18日，有网友8016名，以女性为主。站长九歌妈妈（网站创立时为一家庭主妇，现为电脑工程师）写道：“我想在网上找一些关于中国女性在狮城生活奋斗的文章，非常惊讶的是，我能找到的几乎都是负面材料。‘乌鸦’、‘地下情人’、‘小龙女’、‘按摩女’、‘从事暧昧行业’”。然而，“我接触到的中国女性和国内并没有太大差异，要么是职业女性，要么在家做全职妈妈，她们都在正常的轨道上过自己的日子，渐渐融入本地生活。在我看来，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大多数。也许是她们的生活方式太平常。没有噱

⁹ 资料来源于华源会网站<http://www.myhuayuan.org>。

¹⁰ 资料来源于华新网网站<http://www.huasing.org>。

头也毫无新闻价值。所以在新加坡的热门话题里，她们是沉默的族群。反而是少数的‘乌鸦’们，被各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中国女人由此给人一种负面的印象。”因此，她向女移民们征集自己的故事，整理了一组“新加坡的中国女人”特稿，“让我们以完整的视角来洞察这一敏感主题。”

¹¹ 这个呼吁得到了女移民的热烈反应。

在出版方面，近年成立的玲子传媒出版社在老板新移民玲子的主导下，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新移民文学。例如《乌鸦》、《中国女子的新加坡》、《人蛇手迹》、《我这滥男人》（作者虽为新加坡人，但由于写的是一个新加坡男子与中国女人的情色纠葛，我们也把它归到新移民文学中）等。由于视角不同，这些文学都在当地社会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尽管不少人将其视为“炒作”，但至少有些新加坡人开始愿意了解新移民这一边缘群体，并且开始反省加在中国女人头上的一些歧视性称呼。一个显著的改变是：如今在报纸上和电视里，再也听不到用“小龙女”来称呼中国女人了，尽管在坊间这一称呼还大有市场。

2004年4月，《扬时代》杂志正式出版，新移民有了第一本自己的杂志。在创刊词中，编辑宣称，这本杂志的宗旨是：“帮助新移民融入本地生活，让新加坡人走进新移民”，表示要“全方位展示在这样一个扬眉吐气的时代背景下，新移民飞扬的生活和张扬的个性”。¹²

三、帮助新移民适应环境，以缩短融入新加坡的进程

由于网站的特性，一些新移民网站（例如华新网、新加坡家园物语、狮城华人网等）在对同胞的帮助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们为新移民相互支援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网站上不仅包括一般资讯（如《中国公民来新加坡须知》、《换发护照注意事项》等），新移民对于学习、生活和工作上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得到其他网友的热情指点。有些活动是在网站的组织下进行的。例如华新网在每年新生入学之际，征集整理一些高年级学生的文章，提醒新生应该注意的事项，也会召集网友迎接新生。

¹¹ “九歌妈妈”（网友名）《新加坡的中国女人》，见新加坡家园物语网站

<http://www.4sgfamily.net/ShowArticle2.asp?ArticleID=211>）。

¹² 〈创刊词〉，见《扬时代》2004年3月、4月刊，页1。

新移民帮助同胞的努力在对最弱势的群体陪读妈妈身上充分显示出来。由于多数妈妈都非富人，必须在新加坡打工供养孩子读书，而她们多数学历偏低，找工作十分困难。新加坡政府于2003年修改条例，这让许多妈妈们陷入了困境。“在过去，陪读妈妈只须持有超过4个月长期社交探访签证，便能向人力部申请工作准证。现在，只有符合一般工作准证申请条件的陪读妈妈才获准工作。”在2003年10月24日，华源会在牛车水一家餐馆主办“陪读的出路”午餐会，向超过100名陪读妈妈介绍他们的计划。本地一家名为“Insurance Solutions”的公司打算向建屋局租用四房式组屋充作宿舍，雇用陪读妈妈当学生的监管员，负责学生的衣食住行。而陪读妈妈们，可以付钱给这个公司，让这个公司的雇员（也是同胞）看管自己的孩子，然后放心回国。华源会不卷入公司运作只负责监管。

¹³ 一方面，由于妈妈们更需要的是工作，而不是试验性地把孩子交给他人，另一方面每月700新元（600住宿费加100学费）超出了一些妈妈的承受能力，两个原因导致计划没能成功。但是毕竟有个专门机构愿意为陪读妈妈做些事情了。

对陪读妈妈这一弱势群体的实质性帮助主要是一些新移民网站来完成的。新加坡家园物语网站为陪读妈妈设了专题报道；狮城华人网做得更为出色，专门辟设陪读版块为陪读妈妈寻找工作。新移民网友们提供工作信息，或者直接雇用。很多陪读妈妈都是通过网站提供的信息找到工作的。

四、在各个领域里争取成功，使得新加坡人从傲慢偏见到接受欣赏

尽管在各个行业，都有新移民凭自己的努力取得成功，但是能够让社会瞩目的，往往是在体育以及文艺领域里。

在体育方面，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来自中国的乒乓球员井浚泓代表新加坡取得奥运会第四名的好成绩。《联合早报》记者写道：“她凭着坚强的毅力和努力的拼搏，为新加坡、为自己争取了最大的荣耀，最后夺得了第4名，令全新加坡为她的表现感到骄傲，大声欢呼。”¹⁴ 但在随后的那些天里，还是有部分新加坡人投书报章不认同她的身份，声称无法

¹³ 〈新加坡华源会住宿计划为陪读妈妈找出路〉，见《华声报》，2003年10月28日。

¹⁴ 〈井浚泓为新加坡带来最美的回忆〉，见《联合早报》，2000年10月1日。

感到光荣。但到了近年，北京姑娘李佳薇的成就，几乎倾倒了所有新加坡人的心。在2004年奥运会上，她打败中国头号领军人物王楠闯进四强。虽然最后没能获取奖牌，但仍然被视为英雄。“从300名支持者到樟宜机场接机的热闹场面来看，李佳薇已经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女英雄。热情的支持者以熟悉的追偶像方式，一直包围着李佳薇，争先恐后地要求与她握手、签名以及合照，令这名本地乒坛红人寸步难移的同时，也受宠若惊。”¹⁵ 发生这一转变，不是由于李嘉薇成就更大而是这四年中本地人已经见识到更多新移民走向成功因而渐渐放宽了心胸。

在文艺界，一些新移民也纷纷取得了成功。优频道前主播王熻青、张海洁、艺人郭亮以及新传媒的主播徐冰都凭借自己的努力攀上了事业的顶峰。张海洁已经成为新加坡公民，对新加坡的工作及生活空间感到满意。她表示，相比起中国大陆，在新加坡能够凭努力、才干而获得应有的回报，令她觉得欣慰。在新加坡，“只要有能力，肯做，就有机会”。来自成都的徐冰移民本地已经10多年了。在这里，她从俄语翻译成功转行成为电台主持人与电视主播。她说，移民就像活水，给社会注入生气，对移民和社会是双赢。“对我而言，新加坡不只是我工作的地方，我把这里当成我的家。”¹⁶

总之，新移民作为外来的边缘群体，对自己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他们通过以上所述种种努力，重新塑造自己的社会身份以取得新加坡主流社会的认同。在这方面，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一样尽力争取成功，希望能够被主流社会接受。这里没有什么显著的性别差异。应该说，社会身份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换取主流社会对这一群体的较能反映真实情况的归类和划分必然是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但是他们这种塑造社会认同的行动正在进行当中。

第二节 文化认同的趋近

¹⁵ <李佳薇：下次还要拼奖牌>，见《联合早报》，2004年9月1日。

¹⁶ <新加坡人看中国移民：从傲慢偏见到接受欣赏>，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4年7月23日。

吴英成博士认为：“近年华文报章出现了大量新新移民的投书，内文往往突显他们出身自正统中华文化的优越感。他们投书批评新加坡华人的西化作风，也鄙视不纯正且被污染的新加坡本土华语。这些新新移民的不满现象正好反映他们身在异地、心在汉阙的客居心态。其实，对想像中的祖国产生认同，往往是新新移民在居留地被边缘化的一种征兆，他们希望借此得到快乐、尊严以及替代性的归属感。”¹⁷ 吴英成博士的观点，反映出有一部分新加坡华人对新移民在文化认同上的质疑。但是事实上，很多新移民正在调整的过程中。从长远来看，那些会在新加坡长久生活的新移民与本土华人在文化认同上会慢慢趋近。

所谓文化认同，“是指特定个体或群体认为某一文化系统（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内在于自身心理和人格结构中，并自觉循之以评价事物，规范行为。”¹⁸ 它是由宗教信仰、历史经验、语言、经济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尽管这里多数都是华人，但是本地文化与中华文化有着显著的差异。那么新加坡文化是一种怎样的文化呢？

新加坡文化是东西方多种文化融合下的产物。在19世纪初新加坡开埠后，华人移民为了巩固族群联系以便在主流话语中谋得立足之地，他们需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文化认同和文化上的归属。但是由于所处的多种族的、异于中国的环境，中华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发生了一些异变。而这种异变又在新加坡建国后在政府有意识的引导下得到了强化。在1965年后，政府、媒体不断地强调英语对经济和社会的重要性，因为政府希望英语这个外来语言能使新加坡各民族处于平等的地位；并希望由此萌生“新加坡认同”和“新加坡文化认同”。中国学者韦红认为，新加坡人的文化认同虽然建立在英文的基础上，但并非要各族人民完全认同西方文

¹⁷ 吴英成〈开放中国属性：海外华人圈华语变体切片〉，见《联合早报》，2002年12月15日。

¹⁸ 丁宏〈从东干人反观回族的文化认同〉，见《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4月，页47—52。

化。政府主张“东方和西方的精华，必须有机地融汇在新加坡人身上，儒家的伦理观念、马来人的传统、兴都人（印度族）的精神气质，必须同西方的科学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新加坡文化认同“是对东西方文化精华的认同。”¹⁹

吸收东西方文化精华是很多新移民内在的价值观之一。贯穿了这一价值观的本地多元文化对他们也就构成了强烈的吸引力。在笔者看来，新移民对此地多元文化的认同，主要通过家庭教育、新移民网络文学表现出来。而女性比男性对新加坡文化的认同更为执著。

一、家庭教育

在对孩子的教育上，新移民充分利用新加坡东西方交汇的优越地理位置，吸取东西方文化精华，从而与本地华人社会在文化认同上也逐渐趋近。

在家庭教育上，新加坡女性扮演的角色举足轻重。Katie Wills and Brenda Yeoh 认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女性的社会角色被定义在家庭领域，强调女性应把国家下一代培养为遵守规范的人，确保社会其他成员（尤其是成年男子）不会有破坏社会传统规范的行为。女性因此被视为家庭内部的‘养育者’，捍卫国家的责任也就落到了女性的肩上。”他们认为：“新加坡女性总是被视为‘国家的捍卫者’，对维持国家的标准负有职责。”²⁰ 新移民也与本地华人一样重视孩子的教育。《扬时代》在对他们的调查中发现，对很多人来说，“移民就是一条不归路”，而这条路上最大的牵引是孩子。不少人就为了让孩子接受新加坡双语教育、在多元文化中生活成长而决定移民的。²¹

我们以“新加坡家园物语”网站的网友（绝大多数是女性，妈妈们占的比例较大）活动为例，可以看出女性移民对吸收东西方文化精华不遗余

¹⁹ 韦红《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页155。

²⁰ Katie Willis and Brenda Yeoh, “Gender, Marriage and Skilled Migration: The Case of Singaporeans in China”, *Wife or Worker? 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pp.101-119.

²¹ 玖天〈不归的移民路——路上的孩子〉，见《扬时代》2005年1月、2月刊，页4—8。

力，与新加坡女性显示出相近的文化认同。这一网站上的妈妈们常常举办各种活动以便了解最新东西方流行教育趋势，相互交流育子心得。例如，日本教育学家七田真所创的右脑教学法是最近几年在本地社会中比较流行的幼儿早期教育教学法，新移民妈妈们也对这种教学法发生了浓厚的兴趣。2005年3月25日，这个网站举办了七田真右脑教学法演示会。演示会在IMM三楼举行，家长与小孩一行30多人参加了这次活动，笔者也有幸参与。爸爸们带着孩子去游乐场玩耍，而妈妈们则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席地而坐，仔细倾听一个妈妈用电脑演示七田真右脑教学法。几乎所有孩子均从一、两岁起（最小的从三个月起）就进行过东西方各种著名教学法的训练，成了一个个“小神童”，但妈妈们依然毫不松懈，继续一丝不苟地学习。演示十分认真，讨论特别热烈，而这样的聚会已经举行过很多次。

除了吸收东方文化精华，妈妈们也亲身上阵学习西方教育大师的教学法并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进行试验。她们将自己的心得体会写下来，发到家园网站上跟其他人分享。例如，“同同妈妈”在网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对格林杜曼早教法的感悟》。她用杜曼的方法教孩子阅读、数学、百科、体能一年半多了，就这种科学训练法，她谈了自己的一些体会。她认为，杜曼快速闪卡教育的科学依据是科学家们在长期的实验中达到的共识：右脑的快速摄像记忆功能。“图像以一秒或更快的速度从眼前闪过，这时左脑已经无法发挥功能。而婴幼儿发达的右脑被启用，并显现出其强于左脑的非凡能力。无论笔划多复杂、字母组成多长的字词，对超凡的右脑来讲，都可以轻易记忆。”在儿子27个月时，也就是在她按照杜曼的方法教导孩子9个月后，儿子显示出了过目不忘的惊人记忆力。孩子现在三岁，已经阅读了60本经典英文故事书。“学到的东西和培养的能力已经令人振奋，而那种对学习任何新东西的自发热情和投入，才是更令人感动和欣慰的。看着小小的宝贝对知识的着迷、乐在其中，真是人类最美妙的画面。”杜曼的方法贴近孩子心理，让孩子在无压力的情况下快乐地学习。“我很感谢杜曼让我和孩子成为最亲密的朋友。孩子更加懂事，更加体贴大人……谢谢杜曼，帮我们塑造天使般的儿女。”²²

²² “同同妈妈”（网友名）《我对格林杜曼早教法的感悟》，见

在本地，让孩子学习音乐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家园网网友“TinyQ 乖囡”认为：“大部分的孩子都在学习音乐，这应该是发达国家的表现之一。”²³ 在这样的环境里，新移民妈妈在自己吸收东西方文化的精华训练孩子之外，也不忘充分利用这里的种种便利条件对孩子进行艺术方面的教育，以让孩子全面发展。“阳阳妈妈”把儿子学琴的故事贴到了网上，跟大家分享。儿子学小提琴后，第一次音乐会，全家当观众。“最后一个节目是全体小朋友拉 Twinkle 变奏。看着那些站在第一排的三、四岁孩子，妈妈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当时就想，只要阳阳不太抗拒，这个学琴的路一定要坚持走下去。”后来，阳阳第一次表演，还算表现良好，笃定登台。但后来的公开演出，他出乎意料地抗拒，甚至哭声震天。原因是他太依赖一个老师，只要换老师就会十分抗拒。虽然表现有点不乖，但是妈妈平时自己所做的早期教育还是有一些作用的。有次课由一个新老师来教，他“虽然别别扭扭地上了这节课，可韩国老师用生硬英语讲的东西他可全记得呢！”慢慢地坚持了下来，收获不少。“近一年走下来，妈妈感触最深的是他性格上的转变，音乐真的让他开朗自信了很多，而多次的表演，各种活动，也让他大方了不少。”²⁴

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无论妈妈自行教育还是参加各种训练班学习，多数都是以英文为媒介进行的，孩子们日常讲话都是满口英文。这也正是新加坡年轻华人家庭里普遍存在的现象。那么是不是妈妈们不重视孩子的华文教育呢？并非如此。一个妈妈这样解释道：“其实，我们对小孩讲哪种语言，要看教的是什麼。如果教材是日本或西方人用英文写的，我们就跟着教材讲英文；若是教材是台湾人或大陆人用中文写的，我们就讲中文。在教材选择上，基本上是中英文均有，英文比例大些，毕竟小孩将来生活

<http://www.4sgfamily.net/ShowArticle2.asp?ArticleID=548>。

²³ “TinyQ乖囡”《在新加坡学音乐-----儿童钢琴篇》，见

<http://www.4sgfamily.net/bbs/dispbbs.asp?boardID=29&ID=7369>。

²⁴ “阳阳妈妈”（网友名）《在学琴中成长》，见

<http://www.4sgfamily.net/ShowArticle2.asp?ArticleID=822>。

在英文社会里。”²⁵ 在这个网站上，妈妈们还辟有版块展览孩子的（华文）作文。例如一个叫小雨的孩子写了《捏橡皮泥》、《早晨》、《美丽的湖》、《美丽的小公鸡》等作文，十分生动有趣。²⁶

家园网网友妈妈们的活动，说明她们与本地华人妈妈们一样重视孩子的教育，反映出双方在文化认同上逐步趋近。新移民家庭中，对孩子的教育基本承担在妈妈身上，这也同新加坡华人社会大致相同。虽然大多数来自中国的妈妈们都是出于分散、各自为政的状态，但从家园网妈妈们的身上，我们可以了解新移民（尤其是女移民）为融入新加坡吸收东西方精华的多元文化在家庭教育上所作的努力。

二、新移民网络文学

关于文化认同的当地取向，我们从新移民网站刊载的网络文学中可以发现一些线索。笔者认为，网络文学能够反映新移民的真实想法是由于以下原因：第一，新移民在这里毕竟是个外来群体，并不控制主要传统媒体。他们的声音若是能够被当地人听到，也常是当地人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或为刺激市场销量采写的。尤其是1999年之前以负面新闻居多，不能反映沉默的大多数新移民的真实情况。只有通过网站，他们才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第二，近年来确实出版了一些新移民文学作品（例如玲子传媒出版社出版的《乌鸦》、《我这滥男人》、《越洋女工手记》等），但这些作品主要涉及族群关系，非常敏感，具有市场轰动性，反映了新移民与本地社会冲突的一面。笔者认为冲突并非主流。恰恰是那些沉默的、不具有炒作价值的大多数才能代表新移民群体。

很多新移民在文化上都有融入本地社会的愿望。各大网站上均有对新加坡各个方面的介绍，而且均对这里各种族和平相处、多元文化表示出了赞赏之情。例如新加坡家园网上，编辑辟设了《各族婚礼风俗专题》、《新加坡节庆介绍专题》等专题版块。《在新加坡节庆介绍专题》一文中，详细展示了印度教的丰收节、开斋节、华人除夕、卫塞节、农历七月中元节、屠妖节、九月初九重阳节、新加坡儿童节、新加坡儿童节、新加

²⁵ 资料来源于2005年3月笔者参加家园网妈妈们活动时的个人访问。

²⁶ 资料来源于新加坡家园物语网站(www.4sgfamily.net)。

坡教师节等18个新加坡节庆图文资料。在新加坡华人网上，编辑也流露出对多元文化的喜爱。“新加坡的多种族特性直接反映出其人民宗教信仰上的复杂性。因为新加坡组成人民的特殊及多样化，也就衍生了多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回教、佛教、基督教、兴都教、锡克教、犹太教等。新加坡的宗教信仰完全自由，所以可以看见印度庙、清真寺、教堂、道教的庙宇以及佛教寺庙共荣并存的奇特景象……为了避免宗教偏见以及各教派之间的互相仇视，政府一向以谨慎的态度处理宗教问题，并且废除学校里的宗教教育……对观光客来说，种族间的差异性成为新加坡的一大特色与趣味点，例如：牛车水(Chinatown)的中国城中尚保有中国传统的街道景观、东方神秘的典礼仪式；而小印度(Little India)像是印度半岛的缩小版，亚伯街(Arab St.)上的清真寺以及祈祷时间的规律钟响都点缀了此区的异国风情。”²⁷

对多种族多元文化的喜爱只是迈出了文化认同的第一步，更深层次的热爱则必须首先放下对中华文化的过分执著，真正融入新加坡多元文化并乐在其中。但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经过一段时间心理上的挣扎后，家园网网友“尘星”（真实身份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名博士生）终于想通了：“只要敞开自己的心胸，懂得去欣赏、去接纳不同的文化，就会发现这个世界多么的广阔、多么的美丽。静静地坐在麻省理工的教室里，聆听着大师们滔滔不绝地讲述科学的奥妙与神奇；在马来西亚一望无际的大海里，观看五颜六色的珊瑚、千奇百怪的鱼儿在身边游来游去；在纽约博物馆欣赏人类几千年艺术的精华；和新加坡的朋友组织青年志愿者到云南的山村里教英文；在每天的生活里感受来自东西方各种不同的文化的交融与冲突，我无法不为这个世界的精彩深深着迷。”²⁸

另一个家园网网友“百合”（真实身份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一名博士生）在网站上发表了自己的自传体小说《肚皮舞娘》。在这里，她从一个没有什么舞蹈基础的平凡女学生蜕变成了一个武艺高超的肚皮舞娘。在业

²⁷ 见狮城华人网 (<http://edu.sgchinese.com/singapore/singapore.htm#>)。

²⁸ “尘星”（网友名）《漂泊，没有理由》，见

<http://www.4sgfamily.net/ShowArticle.asp?ArticleID=862>。

余时间里，她经常参加各种表演，深深迷恋上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新加坡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地方。所有的种族和宗教和平地相处着，过着怡然自得的生活。当地有华人、马来人、印度人，还有少数的阿拉伯人，还混杂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肤色的外国人。而他们又信仰着五花八门的宗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印度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但是他们毫无火药味地休养生息、和睦相处。人们相互尊重彼此的宗教信仰，只怀着同一个目的：民族团结，国家昌盛。当然新加坡政府的决策是最了不起的。这样一个太平盛世，与不许在公众场合谈论种族、宗教，人们互尊互重、严厉法治分不开的。加上通用语言又是英语，这里好像成了东西方交流的一个窗口。西方人不必担心语言的障碍，而能在这个便利、干净又安全的国家里和各个种族的东方同事们一起工作、生活。所以新加坡俨然是个世界性的和平城市。各式各样的人在这里工作、生活，偶尔有着他们的交集。”²⁹

她在新加坡这个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学习、跳舞，享受着多元文化带来的喜悦，也幸运地在舞蹈学习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真爱——一个喜欢打阿拉伯手鼓的美国籍犹太裔青年。她对新加坡的爱是刻骨铭心的：

新加坡，我初来的时候，你是一尘不染的通透。
我再仔细看你，那里面是一个五彩的世界。
新加坡，你是宁静的绿，你是幽静的港湾。
你的热情和妩媚是深藏的，
你的灿烂是创造出来的，
你的美丽夺人呼吸。
你的热烈和无限，
就如那转瞬即逝的新加坡的绚妙朝霞。³⁰

一般而言，离开中国的女性比男性在文化认同上更加当地化。Luo Keren, Fei Guo and Huang Ping 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在对从世界各

²⁹ “百合”（网友名）《肚皮舞娘》，见新加坡家园物语网站<http://www.4sgfamily.net>。

³⁰ 同上。

国回到中国上海的前留学生们的调查中发现，在 185 个被调查者当中，男性占了 81.8%，他们认为这基本能反映社会的一般状况。“我们试图找到更多的被访者，但发现实在是太难找到足够的女性了。”因为有这样一种趋势——“一旦回国的决定作出，通常都是丈夫自己回来，而妻子留在当地。”³¹ 在新加坡，女性移民似乎也比男性对当地文化有更强烈的兴趣，这可以从各大网站内容明显看出。华新网与狮城华人网，男性网友较多，多数贴子内容反映的是有关中国的新闻以及新移民在本地的适应情况，几乎是不需要同新加坡主流社会打交道的虚拟社区。而新加坡家园网同样能看到适应的困难，但可以清楚看到的是女性对新加坡多元文化的欣赏和对新加坡这个美丽家园的喜爱，本地导向比较明显。造成这种情况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女性传统的家庭教育职责。教育责任的承担，会使她们需要更多与新加坡托儿所、幼儿园、学校、其他本地家长打交道，从而使活动更加本地化。而这种文化活动的本地导向也可能会使她们的政治认同比男性更加容易改变。

第三节 政治认同的变化

融入新加坡社会是一个长期的进程。如上文所述，新移民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可以是多重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的当地化，还是停留在融入较浅的层次上，不一定代表他们会放弃中国国籍。但是政治认同，则是唯一的，也代表融入新加坡社会到了一个较深的层次。而包括新移民在内的外国人最为本地人诟病的，也在这一点上。例如，在新传媒集团的网站上，网友“新加坡人”对外国人才课题发言：“他们（外国人）不介意拿较低的工资，抢了本地人的饭碗，请问有多少在新加坡工作的外国人愿

³¹ Luo Keren, Fei Guo and Huang Ping, “China: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Emerging Trends of Reversal of the Brain Drain”, in Robyn Iredale, Fei Guo and Santi Rozario (eds.), *Return Mig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3), pp.88-111.

意拿新加坡公民？”³² 类似观点经常在报纸、电视上出现，反映出新加坡人对外国人政治效忠问题，持非常怀疑的态度。

在政治认同的当地化上，新移民的看法有较大的性别差异。笔者的调查充分说明了这一点。5.88%的男性打算将来加入新加坡国籍；而有同样打算的女性，将近男性的三倍——14.47%。³³ 这个调查只能反映部分事实。据笔者估计，性别差异继续存在，但生活里想要加入新加坡国籍的比例可能会更高。有两个原因使笔者有理由这样认为：一是新移民总体上非常年轻，生活还没有很好地安定下来，他们无法预测未来的种种可能，在此情况下，国籍的选择更可能以不变应万变；二是笔者的中国人身份很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压力。许多改变了国籍的人在中国人面前谈起这话题都很难做到理直气壮。不管新移民心里是否有过挣扎，若是要在此地长期生活下去，加入新加坡国籍恐怕是现实的选择。中国随着直系亲人的加入或凋零离世慢慢地变成了他们想象中的祖国，而在本地培植的小树已经慢慢地成长，在枝繁叶茂的同时，根也越扎越深，很难连根拔起。

一般而言，新移民加入新加坡国籍的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1、个人因素

这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1）因爱情而爱屋及乌

嫁到这里的中国新娘，往往从中国传统从夫居的习俗出发，国籍也跟着改变，真正成为了婆家的人。例如，作家饶巧巧在深圳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新加坡人，双方一见钟情。一年后饶巧巧来到新加坡，成了一个狮城新娘。如今，来此地已经十多年了，她早已成为公民。她认为自己已经完全融入了新加坡，先前的不适应和困难都已经非常模糊了。她说：“我现在是个标准的新加坡人。无论是榴莲或咖喱，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往嘴里

³² “新加坡人”（网友名）《外来人才是否抢走了本地人的饭碗？》，见

http://forum.mediacorp.com.sg/ch8cforum/index.php3?bn=channel8_chucrossfire2&expnd=&first=1119252568&sort=thread&where。

³³ 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05年3月开始的社会调查。

送。”³⁴ 此外，前乒乓国手井浚泓也因爱情嫁来这里并且改变了国籍。她表示自己从不后悔这些选择：“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在这里安家的缘故，我也一样会喜欢新加坡的。先前因为先生是新加坡人，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就更深了一些。在这里成家立业，有一种从此扎根的感觉。这也是我跟新加坡的缘分吧！”³⁵

（2）利益驱使

作为新加坡公民，第一次买房时可以享有三万新元的津贴，还享有子女的教育储蓄津贴、水电费折扣、新加坡股票、装修组屋折扣等。网友“yangjian03”写到：“今天我去交了公民申请表格，因为我的组屋要翻新。翻新费非公民要 6000~3W（指三万新币），新公民只出 10%，所以……”³⁶ 这样的帖子在一些新移民网站上经常看到。例如另一个网友采荷问道：“我申请的新加坡公民已经批准了。我想请教各位，除了买房贷款便宜之外，还有什么好处吗？最重要的是我回去中国还会方便吗？持新加坡护照到那些国家可以免签？谢谢各位！”³⁷

除了经济驱动，新加坡护照比中国护照好用，也是一些人入籍新加坡的现实考量。利用新加坡公民身份转去第三国的人确实存在。网友“月之翼”认为：“很多人只是把它（新加坡公民身份）作为跳板，因为这样更方便申请其他国家的移民了，毕竟以中国公民身份申请一些国家的移民是很困难的。”³⁸ 另外，已经成为新加坡公民的“citiboy”在开导一个担心申请了新加坡公民路会越来越窄的网友时，也表示出同样的看法：

³⁴ 〈移民作家狮城打造幸福家庭〉，见《联合晚报》，2002年4月12日。

³⁵ 肖洁〈乒乓情缘定狮城——记新加坡体坛乒乓皇后井浚泓〉，见《中国女子的新加坡》（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2年），页34。

³⁶ “yangjian03”（网友名）《咨询关于申请公民》
<http://www.sgchinese.com/bbs/dispbbs.asp?boardid=5&star=2&replyid=2272211&id=523278&skin=0&page=1>。

³⁷ “采荷”（网友名）《拿新加坡护照有什么好处？请指教》，见
<http://www.sgchinese.com/bbs/dispbbs.asp?boardID=5&ID=526198&page=1>。

³⁸ 同上。

“往美国走啊，或者移民加拿大，或者回国发展，或者去香港澳门或者台湾，路子多了。”³⁹ 此外，有些人认为新加坡护照对于回国发展也是大有好处。在华新网上，网友“mkx”认为：“回国发展，外国国籍+中国绿卡最好。除了政府部门不能进，其他地方反而占便宜，特别是对外有业务的地方，有了绿卡就好像有了身份证。”⁴⁰ 这种说法被一个女网友“葡萄美酒”证实了。她在做了五年新加坡永久居民后申请成为公民。后来，在丈夫的劝说下，夫妻一起回国。“国外的文凭，国外的工作经验——我以海龟的身份回国了。对于个人事业的发展，中国无疑是我们的乐土。一纸外国护照反而带来很多方便。‘下个月日本开会，你不需要签证，你去！’洋人上司直接指令我。同时，中国的同事们，不会认为我是外国人。当然，我本来就是中国人，我知道如何和各色人等打交道。只要我努力，前面是一条康庄大道。”⁴¹

2、社会因素

不少专业人士选择加入新加坡国籍是为了更好地融入社会、避免歧视。成为本地公民意味着有更多的晋升机会，他们不再因为外国人身份所限无法进入管理层。此外，对那些经常会被公司派出国的人来说，拥有一个新加坡护照意味着更多的便利，在工作上从此不再比本地人处于劣势。因此入籍新加坡是一个好机会。他们努力缩小先天不足，做好了准备，打算以几倍的努力来换取与新加坡人同样的收获。在狮城华人网上，“citiboy”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入籍新加坡时，写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公司今天让你出国，你告诉公司我要申请1个礼拜的签证，多麻烦啊！”⁴²

³⁹ “jyp”（网友名）《请问大家对申请新公民有什么考虑和建议？》，见 <http://www.sgchinese.com/bbs/dispbbs.asp?BoardID=5&ID=457110>。

⁴⁰ “mkx”（网友名）《回国发展，外国国籍+中国绿卡最好》，见华新网 <http://v15.huasing.org>。

⁴¹ “葡萄美酒”（网友名）《我为什么要移民》，
<http://www.4sgfamily.net/ShowArticle2.asp?ArticleID=298>。

⁴² “citiboy”（网友名）《申请公民五个半月了》，见

避免被自己人歧视、避免被外国人歧视的想法，也被狮城华人网上的一个网友“fpcsg”所证实。他说道：“PR（指永久居民身份）好用个鬼！告诉你俺为什么最终下了决心换国籍吧：

a. 一次碰到一个台湾人，说起去香港，这人一脸的骄傲：俺们湾湾去香港，比你们大陆仔方便多了！俺气结，但无法反驳。

b. 与新加坡同事去香港，新加坡人顺利过关，俺则被香港海关查来查去，把那机票看了又看，把那护照抠了又抠，同事在外面等我等得都不耐烦了，嘲笑我说：香港不是贵国领土吗？怎么哈哈~ ~ ~ ~俺气结，但无法反驳。

c. 与新加坡同事去广东，发生同 b 的故事 ~ ~ ~ ~俺气结，但无法反驳。

算了，换吧，不但少受自己人气，也少受外国人的气。”⁴³

3、环境因素

每个走上移民路的人，心中都有一个美好而质朴的愿望，就是“过上更好的生活”。新加坡绿树成荫的自然环境，安定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较稳定，有任人唯贤的体系”，⁴⁴吸引了很多新移民在这里定居下来。2005年全国“0”水准会考中考取了11个A的状元之一——高原，其父母决定扎根在新加坡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喜爱新加坡的环境。

⁴⁵此外，在笔者的访谈中，一个从事保险业的优秀经纪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我觉得这里的生活环境比中国好。这也是我决定改变国籍的原因之一。现在，我回去中国都已经不适应了。”⁴⁶

4、文化因素

<http://www.sgchinese.com/bbs/dispbbs.asp?BoardID=158&ID=480214>。

⁴³ “fpcsg”（网友名）《申请公民，批准了，想请教一下几个问题》，见

<http://www.sgchinese.com/bbs/dispbbs.asp?boardid=5&star=3&replyid=484906&id=428512&skin=0&page=1>。

⁴⁴ 雨林〈狮城状元——少女高原〉，见《扬时代》2005年5月、6月刊，页33。

⁴⁵ 同上。

⁴⁶ 资料来源于笔者的个人访谈。

很多人入籍新加坡是因为对多元文化、双语教育制度的喜爱。孩子的教育是移民路上的重要问题。“一方面相比国内的教育费用，新加坡孩子的教育费用会少很多，这无疑是一大长处。另一方面，新加坡东西文化汇合，许多新老移民都希望孩子能在这个华人为主流的国家里接受一些西方教育的优势，能在自由的环境里健康成长。”⁴⁷ 这种与中国不同的教育方式，使得孩子成为移民路上最坚定的牵动力。为人父母者往往为了孩子下定了扎根当地的决心。毕竟，孩子回国已经很难适应国内的教育方式。就算再移民去其他发达国家还有缺少本地华文教育大环境的问题。例如高原“在学校适应良好，表现优异，疼爱她的爸爸妈妈不愿因为‘二次移民’而给她带来冲击。多年来，虽然新加坡经济屡有动荡，身边的中国朋友来来去去，走了一拨又一拨，但出于对孩子的爱护，高爸爸高妈妈始终没有移民他国”。⁴⁸

需要注意的是，放弃中国国籍、加入新加坡国籍，往往不是基于一种原因，而是几种甚至所有原因的集合体。有些激烈的中国人批评部分新移民作出这种决定，是个人利益至上，甚至称他们为“卖国贼”（因为三万新币买房津贴就把祖国给卖了）；也有些新加坡人始终怀疑他们的效忠意识，潜意识里总感觉他们会以狮城为跳板，移民第三国。依笔者看来，这些看法都过于偏激。一方面，政治效忠对象的改变，并不能割断新移民与中国的联系。第一代移民无论如何都很难彻底与中国决裂。就像华新网网友“自由鸟”所说的“新加坡是持有新加坡国籍的人应该在法律上效忠的国家，而中国则是我们的家乡。换句话说，新加坡是国，中国是家。与很多持新加坡国籍的中国人聊天，大家看法多少类似。”⁴⁹ 新加坡是婆家，中国是娘家。当然应该先照顾婆家，有余力时才能照顾娘家。另一方面，能够转去第三国的人少之又少，多数入籍的新移民都会在这里落地生根。

⁴⁷ <不归的移民路——路上的孩子>，见《扬时代》2005年1月、2月刊，页4。

⁴⁸ 雨林<狮城状元——少女高原>，见《扬时代》2005年5月、6月刊，页33。

⁴⁹ “自由鸟”（网友名）《也谈换国籍》，见华新网 <http://v15.huasing.org>。

事实上，对多数加入新国籍的新移民来说，这都是一个重大而艰难的决定，要经历一些剧烈的心理挣扎。最困难的是放下对故乡的执著。家园网网友“尘星”写道：“我在这个极端也终于明白了，不管我怎样坚守自己的梦境，那片我魂牵梦系的土地与我毕竟是遥远而不可及的了。我终于敞开心扉，接纳了这个新的城市，于是她也微笑地接纳了我。新加坡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成年后的第一个家。”⁵⁰ 家园网的编辑也写道：“沙漠里也会开出花朵，只要你换种心境来看。故乡的定义已经今非昔比，原来颠沛流离的他乡也可以成为新的故土，而记忆中儿时的村庄和伙伴早已不能承载全部的乡愁。”⁵¹ 加在新移民身上的指责（例如“卖国”，“以新加坡为跳板”）都有些过于严厉了。他们有的只是一些单纯的、作为人之常情的美好愿望：对公平机会的争取，嫁入婆家的奉献等。网友“citiboy”的话，很能代表那些改变国籍的人的看法：“对我来说，我理解的效忠新加坡政府，就是踏踏实实工作。”⁵² 他们明白：不能靠改变国籍来走捷径，事实上道路会继续艰辛。就像成为新加坡公民的网友“自由鸟”所说“社会对移民的压制和歧视对新移民是自然的事情，相反，如果没有，那么这个社会便是个不正常的社会。新移民只有在艰难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以几倍的辛苦和汗水获得同样的收获，才是多数移民在多数国家的经历。如果怕艰苦，如果怕歧视，就不要颠簸到异乡（当然，政治避难除外）。我倒是觉得，这是机会。”⁵³

第四节 结语

⁵⁰ “尘星”（网友名）《漂泊，没有理由》，见

<http://www.4sgfamily.net/ShowArticle.asp?ArticleID=862>。

⁵¹ 同上。

⁵² “citiboy”（网友名）《申请公民五个半月了》，见

<http://www.sgchinese.com/bbs/dispbbs.asp?BoardID=158&ID=480214>。

⁵³ “自由鸟”（网友名）《也谈换国籍》，见华新网<http://v15.huasing.org>。

新移民跟随老一辈中国人的脚步、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就汇入了新加坡这个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当中。作为外来群体，他们与主流社会，确实存在冲突，但也有融合。本章我们主要讲的是新移民所作出的种种融入社会的努力。

第一，在社会认同方面，他们重塑自己的社会身份，渴望融入新加坡主流社会

在以往本地媒体对新移民群体身份的塑造中，往往出现的是负面的形象，新移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或是只能听到迎合本地人某种心理的被歪曲的声音。他们通过网站、杂志，来塑造新移民积极向上的整体形象；以社团、网站为组织，踊跃参加本地的慈善、文化交流等活动；为处于困难中的同胞提供支持，以缩短融入新加坡的进程；在包括文艺、体育的各个领域里争取成功以争取更大的社会空间。这些重塑社会身份、融入新加坡社会的努力，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能被多数新移民认同的社团领导而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毕竟他们正在做出种种尝试。

第二，很多新移民在文化认同上显示出与新加坡人趋近的倾向

中国女性活动的当地化导向比男性明显。这种当地化导向的活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女性传统的家庭教育职责，她们会比男性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与当地幼儿园、学校以及其他同学的家长们打交道。在新加坡，为了孩子将来更好地融入社会，女移民贪婪地从东西方文化中汲取精华，身体力行，毫不犹豫。在一些网络文学上，她们也毫不掩饰自己对多元文化的热爱，表达对这个家园的感情。很多新移民的文化认同，也同新加坡人趋近。

第三，在政治认同上，有些人决定加入新加坡国籍，是基于多种因素之上的考虑

新移民因为个人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等决定加入新加坡国籍。无论是一些中国人骂他们“卖国贼”还是一些新加坡人怀疑他们会以此地为跳板都过于偏激和片面。事实上多数人都要经过剧烈的心理挣扎，都要克服对故乡的眷恋。他们的愿望可能是很朴素的，就是想要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不再有被歧视的感觉等。在政治认同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改变，笔者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

总之，相对而言，从融入的程度来看，社会认同、文化认同较浅，可以是多重的，不一定要与政治认同一致；而政治认同代表的融入程度较深，是一种唯一的选择。但是从融入的时间上来看，政治认同短期可以改变，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花费时间较长。融入是一个长期的艰难的过程。在此过程里，新移民作为第一代移民，无论多么努力也不可能真正与新加坡人水乳交融，因为融合决不是单方面一厢情愿就能完成的事情。

第八章 结论

1990年中国与新加坡建立外交关系后，大批新移民来到此地定居下来。虽然祖先来自中国，但本地华人在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与中国人迥然不同的文化。他们认同当地，族裔身份与政治身份发生分离。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来到这里，与其说是移居到了一个华人社会不如说是到了一个陌生国家。这一移民过程对他们影响深远，本研究试图从性别角度对此进行初步的分析。

第一，在私人领域，移民首先对家庭带来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移民的结果之一是使很多女性的社会职业地位下降，但是职业地位的下降并不能说明女性是被动移民。事实上，在移民决定的作出过程中，男性并没有呈现出太多的性别优势，其家长权威在这里并不明显。多数女性在移民前积极参与了出国的决定。因此她们能够坦然接受移民后社会职业地位下降的事实并积极寻求改变，显示了面对困难的巨大勇气。（2）移民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家庭地位的变化，在一些移民女性眼中，生育、家庭关系、知识学历上的差距等都可能导家庭地位的变化。在理论上，移民对男性的家庭地位较为有利。原因之一是男性多是移民的主申请人，在移民后更多地被推到前沿，为家庭打拼；而女性在移民后更多地退回家庭。但在实际生活里，多数人的家庭地位在移民前后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这与本地仍然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以及新移民学历层次较高等因素有关。（3）在移民后，由于缺乏外援，女性面对更多的家庭责任，这直接影响了她们对新环境的适应情况，使她们比男性更加依赖家庭。她们对家庭投入更多的精力甚至退回到家庭中去，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丈夫。无论她们是主动还是被迫地投身家庭，除了生理因素外，还有社会“凝视”的作用。在社会既定规范的影响下，移民并没有为女性带来更多的解放空间，反而使她们更多地羁绊于家庭。依靠家庭，从家庭中汲取力量来面对这个陌生的新环境。反之，移民将男性更多地推到社会上，使男性得到更多的历练，从而更为独立，更有魄力迎接挑战。

其次，在私人领域，移民与婚姻关系密切。在女性婚前，婚姻选择与移民的关系十分复杂，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往学者们关于女性选择涉外婚姻时主要或唯一的考量就是经济动机以及女性是原居国社会经济制度的牺牲品的两种说法，都不能令人信服。（1）笔者认为女性选择涉外婚姻（本文特指女性与在新移民男性或新加坡男人的婚姻）的动机多种多样。为了追随丈夫、为了在国外受教育、喜爱新加坡的环境、追求更好的事业前景等动机并不直接与经济因素有关。（2）关于选择涉外婚姻的女性是原居国社会经济制度的牺牲品的说法也同样有待商榷。中国女性积极通过多种方式卷入了涉外（本文特指新加坡）婚姻。这些婚姻有通过中新两国的婚姻介绍所促成的；女性自己通过报纸、网站征婚成功的；亲戚朋友介绍促成的；自己在生活、工作中相恋、成婚的。无论何种方式，女性积极主动地卷入了婚姻决定。她们不再象老一辈的女性们那样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自己的命运、自己作主，从这个意义上说，她们不是社会经济制度下的牺牲品而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协商者。在移民后，不少女性的法律地位变得脆弱，成为先生的依附者。但她们并不愿意逆来顺受，她们对婚姻的要求十分严格。一方面她们要求男人继续充当法律上的一家之主，为家庭打拼；另一方面，也追求婚姻中的平等地位，从不放松从婚姻中寻求安全感。这种心态是在移民前女性生理上和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在移民后由于法律地位的改变而变得矛盾突出。她们在婚姻中也同样显示了自己的主体性。

第二，在社会领域，虽然新加坡是华人为主要的社会，但中国女性发现自己在融入社会与进入劳动力市场上都比移民男性更为困难。

首先，在社会关系上，她们是一些本地人心目中的“他者”，被贴上“小龙女”（其意义指向第三者、妓女）、“乌鸦”等具有贬义的标签，在社会上是一种负面的形象（近期已经有所改变）。这种情况的出现，媒体的作用不可小觑。笔者认为正是媒体反复强化才将对中国女子的成见从媒体视点变为公众视点。媒体关于“小龙女”的描述出现在1995年施昉离婚案见于报端之前，在使用中非常混乱。在一些报道中，“小龙女”用来指“中国女人”，由于成见，往往在无事实根据的情况下就轻率地将其意义指向“色情交易、第三者”，显示出一些本地人自视“高等华

人”的自大和傲慢。由于铺垫效果，媒体的观点变为大众的观点。“小龙女”这一名称从九丹的《乌鸦》开始有了完整的定义，但也因《乌鸦》描写了一些私立学校女大学生沦落风尘的故事，而使这一群体成为众矢之的。“小龙女”的名称在本地人的眼中与“乌鸦”等同。女童黄娜事件让本已显示端倪的陪读妈妈这一弱势群体进入社会的眼帘。尽管新移民在黄娜葬礼前第一次集体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但后来媒体的炒作、围绕帛金等问题的争论，也让他们更加感受到自己作为边缘群体的社会现实。近年来，媒体对中国女人的描述已经有了更加平衡的表现，但以往在社会上造成的消极影响很难在短时间里消除。在这里我们也要看到公众并非铁板一块，大众舆论的混乱无序使其虽与媒体舆论界限模糊却不是完全等同。在现实生活中，女移民与本地社会之间的关系不会与媒体描述的完全一致，在很多情况下都呈现出融洽的一面。媒体观点与大众观点还是会存在某种程度的疏离。

其次，在社会领域里，有关外国人才的讨论实际上是一些人心目中的“自我”与“他者”的主观想象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真实反映。若是说有些本地人还能将一些男移民视为外国人才的话，那么移民女性由于在人们的印象中往往是以依附者入境就更加是外国“他者”——来抢饭碗的。由于多数男性（除了学生以外）在入境前就已经找到工作，女性在本地就业或升职时受到种种限制的情况相对明显。这些限制包括：英文熟练程度、外国人身份、在中国的文凭、工作资历不被承认等。在升职机会上，新移民无论性别，其机会也无法跟本地人相比。在现实生活里，女移民往往能够在种种限制中不断进取，显示出积极向上的心态。

第三，从民族国家的角度考察，新移民的选择因人而异，并不统一。首先，从新移民与中国的关系来看，有些学者认为海外华人（本文特指本地新移民）民族主义的复兴是中国政府单方面鼓励推动的结果，但笔者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是内因与外因的结合。新移民在中国历史文化氛围里长大，背负过去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包袱，对国家安全有着特殊的敏感。在1990年中新建交以后来到这里的他们，曾在民族主义重新高涨的氛围里熏陶，有些人在移民前就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对国家统一等民族主义目标的认知已经内化。在移民后，这种内化的民族主义感情也在中国政府

新移民政策的鼓励下，尤其是遇到重大民族主义目标被阻挠时而激发出来。一般而言，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立场通过三种方式传到新加坡，从而使本地新移民与中国国内保持一致。首先是通过中国大使馆的具体活动。中国大使馆为了一些具体的民族主义目标而寻求海外新移民的理解和支持。其次是通过中国内地地方官员和新移民团体的互访活动。虽然中国内地地方官员的到来基本是为招商引资而来，但国内的信息也同样可以通过他们传达出来。再次，新移民媒体通过对国内媒体文章的转载使国内的信息在本地传播开来。此外新移民媒体也可以通过采访中国官员的方式与中国内地保持一致。应该注意到，民族主义在本地更多表现为一种意识形态，在网上流露得非常明显，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在报刊或是实际行动中大规模地出现，没有在欧洲、北美那样大规模的示威。女性也同样分享了这种民族主义立场。虽然不少新移民仍然持中国国籍，在政治上认同中国，法律上有效忠中国的义务，但由于本地特殊的政治气候以及很多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本地“落地生根”，他们对中国的支持有限，不可能出现半个世纪前那样大规模的爱国华侨现象。在未来的日子里，女性相对男性更有可能改变政治认同，负起对新加坡的法律义务。

其次，新移民跟随老一辈中国人的脚步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也就汇入了新加坡这个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当中。他们在生活中作出了种种融入社会的努力。（1）在社会认同方面，他们重塑自己的社会身份以融入新加坡。他们通过网站、杂志，来塑造新移民积极向上的整体形象；以社团、网站为组织，踊跃参加本地的慈善、文化交流等活动；为处于困难中的同胞提供支持以帮他们缩短融入本地的进程；在包括文艺、体育的各个领域里争取成功以争取更大的社会空间。这些重塑社会身份的努力，由于缺乏一个强有力的、能被多数新移民认同的社会团体的领导而处于初级阶段，但他们毕竟正在作出尝试。（2）在文化认同上，很多新移民十分欣赏这里吸收了东西方精华的多元文化，显示出与本地人趋近的倾向。女性文化活动的当地化导向比男性明显，这在某种程度上与女性传统的家庭教育职责有关。她们会比男性付出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与当地幼儿园、学校以及其他同学的家长们打交道。此外，为了孩子将来更好地融入社会，女移民毫不犹豫从东西方文化中汲取精华。在一些网络文学中，她们也毫

不掩饰自己对本地多元文化的热爱，表达对这个家园的感情。（3）第三，在政治认同上，有些人决定加入新加坡国籍是基于多种因素（个人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之上的考虑。无论是一些中国人骂他们“卖国贼”，还是一些本地人怀疑他们会以新加坡为跳板，都过于偏激和片面。事实上多数人都要经过剧烈的心理挣扎，都要克服对故乡的眷恋。他们的愿望可能是很朴素的，就是想要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不再有被歧视的感觉等。在政治认同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改变，笔者的调查证实了这一点。

参考书目

一、原始资料

1、社会调查

个人访问，2005年3月—12月，20人接受了访问。

调查问卷，2005年3月—4月，127个新移民（76个女性、51个男性）接受了调查。

2、官方出版物

Census of Population 2000, Advance Data Release, Singapore: Singapor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01.

3、报刊、杂志

《联合早报》，1995年—2005年。

《联合晚报》，1995—2005年。

《新明日报》，1995—2005年。

《扬时代》，2003—2005年。

4、新移民文学

九丹《乌鸦》（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1）。

九丹《凤凰》（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3）。

双月《我们中国人：越洋女工手记》（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2）。

卡夫《我这滥男人》（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3）。

肖洁《中国女子的新加坡》（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2）。

施昉《时间作证》（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胡喜梅《中国女孩》（新加坡：新亚出版社，1996年）。

思静《狮城往事》（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3）。

萧萧《路在何方：陪读妈妈的真实故事》（新加坡：玲子传媒私人有限公司，2004）。

5、网站文章

华新网，www.huasing.org。

华源会网站，www.myhuayuan.org。

新马华人论坛, www.malaysia-chinese.com。

新加坡家园物语, www.4sgfamily.net。

狮城华人网, www.sgchinese.com。

二、中文书目

1、专书

韦红《东南亚五国民族问题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2年）。

王赓武《中国与海外华人》（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年）。

庄永康《新加坡华社研究》（新加坡：教育出版社，2002年）。

刘宏《中国—东南亚学：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刘宏《战后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嬗变：本土情怀·区域网络·全球视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刘宏、黄坚立主编《海外华人研究的大视野与新方向》（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年）。

李君哲著《战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变迁》（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李威宜《新加坡华人游移变迁的我群观：语群、国家社群与族群》（台北：唐山出版社，1999年）。

李银河《女性主义》（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李银河《女性权力的崛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年）。

陈文寿主编《华侨华人新论》（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

宋旺相著、叶书德译《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

郑永年《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8年）。

林孝胜编《东南亚华人与中国经济与社会》（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4年。）

范若兰《移民、性别与华人社会：马来亚华人妇女研究（1929—1941）》（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周南京主编《境外华人国籍问题讨论辑》（香港：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周南京《风雨同舟—东南亚与华人问题》（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

- 贺圣达、马勇、王士录《走向 21 世纪的东南亚与中国》（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年）。
- 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
- 荒林《中国女性主义·2005 年春》（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
- 郭振羽《新加坡的语言与社会》（台北：正中书局，1985 年）。
- 高伟浓《国际移民环境下的中国新移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年）。
- 高伟浓、石沧金编著《中国的华侨华人研究（1979—2000）——对若干华侨华人研究期刊载文的摘评》（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 年）。
- 梁英明《战后东南亚华人社会变化研究》（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 年）。
-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9—1959》（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 年）。
- 温广益等《二战后东南亚华侨华人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0 年）。
- 曾少聪《漂泊与根植：当代东南亚华人族群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
- 傅利曼（Maurice Freedman）著、郭振羽、罗伊菲译《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台北：正中书局，1985 年）。
- 葛剑雄、安介生《四海同根：移民与中国传统文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 年）。
-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 年）。
- 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华侨华人研究（第二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 年）。
- 颜清煌《海外华人史研究》（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2 年）。
- 戴锦华主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年）。

2、论文

- 云达忠〈南太平洋国家华人的经济角色与文化认同〉，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4 年第 3 期，页 46—51。
- 向大有〈当今海外华人不存在统一的新民族主义〉，见《八桂侨史》1999 年第 2 期，页 1—8。
- 向大有〈论海外华人融入当地社会的若干关系〉，见《八桂侨史》1997 年第 1 期，页 1—8。

- 庄礼伟〈国际关系中的东南亚华人〉，见《东南亚研究》1999年第2期，页61—66。
- 刘宏〈海外华人社团的国际化：动力·作用·前景〉，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页48—57。
- 庄国土〈对近20年来华人国际移民活动的几点思考〉，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页1—6。
- 李明欢〈当代华人社团发展之前瞻〉，见《八桂侨刊》1994年第4期，页1—4。
- 朱崇科〈看与被看：中国女人与新加坡的对视〉，见《新加坡文艺》2003年9月号。
- 杨力〈澳洲华人新移民的崛起〉，见《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页47—51。
- 吴文爱《早期美国华人妇女生活的探讨》（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论文，2005年）。
- 沈立新〈美国华人新移民状况研究〉，见《八桂侨刊》1996年第2期，页26—30。
- 吴仲华〈改革开放与发展新移民〉，见《广东党史》1994年第3期，页17—19。
- 吴洪芹〈海外华人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观念辨析〉，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页1—7。
- 吴藜〈新加坡华人妇女社会家庭地位的变迁〉，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页35—40。
- 汪洋〈从华侨到华人再到华族——兼谈东南亚华人同化问题〉，见《东南亚研究》1998年第3期，页55—59。
- 汪玲〈试论当代华侨华人社团的若干特点〉，见《八桂侨刊》2002年第1期，页11—14。
- 陈思美《中国新移民与新加坡华人：认同差异及其原因之论析（1993—2002）》（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论文，2003）。
- 陈菲〈现代化视野中的华人华侨与中国的关系〉，见《八桂侨刊》2002年第3期，页42—45。
- 林少芬《20世纪初新加坡的华人妇女问题》（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论文，1983年）。
- 范若兰〈新马华人妇女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活动〉，见《八桂侨刊》2002年第2期，页

16—20。

范若兰〈二战前新马华人妇女素描之一〉，见《八桂侨刊》2003年第3期，页20—22。

周家雷、顾广玲〈论新加坡竞争力的源泉〉，见《东南亚研究》1999年第3期，页11—20。

赵红英〈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大陆新移民若干问题的思考〉，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页7—16。

赵和曼〈美国新华侨华人的若干变化〉，见《八桂侨刊》2003年第1期，页13—20。

曹云华〈东南亚华人青年如何看待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见《东南亚研究》1999年第4期，页12—20。

章明〈海外新移民——跨世纪人才争夺的焦点〉，见《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6年第3期，页12—14。

程希〈人才流失与新移民：七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前往日本和欧洲的留学生〉，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页17—26。

程希〈文化适应与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滞归〉，见《八桂侨史》1999年第1期，页1—8。

曾慧燕〈中国留学生的双向回馈〉，见《八桂侨刊》2003年第4期，页39—40。

谭天星〈近年来我国公民移居海外情况之管见〉，见《八桂侨史》1997年第1期。

裴颖〈华侨婚姻家庭形态初探〉，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页41—45。

潘瑞安〈发挥侨务信息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见《八桂侨刊》1996年第3期，页22—25。

David Zweig Cheng Changgui 著、程晓迪、李其荣译〈吸引留学生回国的主要因素〉，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页65—72。

三、英文书目

1、Books

Chant, Sylvia, *Gender and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London; New York : Belhaven Press, 1992.

Charney, Michael W., Yeoh, Brenda S.A. and Tong Chee Kiong (eds.), *Chinese Migrants Abroad: 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World Scientific Pub., 2003.

- Joly, Danièle (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 Glob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4.
- Ling, Huping, *Surviving on the Gold Mountain: a History of Chinese American Women and Their Live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8.
- Massey, Douglas S. et al.,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McClain, Charles (ed.), *Chinese Immigrants and American Law*, New York: Garland Pub, 1994.
- Pieke, Frank N. and Mallee, Hein (eds.),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 Chinese Perspectives*, Surrey: Curzon Press, 1999.
- Piper, Nicola and Roces, Mina (eds.), *Wife or Worker? 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 Rai, Shirin M. and Lievesley, Geraldine, *Women and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London : Taylor & Francis , 1996.
- Richardson, Diane and Robinson, Victoria, *Thinking Feminist: Key Concepts in Women's Studies*,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1993.
- Salaff, Janet W., *State and Family in Singapore: Restructuring a Developing Socie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8.
- Sinn, Elizabeth (ed.), *The Last Half Century of Chinese Oversea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c1998.
- Vernez, Georges, *Immigrant Women in the U.S. Workforce : Who Struggles? Who Succeeds?* Lanham, Md. : Lexington Books, c1999.
- Willies, Katie and Yeoh, Brenda (eds.), *Gender and Migration*,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2000.
- Yeoh, Brenda S.A. and Willis, Katie (eds.), *State/Nation/Transnation: Perspectives on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 Yung, Judy, *Unbound Feet: 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Women in San Francisco*,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2. Articles:

- Chan Kwok Bun, "Interrogating Identity, Ethnicity and Diaspora: Three Cases Studies of the Ethnic Chinese", in Danièle Joly (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New Millennium*,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4, pp.180-199.

- Chong, Peng-hong, *Chinese Female Immigration to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from 1901 to 1941*, Singapore: Academic Excises for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84.
- Henderson A., Trlin A. and Watts N., "Squandered Skills? The Employment Problems of Skilled Chinese Immigrants in New Zealand", in Roy Starrs (ed.), *Asian Nationalism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Richmond, Surrey: Japan Library, 2001, pp.106-123.
- Koo Chiew Tee, *Exploring Internet Relay Chat (IRC):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a Cyber Sub-Culture*, Singapore: A Thesis Paper f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1999.
- Liu Hong, "New Migrants and the Revival of Overseas Chinese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4, No. 43 , May, 2005, pp.291-316.
- Low, Lind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igrant Worker Policy in Singapore", in Yaw A. Debrah (ed.), *Migrant Workers in Pacific Asia*, London and Portland,OR: F. Cass, 2002, pp.95-116.
- Luo Keren, "China's Chang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rends", in Robyn Iredale, Charles Hawksley, Stephen Castles (eds.), *Mig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Population, Settlement and Citizenship Issues*, Northampton : Edward Elgar, Pub., 2003,pp.293-304.
- Luo Keren, Fei Guo and Huang Ping, "China: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Emerging Trends of Reversal of the Brain Drain", in Robyn Iredale, Fei Guo and Santi Rozario (eds.), *Return Mig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 M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 2003, pp88-111.
- Chee Maria W. L., *Migrating for the Children: Taiwanese American Women i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in Nicola Piper and Mina Roces(eds.), *Wife or Worker? 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pp.137-155.
- Morokvasic, Mirjana, " 'In and Out' of the Labour Market: Immigrants and Minority Women in Europe", in Katie Wills and Brenda Yeoh (eds.), *Gender and Migration*,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2000, pp.65-91.
- Nakamatsu, Tomoko, "International Marriage through Introduction Agencies: Social and Legal Realities of 'Asian 'Wives of Japanese Men", in Nicola Piper and Mina Roces (eds.), *Wife or Worker? 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 Lahn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pp.181-212.
- Nyíri, Pál , "Expatriating is Patriotic? The Discourse on 'New Migrants' in the People's

- Republic of China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among Recent Migrants from PRC”, in Brenda S.A. Yeoh and Katie Willis(eds.), *State/Nation/Transnation: Perspectives on Transnationalism in the Asia-Pacifi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120-132.
- Piper, Nicola and Roces, Mina, “Introduction: Marriage and Migration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in Nicola Piper and Mina Roces (eds.), *Wife or Worker? 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 Lanham : Rowman & Littlefield, 2003, pp.1-23.
- Salaff, Janet W., “The Gendered Social Organization of Migration as Work”, in Katie Willis and Brenda Yeoh(eds.), *Gender and Migration*,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2000 , pp.153-177.
- Salaff, Janet W., “Social Policy Transforms the Family: The Case of Singapore”, in Josef Gugler (ed.), *Citi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ssues, Theory, and Policy*,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233-247.
- Salaff, Janet W., “Women, the Family, and the State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Singapore ”, in Richard P. Appelbaum and Jeffrey Henderson(eds.), *State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Asian Pacific Rim*, Newbury Park, Calif. : Sage Publications , c1992, pp267-288.
- Salaff, Janet W., “Women’s Work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Esther Ngan-ling Chow (ed.), *Transforming Gender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p.217-238.
- Seet Chia Sing, *Making Sense of Families Moving: A Study of Chinese Migrant Families in Singapore*, Singapore: A Thesis Paper f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2000/2001.
- Yeoh, Brenda S.A. and Khoo, Louisa-May, “Home, Work and Community: Skille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Expatriate Women in Singapore”, in Katie Willis and Brenda Yeoh (eds.), *Gender and Migration*,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2000, pp.413-439.
- Yeoh, Brenda S.A. and Huang, Shirlena, “Civil Space in a City-State: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in Singapore”, in Robyn Iredale et al. (eds.), *Migration in the Asia Pacific: Population, Settlement and Citizenship Issues*, Northampton, MA: Edward Elgar Pub., 2003.
- Zlotnik, Hania, “Migration and the Family: The Female Perspective”, in Katie Willis and Brenda Yeoh (eds.), *Gender and Migration*,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2000, pp.27-46.